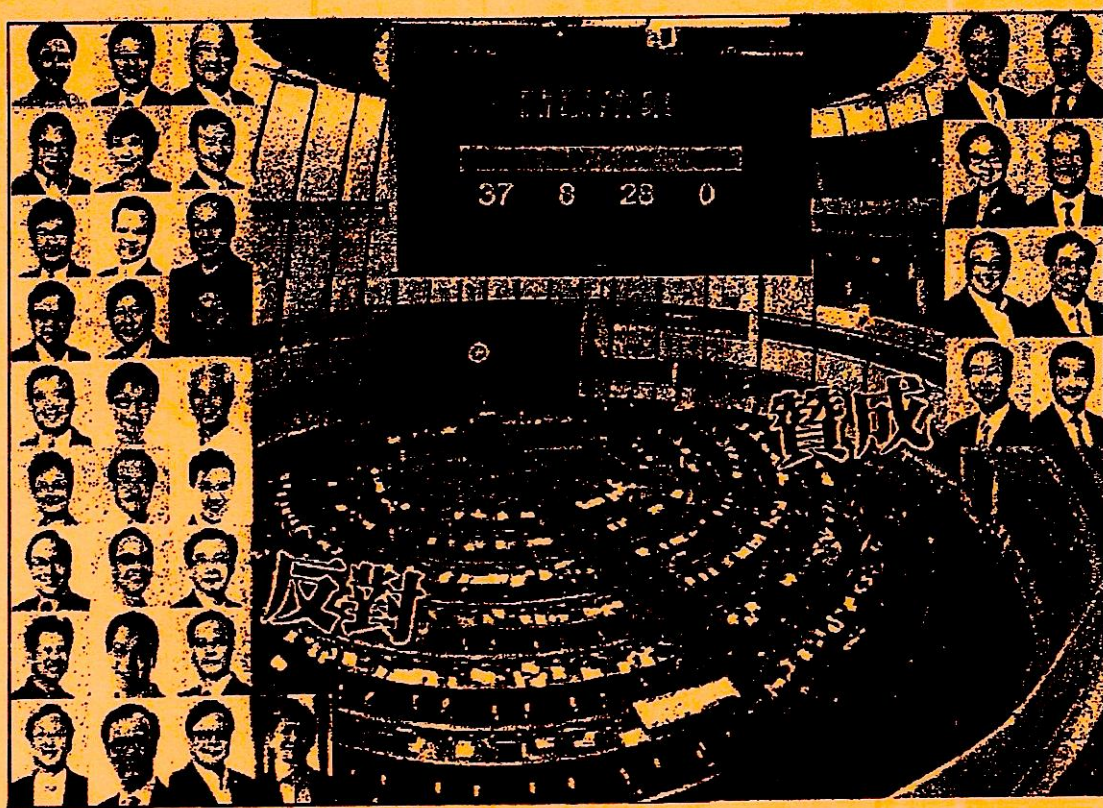




團結一致否決掉假普選政改方案!

立即釋放高瑜、浦志強及所有異議人士!

從實況檢視中國的人權進展白皮書

根本之裂痕: 阿拉伯世界的權力、財富和不平等

托洛茨基致蘇聯工人的公開信

懷念阮金兆同志

團結一致否決掉假普選政改方案 ——爭取真普選過程中的一次重要勝利

振言

立法會表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終於在28票反對、8票支持下被否決。這樣一來，政府苦心推行的方案，便在70名議員中只得8票贊成就悲慘收場。

在投票時，建制派議員以「等齊發叔」為名，集體離場，企圖造成不夠出席人數「理由」，拖延表決。但因有8名建制派議員沒有一起離場，致使表決成立。



建制派這場拙劣行動，充份表現出他們的弱點：事前既無交換意見，以採取共同進退策略，更暴露出他們有如一盤散沙，變成烏合之眾。不同政團的議員在慘敗後更互相指責對罵，工聯會黃國健公開指民建聯不肯承擔責任，林健鋒也暗指自由黨不合作離場，後者則回擊指沒通知離場。

與他們大為不同的，是泛民主派聯合教育界等進步界別議員團結一致，能以超過三份之一的票數，成功否決了這個政改方案。這28位議員，選前堅定不移，拒絕當局拉票的分化企圖，也沒有人贊同「袋住先」。

今後，由於湯家驊議員的辭職，泛民主派必須盡力爭取這關鍵一票，保住立法會分組點票時，繼續是過半數的優勢；否則建制派便能通過其議

員議案，包括修改議事規則處理拉布等問題。為了爭取到補選這一票，泛民主派必須派出最有獲勝可能的人參選，而不只是着重於年青黨員這一條件。

泛民主派這次的勝利，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征戰歷史中，繼去年的雨傘運動之後，再寫下光輝的一頁。

在否決方案之後，泛民主派必需再接再厲，聯合其他政團及社會人士，共同繼續爭取真普選的實現。

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自然難免會有某些分歧意見，但只要堅持以大局為重，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便可化分歧為力量，共同聯合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從這次泛民主派的勝利中，我們深感到「團結就是力量」這句名言至理的重要。由此連帶想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不久之前的分裂，虔誠渴望雙方能和好如初，共同携手重上征途，繼續發揮出團結的偉大力量，有如過去學聯參加多次社會鬥爭都能團結一致，共同爭取得許多勝利那樣。

2015年6月25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2卷第1期（總第238期）

2015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民意

大 進

六月底，香港特區政府把備受爭議的政改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政府的目標固然是設法要把方案通過。但無論最終法案通過與否，策略上政府似乎是要借民意，以藉此贏盡政治利益。

一個專橫和小圈子的政府，荒謬地突然把民意高高抬上雲端，天天講、日日講，去推銷一個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希望能營造一個「現實」：這個法案是獲得廣泛民意支持。

這個政府真是如此重視民意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去年雨傘運動之前，佔中運動的電子公投，不是有近80萬人投票嗎？但在政府提交中央的民情報告，他們的訴求未受重視。又例如：中央去年六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其後的8.31人大決議等等，又何嘗有考慮到香港市民的意見？

顯而易見，政府要用盡法寶，只想去製造一個「民意現實」。政府除了用公共廣告(API)，絮絮不休地在電台和電視台自說自話外，大部分司局長和本地建制派人士，都要落區作秀，大打親民牌。(但他們被充滿智慧的普羅市民嘲弄，真是大快人心。)

要完成這個中央派下來的「硬任務」，本地的親共陣營，自然要獻身配合。當然，亦不排除中間涉及數目龐大的維穩利益。所以，建制派亦要再次展開他們擅長的「運動」群眾。所謂「民間」團體發動簽名運動，支持通過政改，第一天便宣稱有18萬人簽了名，一星期後更說取得逾百萬簽名。以他們之前「反佔中」的群眾運動往績，其實「要有」多少群眾，就必然會「自行達標」。

這些宣傳對事件瞭解不深、立場不明確的市民，或可起一點催眠作用，誤以為真是人心所向。建制派最想出現的景況，當然就是越來越多的市民，接受了他們的觀點。

從政治現實來看，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完全是可以粗暴強行去推他們的方案，但他們仍樂於做大秀一場，攪攪公關。政府是有它的如意算盤：



1) 若果越來越多市民「真的」相信政府那一套，以後便大可振振有辭，說自己代表市民，建立起本身的認授性。長遠地亦削弱反對派的實力。2) 政府亦藉此迫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不能一方面聲稱為民請命，但另一方面卻違背民意去否決政改。3) 如果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在大多數市民支持政改的背景下，仍否決議案；政府便可把政制發展停滯的責任，推到反對派身上。而維持目前的政制，政府亦並無損失。4) 另方面，因為反對派中的泛民立法會議員，已經多番表示會否決政府方案。若要打破這個綑綁立場，便得為打算放棄原則的議員，找一個具體面的理由/下臺階，而所謂民意，便是一個很好的藉口。但事情的發展，未必會按人們主觀意願推演。政府這場民意秀並不好看。

首先，政府和建制派能拿出來的論據，是難以服眾。宣傳定位在「袋住先」，便已是自我承認，這不是一個理想的方案，只不過想利用港人過往「現實」的取向，既然利益擺在眼前，為何不先取為妙？可是，經過七十九天佔領運動之後，很多香港人的眼界已不一樣，特別是年輕的一輩，這個利誘自然難以奏效。

其次，正如之前提及，無論高官或建制派頭頭出來宣傳時，不少表現拙劣，經不起市民的質詢，這些事件都令政府失分。

有一段時間，政府雖然強調民意，但之後三間大學的滾動民調（較為可信）結果，支持通過政改的比例未有顯著增加。政府及親建制陣營，又說民調未可盡信。立場飄忽，本質是「葉公好龍」的政府或親北京領袖，豈真是夠膽全面擁抱民意？

既然大家（政府和反對派）都說尊重民意，不如就來一場公公正正的公投，來一個了斷。但專權和小圈子的政府，會願意把決定權交予人民？

對他們來說，民意只是鍾無艷：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合自己的需要時使用，不合時就丟開！



頌香港的中國人向專制暴政說：不(轉載)

王寧

自從中共佔據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皇宮中南海的近70年中，我們中國人民又從孫中山1911年推翻的皇帝社會而建立的共和民主國體中被迫回到了以中共為皇帝的新封建社會。這近70年以來，中國人民從來都沒有權力向中共皇上說“不”，因為誰說了這個“不”，誰就要以昔日名為“反革命罪”或今天的“顛覆政權罪”被投入大牢，甚至被斬。即便是中國人已經痛快的扔掉了那個厭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改變成了“美帝國主義”英美或者“帝國主義小爪牙”新西蘭的公民，你一旦對當今中國的皇上說了“不”，那它就要你永永遠遠不能回家見爹娘。在中國的中國人怕了，怕沒有好的工作、怕家庭被連累、怕被失蹤、怕被吃飯、怕。已經成了外國公民的中國人也怕了，怕被給回家探望父母親的簽證、怕去不了中國而失去賺錢的機會、怕中國的親屬被迫害、怕。

今天，對，就是今天！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香港的中國人要對北京中南海裡習皇和李張俞劉王張六副皇大聲說：“不NO”！這是咱們14億中國人過往近70年來的頭一次，這就是香港立法會（香港國會）的議員們今天要投票否決由習皇主導的香港假普選的“中國夢”。香港議員們均是由他們所在的選區的居民民主投票選出的，這些議員是完全代表香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今天晚些時候的香港議員們要否決中共假普選的方案，這完完全全是香港的中國人民的覺醒和意志，是香港人擯棄過往金錢的奴役，正在邁向社會的主人的人類社會最為有價值的高級步伐。我們海外的中國人當然是為香港的中國人歡呼、為他們驕傲、為他們讚頌！是香港的中國人讓我們所有中國人昂起了頭。

聽到來自北京昔日皇帝紫禁城範圍內的中共皇宮中南海的狂叫：“如果普選法案被否決，香港發展前景堪憂。”因為事實上，今天否決了中共搞的假普選就意味著中共在香港的話語權被削弱，而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地位堪憂。

正常人都明白，只有香港人掌握住自己的命運，香港才有前途；香港是被別人操控的，那香港就永永遠遠堪憂。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各個民族和國民均擯棄殖民統治而走向共和的道理。香港的繁榮並不是靠的是中國才有的，況且，北京方面想要使用它們一貫的惡招來對付香港人民否決假普選的話，那也不會達到魚死網破的情況，最多的是，香港這

條大魚掉幾片鱗而已，但是香港外的北面就會網破。在中共眼看就撐不下去的經濟局面是絕對離不開香港的，特別是兩廣一帶。政治層面和外交上中共已經是聲名狼藉與四面楚歌。東南亞和日本對中國的緊張關係，再加上臺灣是藍天已經變綠和明年總統的更替，北京幾乎沒有了喘息的空間，如果從明天開始，因為否決了假普選，中南海開始打壓香港，那已經被逼的現在是甚囂塵上的香港獨立運動就會發展成香港全民的唯一選項，不過也許中共只會做讓香港獨立成為另一個中國人的民主共和國。那當然是人民的福祉所在。

另一方面，香港人明白自己不是那麼容易被欺騙的幼童或者弱智者，用威脅的方法就能夠被嚇倒。他們明白，英國人給留下來的完好的法治社會不會一下子就被專制暴政給壓倒，但是，不去抗爭維護好自己的社會，放任自流的話，那來自北方的寒流侵襲就會日益猖獗。

筆者去年10月初抵達香港參與占中行動達5個月，親身領悟到了千千萬萬個香港人愛港愛家的真摯情懷和奉獻精神。他們不畏懼自己也許丟掉了學歷、不畏懼也許被禁進入中國而失去了某種前途和金錢、不畏懼坐牢、甚至不畏懼犧牲生命。一位90多歲的老黃伯從9月下旬開始就睡在酷熱的大街上，那時連個遮陽棚子都沒有，兩周後才有了市民捐助的帳篷，直到經過寒冷的冬季，數月以來，他一直就住在占中的香港政府附近的區域內。人們經過他的帳篷無不動容感動的，這位壽星只是占中人海中香港人的一個代表。

頌揚香港人為了自己能夠主宰自己而勇敢、奮鬥和忘我不怕犧牲的具體行動的精神，他們的精神正是在推動整個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實踐。無論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還是中國進行之經濟改革，所有中國的巨變均離不開香港為橋頭堡的作用。今天香港的中國人對中共說不，明天開始中國的中國人就會跟進大聲對慘無人道的集權說：“不”！

[博訊北京時間2015年6月17日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聯繫王甯Nick Wang先生：66889966z@gmail.com

香港否決政改使北京又哭又惱(轉載) 王寧

曾經是香港最大的政黨 - 民主黨現任主席劉慧卿女士今年初在她的立法會辦公室接受本記者的攝像專訪。她用畫龍點睛的四個字“嚇了一跳”來概括香港去年9月發生的雨傘革命，即2014年香港佔中運動。她說，香港人總是擔憂現在的年輕人不問國家政治，這次佔中運動就讓市民嚇了一跳。他們想不到，是十幾歲的孩子們最先開始佔中的；689（梁振英）他們以為放催淚彈就可把幾百個學生和市民給嚇跑回家。其實是，市民和學生在家裡看完催淚彈的電視新聞後，不但沒有被嚇得在家藏着不敢出門，而是十幾萬人都出來了，他們直接來到放催淚彈的地點要救那裡的學生、要反對警察放催淚彈、還要689下台。這把他們又給嚇了一跳；總是印象中香港人只會賺錢，不管別的，但是，現在是90歲的老伯伯、中年人和更多的青年孩子們一下子都來佔中了，他們就用一塊卡通紙板當床鋪，就在金鐘大道上睡覺了，一睡就是兩個月(79天)，這又把全世界給嚇了一跳。如果今天（6月18日立法會否決日）遇到劉慧卿主席的話，她一定會說：今天只有8個議員投了政改方案的贊成票，全部28個泛民票說 NO，竟然有33個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不投票，也就是說包括主席曾鈺成在內的大多數建制派議員其實內心是不支持這個假普選議案的，這次讓我（劉慧卿）也給嚇了一跳。

相信，今天6月18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對政改投票表決的結果不但使現為特首的梁振英和林鄭月娥等當局嚇了一大跳，更是讓北京中南海震驚不已并淒然淚下。一向以為支持政府的建制派議員不會不支持政改方案的，所以，北京方面用全力去說服民主派議員回心轉意投票支持這個方案，甚至有傳說北京不惜用3億元來買通民主派議員可使習近平主導的這次鬧劇有個對北京來說是個好收場。可是，竟然有81%的被認為一向支持北京的建制派議員在最關鍵時刻倒戈了。這讓北京

既震怒又傷心。就在三周前，中共的高官李飛和王光亞再次磨破嘴皮動員香港民主派議員和北京“相向而行”而使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可是，中共中央這些上層高官却没有想到，不支持這個政改方案的建制派議員要比民主派的還多。不震怒、不沮喪、不傷感才怪哩。中央震怒的是，沒有料到總以為是自己的人却在臨場時逃離了。傷心的是，總以為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最終却不給力了。其實，路都是自己走的，你中共走到今天需要回頭看看自己的歷史足跡，都幹了些什麼？？？

成百萬的香港人都是拼死從中國大陸那邊逃到香港來，因為他們不逃亡香港，那在35到60年前，他們當時在中國不是已經給餓死就是給整死了。現在中共懷着敵意來玩弄香港人，那早就對中共涼了心的港人會輕易被玩嗎？

《人民日報》今天6月18日報道的題目是：“梁振英：對政改未通過表示極度失望”。他為什麼要“失望”，而且還是“極度”。也許他沒有那麼聰慧，因為幾十年身在香港各界混成現在的特首本應該心知肚明這70位議員的脈搏呀。從他極度失望的狀態來看，他並沒有掌握住這次政改投票結果的基本預想。在香港最重要的事件上他苦心奮鬥了近兩年時間，最終他胸中都沒有任何竹子，可見是太不稱職了！

香港2017年特首大選的假普選方案獲得了毀滅性的失敗。

有言論說，今後的香港會更加困難，因為按照中共一貫的做法，香港是要被秋後算賬的，中央今後會給香港很多難題的。例如，嚴厲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打壓立法會議員的各種事業，等等。其實，北京對香港是無可奈何。

香港與中國不同的是，香港具有完整獨立的法制體系，也有與全世界經濟體系聯網運作成熟的獨立市場，還有受到法律保護和社會尊崇的新

聞言論自由規則，更有已經覺醒和誓死保衛香港民主成果的港人。要想讓香港倒退或者關門，那顯然就是成為要促進香港的獨立建國。因為現在的香港人和香港社會經過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衝擊，直到這次佔中運動，已經建立了很強的民主與自由的理念，造成了他們現在內心對北面的中國大都是反感或者厭惡的心態，從港人反大陸客，到今次的完全否定北京方面玩弄港人的假普選，還有在香港社區以及大街上時時傳入耳朵的具有普遍性的反中言論，均會容易的證明港人對中國人的心態。這種心態是無論如何不能打壓的，也是打壓不住的，否則就是燎原的烈火，那就更不可收拾了。

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在經濟層面、信息、情報、影響到台灣與澳門方面、國際上的政治地位，等等，均是中國無法棄之的和無法替代的按年百億元來源的巨大資源。這顯然是件很疼痛的難題。不開放香港的真民主，那香港就天天在擴大其獨立的社會氛圍，並日日消毀中共在香港的地位。開放了香港的真普選，那於專制是抵觸或者敵對的。真是無所適從呀！

英國派往香港的末代總督彭定康6月18日接受香港蘋果日報的專訪，報導說：“香港民主政制發展至今天局面，英國人要負責任嗎？回顧殖民統治，彭定康說若果英國早於上世紀七十及八十年代在港開展民主，“至我們離開時，應該可以得到完整民主制度。”“可是，他認為，發展香港民主的其中一個反對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共憂慮香港發展民主會使港人以為最終可以如新加坡獨立，而這是不會發生的。”彭定康透出了個玄機，是中共方面阻止了在1997年到中共手心之前的香港發展民主選舉的空間。

前香港學民思潮發言人周庭昨天說：“尤其是基本法，一直規限了香港人的政治想像。中央不斷破壞其在基本法中所許下的承諾，但奇怪的是，大部分港人依然相信基本法。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憲法應是怎樣？憲法應否由人民和政府共同建立？這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這位19歲的女大

學生還充滿理性的說：“重新思考香港問題，不再幹等政府下一次遙遙無期的重啟政改，打破既有框架，重奪主導權，應就是我們的目標。”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Dr Richard Bush本月初從香港返回華盛頓後在威爾遜中心一場研討會中表示，他在香港和一些人接觸後的感覺是，一般人對香港的普選方案感到悲觀。這位多年在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任高級職位并擔任過美國政府駐台北協會主席（相當於美國駐中華民國台灣的大使）還說：自雨傘革命後港人出現一種極為罕見的“港獨”意識，這是因為北京沒有注意到過去25年來，香港已經從一個經濟城市轉變為一個政治城市，以往只有政治精英階層才能參與的領域，現在所有港人都能接觸到，而北京却不願接受這種轉變，因此彼此間存在一個難以彌合的鴻溝。他分析出：“中共采取一個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先發制人地指控美國是去年雨傘革命的幕後黑手，儘管它並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來支持這個指控。我認為這不僅顯示出他們政策上的失敗，也顯示他們完全不了解香港過去15到20年來發生的變化。”

從以上信息看出，香港人和國際社會都是非常理性的，他們均有充分的準備來對香港未來的走勢，那就是香港要在人類世界進步的標準中再邁向前。

哭吧！惱吧！香港根本不理會你中南海在鬧什麼。只有一條路：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中國人和全世界都會在乎，那就是看你北京是要立地成佛，還是要自刎。

自由

June 4th

永不忘記，永不放棄

never forget, never give up

堅拒假普選也袋住先的欺騙(轉載)

謝冠東(良心理政成員)

有票，真係唔要？政府的宣傳，好像是在送我們一件大禮。可是這份禮物其實是一口毒藥，不是送你甚麼，你就一定要袋。政府認為有票總勝過無票，然而假普選實施後，給我們三個傀儡投票，然後選了一個，就說他有全港市民的認受性，得到市民支持，可隨心所欲地施行大政。但他真的是市民認受的那個人嗎？這個方案是打劫市民，從我們市民劫取一份認受性，去推行可能不符市民利益的任務。市民會想被劫嗎？這場大龍鳳把打劫說成送禮，大概已由語言偽術進化為行為偽術。

有人又說，中央並不忘切政改通過，它其實樂於政改被否決。此言差矣。中央就和特區政府一樣，對推動假普選望穿秋水。假設有人曾答應給你一塊瑰玉，但現在它給你一塊假玉，你也欣然袋下，它又怎不會大喜過望？面對國際社會時，它還可以明明實行專政卻振振有詞說已推行民主，何樂不為？還可推廣為「富中國特色的普選或民主」！（富中國特色就是「假」吧）林鄭說這個候選人都經篩選的選舉，就是滿足了給大家普選的要求，那是人渣敗類、瞞天過海、埋沒良心的話。市民明明沒有「選」擇，不過蓋個橡皮圖章吧。你支持她在選舉這件莊嚴大事上以假亂真，就是獎勵瞞心昧己、剝削愚弄市民的腐敗官。



整件事還有一個環節令人失望，就是社會賢達並無力指假普選的荒謬之處。他們不少已放棄良知理性，只會對中共投懷送抱，只懂說中共給我甚麼，我都要，它船堅炮利嘛，它就是要欺凌，我也只有聽話。這些人不問邏輯，只論強權。對這類沒有腦袋、沒有尊嚴、趨炎附勢的軀殼，還可以有甚麼寄望和尊重？李兆基、鄭家純等大款也許不解為何今天的市民不崇尚富豪，但贏得人們尊敬的不是錢，而是智慧、人格和良知，那與仇不仇富沒有關係。他們如想贏得最基本的尊重，請先說幾句人說的話，那大家才會開始把他們當是人。

雨後春筍的專業人士組織應運動而湧現

本刊資料室

組織名稱

- 一，良心理政
- 二，前線科技人員
- 三，杏林覺醒
- 四，進步教師同盟
- 五，護士政改關注組
- 六，法政匯思
- 七，放射良心
- 八，思政築覺
- 九，IT呼聲
- 十，社工復興運動
- 十一，精算思政

組成人士

- 心理學家
IT界別
醫學界
教育界由教協中不同意見人士組成
護士界
法律界
X光及化療人士
建築師
IT
社工界
精算師

以上組織都是反政改而成立的。



長毛再拉布，力揭議會的不堪(轉載)

梁國雄(長毛)

時已夜深，明日政改方案即將上台，拉布戰也將揭幕。經曾鈺成無理發狂剪掉3000條修正案後，已預定大約100小時辯論，法案毫無疑問將會在六月前表決（除非有議員缺席造成流會，但曾鈺成亦可縮減辯論時間來替他們補牢），換言之，以所謂拉布阻礙《預算案》已不能成功，由於群眾未有集氣，相信不會有大型群眾運動，結果《預算案》也會無礙獲得通過。

至此，為甚麼我們還要堅持積極發言「鳩拉」呢？第一，時間換空間，從來也是這樣說，要是民主派不把握每個機會，借用議會平台宣講理念，我們還可憑藉甚麼平台呢？有的，就是搞群眾運動；可是，運動不搞，議會無言，那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主義！第二，兌現承諾，實踐「全面不合作運動」，振奮傘者士氣，動員抗爭者到地區，同時練兵，增強實力。

我特意再次觀看長毛上年《預算案》的最終發言，真的感人肺腑。一個五十八歲就快成為長者之人，朝九晚十不停發言，坦然承認失敗，而且今年再接再厲。如果今年連我都說不要搞，那就太對不起這位老人家了。每年《預算案》，我都會為長毛找出建制派從前就全民養老金的講法，下面有兩段連結影片，就讓長毛盡情發揮，直指保皇黨一變再變，背棄自己，背叛選民，非常好看。

我無能，未有能力給予政府巨大壓逼力去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但經多次拉布，逼得政府要找周永新做研究，更終於要為退休保障制度撥出500億，這是一點點我們拉布得到的成果。但我們不會自滿，但願大家支持拉布，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反對第三跑。請你們答應我，將一段段我們的發言宣傳開去，讓更多更多香港人知道議會的醜惡，知道應該要爭取甚麼，知道要用行動來取代嘴炮，一步一步，進逼特區政府。

P.S. 對於拉布，我又有新招，如果長毛力氣許可，下年我們一定又再捲土重來，大家將會再看見曾鈺成再搬龍門，再一次在香港議會史上留多一點污漬；另外，除感謝長毛以外，還要感謝人民力量大嚟和慢必兩位議員的努力，為我們拉布定好基礎，兩條腿走路，雞蛋兩處放，戰術得宜。我們渺小，實力未夠，但我們會不斷努力，壯大聲威。兩年前還有很多人罵拉布，我們頂住了；今年，我相信有更多更多人支持，將來，我們就可以再行多一步了，我會繼續來的，放心。



《給曾俊華司長的一封信》(轉載)

陳德章

【陳德章獄中問財爺：長者生活要有尊嚴，你能聽到嗎？】

社民連秘書長陳德章因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向梁振英財爺掙蛋案，被囚三星期。

他在獄中質問曾俊華：「閣下身為財政司司長，何時才會切實為香港人設立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我在獄中已有一個星期了，起初確實有點不習慣，但慢慢開始適應，而監獄的狀況更令我深切體會到社會不同問題的嚴重性，尤以長者貧窮問題最為逼切。

從當天的行動到走進監獄的一天，我只想向社會大眾及特區政府包括司長閣下表達清楚明確的信息，就是「香港需要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選」！第一天到達荔枝角收押所，身邊有不少都是上年紀的在囚人士，絕大多數都是觸犯輕微罪行，如盜竊罪或走水貨等。從他們的罪行及性質，反映現時香港長者貧窮非常嚴重，這些長者並非十惡不赦的犯罪份子，只是不能解決生活問題才鋌而走險。我不是要合理化這些犯罪行為，而是希望從現實的角度突顯在香港這個繁華都市背後，長者貧窮問題已是如斯嚴重。

在獄中，我沒有電腦，未能提供清楚的數字，只能透過依稀的印象，記得在香港長者中，大約是三個老人一個貧。這個現實向閣下和社會大眾反映清晰響亮的信息，就是香港長者活得很沒有尊嚴。閣下身為財政司司長，何時才會切實為香港人設立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呢？

社民連在議會《財政預算案》拉布三年，我亦不惜付上個人自由，只想表達我們要公義，長者生活要有尊嚴，你能聽到嗎？過往在議會中，長毛向你表達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時，閣下叫他

「行開啲啦！」；面對我的雞蛋，閣下只是向記者微笑回答：「醫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閣下可能覺得自己很富幽默感，但我感到閣下並沒有認真聆聽我們的訴求和看看社會的現況。我只能佩服閣下的巧舌把無比空洞的說話說得頭頭是道，僅只如此。今後，我再不會說當天的雞蛋是誤中副車，因為閣下只是擁有較梁振英具觀眾緣的外表，卻同樣對香港未來發展及長遠政策未有任何建樹，蛋無虛發，司長受之當然！

前天，媽媽來監獄探望我，心裏難受，她說：「衰仔，由小學著緊你的學業，升上英皇書院，又供你到美國讀一所不錯的大學，到現在碩士了，再到今天監獄來看你，媽媽很心痛！但我無怪你，因為我知你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為社會做事。既然你選擇這條路，就一定一定要堅持走到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像媽媽口中所說要堅持走到底，我只知道即使今天走進監獄，也是無悔無恨，出獄後定會再透過一切可行的方式，向社會及政府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及全民普選制度，克盡己任，百折不撓！

陳德章 於塘福
2015年5月6日



立即釋放高瑜、浦志強及所有異議人士！

張開



中國著名女記者高瑜和維權律師浦志強、唐荊陵、陸績等大批人士，都在中央收緊新聞自由加強鎮壓的政策下，先後被拘捕、扣押、判刑，高瑜更被重判7年監禁，再一次彰顯出中共製造的冤假錯案層出不窮！

就高瑜來說，她被控「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實在是「莫須有」的，被指為「境外」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早已明確聲明從未從高瑜處得到控方所指稱的9號文件，「中共的指控不符合事實。」據說她曾承認有罪，那也是在被威嚇要對她兒子趙萌不利的高壓之下才被迫承認的。而所稱的「國家秘密」只是指中共中央所發出的「七不講」，這其實早已經在全國各大學課堂上公開推行的。

高瑜畢生從事新聞工作，客觀如實地報道事實真相，這是她的職責，控告她「洩密」而非「造謠」，証明她的報道是真實的。但這卻

不能見容於當權者。她在1989年學運期間積極報道學生運動，6月3日即首次被捕，次年8月獲釋；1993年第二次被捕，北京中級法院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99年2月獲准保外就醫，繼續為香港和海外中文媒體撰寫大量涉及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動向的文章，顯示暴政壓迫並不能使她馴服，反而更加堅強。這一次(第3次)，她更以古稀之年陷入冤獄，被重判服刑7年，但她仍要利用法定的新聞自由等權利，向法院起訴，儘管法院、法律、法官都是維護當權者，為之服務的！

再以浦志強等維權律師來說，他們的職責是律師工作，要維護人民所應享有的法定權利，特別要為嚴刑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無辜受害者申訴、辯護。浦志強於去年被拘留一年後，北京市檢察院日前正式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罪名，起訴浦志強。浦志強的律師堅持，浦志強透過微博發表意見無罪，將就此案作無罪辯護。控方指浦「煽動民族仇恨」的主要證據是他所發的30多條微博，包括「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昆明事件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兇殘

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引自今年5月16日《明報》)以這樣的言論就構成犯罪，那真正是俗語所說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顯示出中國人民今天的言論自由是完全被剝奪了的。

浦志強在八九學運時，曾身掛「辦報自由，結社自由」的布條遊行，參與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他是在一次六四25周年紀念研討會3日後被當局拘留，再被起訴的。這反映出當局是故意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顯然是政治迫害。

中國今天的「法治」已蕩然無存。因此，高瑜手寫的「上訴書」直斥當局的有法不依，提出其上訴理由是：「定罪、理據、量刑均踐踏司法公正程序。」

去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出依法治國的決定，卻繼續堅持黨領導法治，亦即繼續是黨大於法，依黨領導人意志決定一切，而非依法治國。

對此，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便有明確的斷言：他在今年4月23日會見三個日裔專家時，答覆福山的詢問「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法治)』，並司法獨立」時，王岐山馬上回應：「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引自5月14日《蘋果日報》李平的《盡論中國》)(有關中共「依法治國」決定，筆者已有過專文加以評論，刊在《十月評論》上期即總第237期內)。

這樣，中國的當權者便可以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無法無天，任意妄為，使人民沒有法律保護，飽受壓迫苦難，以致冤假錯案不斷發

生。這結果，勢必激發人民許多反抗，以保衛或爭回被剝奪了的權益，同時爭取釋放高瑜、浦志強等所有無辜繫獄人士！

06/06/2015



後記：

上文寫好後兩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即發表《201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其中第二項是人身權利，說要「重視被追訴人、被羈者和罪犯的人身權利保障。」現在高瑜、浦志強及所有被羈的異議人士，就應得到這種人身權利保障，中國當局的上引宣示必須加以兌現，立即無罪釋放他們！

2015年6月10日

在內外交困中發佈的《國家安全法》 軍行

習近平上台後，一身兼全國黨政軍九大部門的最高權力，當局收緊政治、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敢言的《南方周末報系》、21世紀經濟報道及《南方都市報》都被改組，發出「七不(許)講」及新聞採訪受限制等禁令，同時領導人大常委會起草及審議《國家安全法》(下稱國安法)，即將在今年7月初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行。本文根據常委會公布的草案和《文匯報》的轉述加以評論。

國安法在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部份居於首位的是：國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但實際情況卻是，在中共領導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中共實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起，已經逐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至於馬列主義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則從未在中共領導下進行過，有的只是一黨官僚專政，毫無民主自由。

這次推行的國安法，除了表露國家面臨不夠安全的憂慮外，還涵蓋了糧食安全、意識形態和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反映出這些領域也存在不安全的威脅。這些情況，也是中共領導長期實行的錯誤政策措施所導致或加劇的。

國安法草案的第一章總則第二條列明：「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現時中國的政權會否處於「內憂外患」、內外交困的狀態呢？從實際來看，不能說是不會的。中國派軍到距離本國海岸線很遠的南沙島礁填海建築軍事基地，引起該處鄰近幾個國家的不滿和反對，在東沙和西沙各島嶼的擴建，也引起相鄰的國家，如菲律賓等的反對，美、日就乘機煽風點火，以協助對抗中國為名，製造出緊張局勢，成為中國的「外患」。

在內憂方面，一是由於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導致貧富懸殊，民眾怨憤激烈，與政權的對立加劇；二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由於大漢族主義對國內少數民族的壓迫，不容後者享有名符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更反對其分立的要求，於是引致後者的反抗，常見的是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時有出現。

上述兩方面都威脅到政權的穩定，使之有藉口大幅度增加維穩費，數額甚至高於國防軍費的開支。

草案指出：國家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健全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和金融風險防範、處置機制；健全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健全國家糧食安全預警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宣傳，掌握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防範和抵禦不良文化的滲透；建設國家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加強網絡管理，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等等。

這顯示國安法是包羅萬有，無所不管的，囊括日常生活文化，意圖箝制及剝奪人民知情權，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為基礎的《約翰尼斯堡原則》，給新聞工作者報道增添重大壓力；同時，又企圖剝奪人民使用科學成果的網絡的知情權等，加強管控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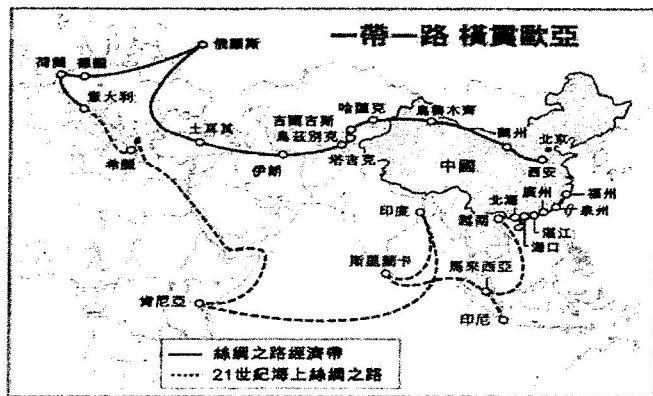
草案同時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共同義務和責任。

因此，香港記者協會、國際記者聯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於今年6月3日就國安法草案向人大提交建議書，要求按照國際條約刪去侵犯人權的內容，保障新聞自由，同時刪除涉及香港部份，因為《基本法》已有相關的規定，應專重一國兩制精神。我們完全贊同這三個記者組織的意見和要求。

2015年6月20

試評「一帶一路」的願景和行動

劉山青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發表主旨演講《邁向命運共同體 開創亞洲新未來》。它是一高規格的演講。其主旨是讓中亞、南亞、西亞國家與中國形成命運共同體，其最終話事權是中共。《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見證。

國務院同時發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和行動》。文章指出：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東亞經濟圈，一頭是歐洲經濟圈。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為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合作重點

工程項目是輸油、輸氣管道、跨境電力與輸電、跨境光纜。

貿易合作是建立自由貿易區、“單一視窗”邊境口岸通關。

投資領域包括農林牧漁業、海水養殖、遠洋漁業、環保產業、金屬礦業、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

資金融通包括沿線國家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和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

文化合作包括中國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

旅遊合作包括海上絲綢之路郵輪旅遊。作為回饋，中國當然答允促進沿線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改善。

中國各地方開放態勢

西北、東北地區

完善黑龍江對俄鐵路通道和區域鐵路網，以及黑龍江、吉林、遼寧與俄遠東地區陸海聯運合作，推進構建北京—莫斯科歐亞走廊。

西南地區

發揮雲南區位優勢，打造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高地，推進西藏與尼泊爾等國家邊境貿易和旅遊文化合作。

沿海和港澳臺地區

利用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環渤海，加快推進上海自貿區；支援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路核心區；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強化上海、廣州等國際樞紐機場功能；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作用，為臺灣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

中國積極行動

推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發起設立絲路基金。推動銀行卡清算機構開展跨境清算業務和支付機構開展跨境支付業務。

實際措施

可見，一帶一路相當進取。從《願景與行動》中看到，中央的重點是上海自貿區、福建核心區、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

建平潭；上海、廣州等國際機場。香港則作為對臺灣統戰的角色，香港的投資者資金將可大量投入內地的絲綢之路地區。

為要落實這個願景，北京開始行動，首先是撥500億美元，成立「一帶一路」基金。

再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胡懷邦在海南博鰲論壇透露，中國政府已為「一帶一路」做好了花8,000億美元（約6.2萬億港元）的打算。此為官方首次披露「一帶一路」的花費打算，為習近平掌政以來北京最大手筆的對外投資，超過7年前胡溫時代投4億人民幣谷內需的投資。

國開行是中國政府專責涉國家經濟命脈重大政策投資銀行。胡懷邦指，國開行針對「一帶一路」已建立項目庫，涉64個國家約900個項目，投資金額逾8,000億美元。「一帶一路」是北京搭建經中亞、中東、南海、南亞通向歐洲的經濟發展帶，體現中國要與美國爭世界貿易霸主地位的戰略。（引自3月30日《蘋果日報》）這就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相對立，甚至相抗衡。

為了推進「一帶一路」的計劃，把龐大的資金產業剩餘價值，並擴散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習近平在訪問歐亞三國時，就提供俄羅斯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貸款，與白俄羅斯簽訂了總額35億美元的貸款協議；又簽署了逾50項合約，總值超過400億美元。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今年4月1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今年首季度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25.6億美元，佔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9.9%，其中對新加坡、印尼、老撾等的投資規模位居前三名。沈丹陽亦指出，首季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增長10%，大幅領先整體出口增速，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28%。

習近平在最近對巴基斯坦的訪問中，宣佈啟動了總額46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包括巴國的鐵路改造、建設發電廠等。美國托列多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亞洲研究所主任張欣撰文直言：「中
十月評論 2015年第1期

巴經濟走廊將是令中國納稅人恐懼的深淵。而首倡「復興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的學者亦提醒，要防止這項國家戰略淪為「爛尾工程」。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華南代表處秘書長陳思預言，國際上將此當笑話看，投入那麼巨大資金的風險極大，很快就會遭到反華激進宗教團體的攻擊——巴國當局根本無法維護人員安全，導致該項目最終爛尾。（引自今年4月27日《明報》）

以上的學者、專家評論和估計會否不幸言中，且待未來的發展證明吧！筆者相信，他們比較客觀公正，素有研究，不會故作危言聳聽，到頭來所作評估證明錯誤，致損自己聲譽的。



從實況檢視中國的人權進展白皮書

張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本月8日發表《201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從發展權利、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公正審判權、少數民族權利、婦女和兒童老人權利、殘疾人權利、環境權利、對外交流與合作9個方面，闡述中國人權事業取得的新成就。本文現根據在此間所獲悉的有關上述各方面資料，檢視中國人民在2014年人權如已取得的新成就後，有無得到人權保障的實際情況。

發展和人身權利

第一是發展權利方面，《文匯報》列出白皮書的指稱，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比上年實際增長6.8%和9.2%，但卻不指出；由於中共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據國家發改委今年5月13日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內地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收入最高的20%家庭年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19倍左右。也就是說，收入最高家庭群體與收入最低家庭群體差距達18倍。

兩極分化的其中一極是極少數人財富迅速劇增，瑞銀與羅兵咸永道於今年5月26日發表2015年億萬富豪報告，瑞銀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劉昌欣指，過去5年的資料顯示，財富創造由美國漸轉移至亞洲，特別是中國，他指，今年第一季內地每周就誕生一名新億萬富豪，共約224至300位。(1)可投資資產總規模達37萬億元。

另一極是無數淪於窮困的貧民。據報道：中國現時約有超過1億貧窮人口。人民已沒享有舊日的公共醫療福利，而需要自己謀生解決，

百物日益騰貴，尤其是醫藥費飆升，有病也難得到醫治。國家發改委在5月5日宣布，由下月1日起將取消絕大部份藥品由政府定價，改由市場決定。這將使藥品價格任意增加，病人更須付出高昂藥費。

在醫療費猛增的衝擊下，例如重慶市就有逾百病人及家屬曾一度衝擊重慶市委辦公樓，以表抗議。而在2015年，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已近1億人(2)，他們大都難以得到醫療救治，多數要在憂鬱、失眠、焦躁中度其餘生了。

中共在多年前曾強調人民的生存權是最重要的人權，藉以貶低民主自由等人權的重要性。現在，廣大人民在生病而難得到醫治以保持健康生命的威脅下，這項最重要的人權也難保有了！

第二是人身權利方面：「強化食品安全監管，完善生產安全法律制度，打擊恐怖主義活動，重視被追訴人，被羈者和罪犯的人身權利保障。」(3)

其實，人身權利應該不只是上引這些，而應統言之為「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權利」(4)，在現時的中國，人身自由與安全權利完全得不到保障，人民動輒被拘禁、酷刑迫供，控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冤獄，冤假錯案層出不窮：——這許多踐踏人權情況，自新中國立國後不久，便連續出現，在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時期，冤假錯案數量更是驚人，不但黨外異議人士慘遭清算，就連黨內大批不同派系「同志」也難逃過被批鬥立案浩劫，人身權利在全中國蕩然無存。

現時的情況雖沒有當年那樣瘋狂，但就以人身權利來說，中國人民實際上往往仍被侵奪

了，尤其是為了維護人民應享權利而挺身作辯的維權律師和不同政見人士，最新的是唐荊陵、王清瑩、袁新亭三位律師被拘留，被控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審。這樣，許多維權律師的人身安全也被剝奪了。

在今年三八婦女節期間，多名女權人士，比如鄭楚然、李婷婷、魏婷婷、武嶸榮、王文等「女權五姊妹」，只因計劃舉辦反性騷擾宣傳活動，便被拘禁，人身安全權利毫無保障。她們的女權中心也因不堪打壓而關閉。

大量不斷湧現的事實充分證明「人權事業新進展」中的許多假大空話。

民主和公正審判權利

第三是民主權利，《文匯報》所列出的亮點首項是：設立國家憲法日。

但在憲法日，武漢的王芳去「証驗一下是否按憲法行事，有沒有自由和人權，結果走着走着就被帶上警車了。」(5)

北京人權活動家胡佳在軟禁中度過憲法日，他在網上寫道：「任何一個中國公民，只要今天他／她在北京城區街道上舉牌寫有『憲政』、『民主』、『自由』，立即就會受到警察的抓捕。黨權如天，民意似土，這是中國大陸的真實狀態。」(6)

在中國民間，對憲法日也反應冷淡，質疑憲法是否落實，認為一日黨凌駕憲法，憲法日即純屬作秀（騷）。(7)

《文匯報》所誇耀的另一民主權利是：「網民規模達6.5億，網絡成為獲取信息和表達意見的場所」；卻忘記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去年6月18日發出通知，要求各新聞機構對旗下分社和部門，禁止跨行業，跨領域採訪報道，禁止新聞記者和分社未經本單位同意私自開展批評報道。最近，9部委聯合公開通報，對敢言

十月評論 2015年第1期

的21世紀網被責令停辦，《理財周報》被吊銷出版許可証，發行量最大和最具影響力的《21世紀經濟報道》被責令整頓；這些都是新聞、出版民主權利受壓制的新事例。

「無國界記者」在2014年12月16日發布的2014年度報告顯示，中國內地依然是全球囚禁記者和網絡媒體人最多的國家，在新聞自由和記者境遇方面變得更糟。報告指出，2014年，中國內地共有107名職業及公民記者被監禁，佔全球總數的30%左右。其中，中國監禁的職業記者29名，佔全球被關押職業記者的17%；同時，還有78名公民記者被關押，佔全球總數的44%。報告特別提到內地著名獨立記者高瑜的案件。

(8)

據《明報》報道，中國共青團中央在全國招募逾千萬名「青年網絡文明志願者」，要求他們在網絡上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積極舉報。此項工作被各級團委列為重中之重，每個地級市和高校都要配合提交人數。活動搞手之一，正是被稱為總書記習近平前「紅人」的國信辦主任魯煒。有維權人士批評指，此活動無異於動用「五毛」，在網上為政府唱讚歌，並圍攻批評政府的聲音。(9)

第4是公正審判權，《文匯報》所歸納的成就是：各級人民法院審結國家賠償案件2,708件，決定賠償金額1.1億元人民幣，多宗重大刑事冤假錯案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得到糾正。

可是，重大刑事冤假錯案何只「多宗」，還有無數冤假錯案為什麼至今仍不肯「公正」地翻案改正？大量含冤受屈的人（包括無辜繫獄的維權律師和不同政見人士）仍在黑獄中受苦受難，度日如年，沒有得到「公正審判」，正苦等昭雪。此外，還有許多人仍在拘禁中，亟待宣布無罪釋放，重過得見天日生活（例如：唐荊陵、王清瑩、袁新亭三位維權律師）。

在中國大陸，遭到不公正審判，只憑長官

命令而冤枉投入黑獄的案件實在數不勝數，新近可見的例如劉曉波，只因起草《07憲章》，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便被判刑11年，連「禍不及妻兒」的明訓也公然違反，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也遭軟禁。又如許多維權律師等人，他們的罪名也是莫須有的，並無犯罪真確證據，但正如諺語所說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浦志強律師的妻子孟群，在去年12月18日便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公開信，指出對其丈夫指控的四項罪是「莫須有」的，要求立即讓他回家；可是，有多病纏身的浦志強仍被重判入獄。如果真是有公正審判權，那就應該據實翻案。但直到現在，這句「公正審判權」仍只是空口講大話。不日審結的唐荊陵等人案件，也將會再作證明。

少數民族與婦孺老人權利

第5是少數民族權利：舉出的證據是經濟快速發展，西藏現有許多活佛。但經濟發展，一般低下階層生活能得到大改善嗎？從前面詳述的其他富裕省份尚且會產生廣大窮人看來，偏遠貧瘠的山區貧民又怎能出現不同的結果？！

即以宗教自由來說，只靠封了358名聽話的人為活佛，便可代表其他如信奉佛教等人民的信仰自由嗎？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權利，最重要而且要求強烈的，是少數民族的真正自治權甚至分立權。一直以來他們所得到的「自治權」都是在大漢族主義的漢族幹部管控之下行使的，虛有其自治之名。在這些大漢族主義者統治之下，少數民族人民久受經濟剝削，政治壓迫之苦，總想脫離漢族幹部的羈絆，渴求得到隣近民族那樣的分立權利，他們在蘇維埃聯邦內和洽相處，不受大民族的壓迫。但在中國大漢族主義者的經濟搾取與欺凌高壓下，維吾爾族、藏族等少數民族人民便被迫要用行動來反抗，很多時會出現個別份子的暴力恐怖行動，中國

的軍警予以還擊，於是造成流血衝突。

中國當局不但在政治上嚴格限制少數民族的自由人權，甚至連個人的留鬍子和衣着的自由也嚴加限制，違反者便被重罰。例如，今年3月30日《明報》便有如下的專訊報道一宗案例：

新疆喀什38歲維吾爾人因留大鬍子，且教唆妻子戴面紗、穿蒙面罩袍。村幹部多次對夫婦二人勸導無果，被喀什市檢察院公訴。喀什市法院指其無視國法，在公共場合留大鬍子，不服從執法管理，鼓勵其妻子戴面紗、穿蒙面罩袍，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判監禁6年，其妻則被判監禁2年。有關案件引爆網絡，網民批評當局以公民個人穿戴自由入罪過於苛刻。

第6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權利。《文匯報》列出的成果是：「審結拐賣婦兒、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宗；愛滋病母嬰傳播率下降至6.3%。全國城鄉居家養老服務覆蓋率達到70%。即使認同這些是事實，但婦兒和老人的權利並不只是這些，而全國城鄉居家養老服務率，即使已達到70%，他們基本上解除了生活的問題，但意味有30%，即全國仍有約4億人未有這種服務，生活困難堪憂。

在婦女權利方面，中國至今仍未達到男女平等，上面談及的女權五姊妹成立的「杭州蔚之鳴中心」，才需要提倡男女平等，一直推動婦女平等就業，防止性騷擾，反對虐打婦女等，並在浙江省首宗性別歧視訴訟案中，協助女大學生黃蓉勝訴。這個公益組織雖然被當局打壓而關閉了，武嶸嶸在聲明中表示，她們會繼續為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奮鬥。這反映出婦女的這些應有權制仍未完全實現。

至於兒童的權利方面，實際上仍未得到國家和社會的切實保障，這顯露在報章透露出來的許多事例中。以下是其中的多宗悲劇：

其一是貴州省畢節縣市4名窮小兄妹自殺：他們因沒有生活費輟學在家，家裏唯一食物是去年的玉米，但不久已吃光。他們從小遭受家暴，大的被父親打到左手臂骨折，右耳朵撕裂，其父後來拋開他們到城裏了，母親也在外謀生，他們在飢餓無依中實行服毒自殺，老大遺書說：「該走了！」事件發生在今年6月9日。

該市3年前亦發生過5名留守兒童取暖窒息死於垃圾箱事件，而人民網今年3月報道，全國農村有留守兒童6千萬之多。

今年3月3日，山東荷澤市巨野6歲小孩在街上撿到一支棒棒糖，咀嚼後即七孔流血死亡。

中國農村社會低層兒童悲歌不斷！繼貴州4個兒童服毒死亡引起全國譁然之際，湖南再有一對分別14及8歲的小姐妹中毒身亡，原因據說是在垃圾堆中覓食時吃到鼠藥。另外在四川南充，一名13歲留守女童在失蹤多日後，被發現神志不清躺在廢棄小屋，下身赤裸，頭部傷口已長蛆。這些兒童的遭遇繪出一個社會階層的縮影，給所謂千年一遇的盛世一記響亮耳光！

鑑於許多孤兒無依無靠，社會福利又缺乏，河北省一位慈善富婆在19年間收養了75個孤兒，以致她的巨額存款逐漸用完，還要欠債200多萬元，難以為繼。(10)

社會上雖然設立了一些救助站，但辦理得很差，例如，河南固始縣民政局在該縣洪埠鄉馬埠村的救助站，收留了20幾個流浪人士，包括兩名孩子。但給人拍攝得流浪人裹着被子睡在鋪着一層薄薄的稻草的水泥地上，蜷成一團，有的人身上到處是凍瘡，孩子則栓在樹上。相關圖文於去年12月17日在網絡上廣傳，內地網民反應強烈：紛紛表示：「這裡的流浪人員生活得還不如小豬小狗。」「天朝能動用飛機軍艦為八杆子打不着的馬爾代夫送純淨水，卻不肯管自個兒百姓死活」，「以人為本，大愛為疆，真不要臉，侮辱了這八個字。」(11)

婦女、兒童既難「幼有所依」，老年人也更難「老有所養」了！在農村，家庭條件較好的，老人可被送至養老院，（但去年5月25日河南魯山養老院大火燒死38名長者，揭露出老人院存在的嚴重問題。）家庭條件不好的則即使70多歲高齡仍需在田間勞作，用粗茶淡飯生活。近幾年，農村老人自殺，孤死家中的事件時有曝光。國家雖數度頒文重視農村養老問題，但卻執行乏力。據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張超雄教授負責的課題組所作的報告顯示，超過68.4%的受訪農村老人主要靠子女資助生活，其次是新農保和土地收入，54.6%的農村老人，還在務農勞動。(12)

現時在內地，遺棄老人的事屢見不鮮，例如，江蘇邳州市一名60多歲老婦今年5月26日被遺棄荒野，活活等死，數天後發現被送院搶救終不治，內地學者章立凡直指「這是野蠻社會才會出現的事」，章立凡直斥中國政府多年來把大筆金錢到國外投資，但不顧國內人民，虧欠為中國經濟打拼的內地長者。(13)

還有一位103歲老人耿生茂身穿破舊上衣，撐着木棍，在鄭州街頭行乞養兒。(14)這是對中共宣稱中國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極大諷刺，揭露出今天中國缺乏人權保障的冰山一角。

殘疾人和環境等權利

白皮書第七是殘疾人權利：《文匯報》只列出：建立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專項制度，高考提供盲人考卷，電子考卷。而白皮書則較為詳細敘述國家給予的許多措施去幫助他們，但這些措施將來有多少能夠落實，卻是很成疑問的。過往的經驗告訴大眾，許多政令都不能得到地方官員切實執行，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是不了了之，因此，殘疾人士很少得到人權保護是可預料的。

至於要建立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事項服務，

卻只限於「重度」的，而中度和輕度的卻不能享有，這是有欠公允的。

由於身體上的殘缺，一般殘疾人比健全的人更難於找到工作機會謀生，生活會更加困苦；這是可以想像的。國家必須在這方面負責照顧他們，而不只是在考卷，試卷方面提供技術上的方便。

第八是環境權利：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完成了鋼鐵、水泥15個重點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年度任務。白皮書詳細列出國家對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強化了政府和企業的環保責任，明確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又列出綠色生態建設取得的新進展，節能減排的成效顯著。節能減少排出廢氣多少受着國際上的監督。政府這些措施能夠落實、收效多少，也要以後的事實證明。白皮書稱：環境保護部對未履行環境保護職責或履行職責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負責人，依法進行告誡談話，並督促整改到位，對環境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加大。

在現實生活中，在環境污染霧霾嚴重的省份，人民都飽受空氣和水資源等被污染之害，外出要戴着口罩，不能吸入新鮮空氣，被剝奪了享有天然應有的權利，這主要是企業並不理環境清潔而製造出污濁空氣，以及有關當局不負責、不作為的結果。

由此導致各地民眾要以行動去爭取環境的改善。例如，今年「一群關注霧霾危害的母親」在網上發起3月8日在全國各地政府門口，舉起「霧霾致癌人人受害」、「治理霧霾政府有責」等標語牌舉行「口罩集會」。在該日，陝西西安市網友在省政府門口、商業區舉牌抗議政府面對污染不作為，江西寧都、四川樂山、廣東東莞等地都有網友響應。西安的活動發起人「無眠」與參與者張輝都被拘捕。

此前，前央視主播柴靜的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在內地互聯網廣泛傳播並引發

人們對霧霾、環保問題的廣泛探討，而幾天之後該片火速遭當局下令封殺，但某種程度上仍促發這次有關霧霾的「茉莉花革命」式的口罩集會(15)。

上舉的實例，只是冰山一角，相信還有不少是已經發生了的。

白皮書第九是對外交流與合作。內文首先指稱：2014年，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在聯合國人權機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人權事業健康發展。

但中國在1982年成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成員國，隨後又在幾個人權公約上簽過字以後，在實際措施和行動上，中國政府並沒有表現出是在履行其應盡的責任，反而繼續以其橫暴的行動違反人權公約保障人權的明文規定。直到今天，正如本文上面陳述的，當局仍然沒有保障中國人民理應享有的人權自由。中國政府為了討好聯合國其他成員，在現時這份白皮書中特別作出「承諾於2014年至2017年向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大幅增加捐款」，企圖以銀彈政策，影響聯合國人員對其不願履行人權公約的觀察和批評。但客觀事實俱在，是抵賴和抹殺不了的！

2015年6月28日

註釋：

- (1) 詳見 2015 年 5 月 27 日《文滙報》。
- (2) 詳見 2015 年 6 月 18 日《文滙報》。
- (3) 引自 6 月 9 日《文滙報》摘錄。
- (4) 《世界人權宣言》第 3 條，刊於中國圖書刊行社出版的《人權宣言》第 19 頁。
- (5) (6) (7) 均引自 2014 年 12 月 5 日《蘋果日報》。
- (8) 2014 年 12 月 18 日《明報》。
- (9) 4 月 7 日《明報》。
- (10) 6 月 14 日《文滙報》。
- (11) 詳見去年 12 月 18 日《明報》。
- (12) 詳見今年 6 月 15 日《明報》。
- (13) 引自今年 3 月 28 日《蘋果日報》。
- (14) 詳見今年 6 月 11 日《明報》。
- (15) 引自今年 3 月 10 日《明報》。

福島災難四年後，印度鞭打一匹核能死馬

普拉夫爾·比德維(2015 年 3 月 21 日)

本文清楚地評述了印度媒體的狀態，這些媒體的大多數都掩蓋了福島核災難依然持續的真相，到3月11日，福島核災難已經滿四周年了。同一媒體卻迫不及待地報導印度政府將在2020 - 21年增加國內核能發電能力兩倍的計劃，報導在奧巴馬最近訪問印度的期間，關於核責任問題取得的“突破”。

在現實中，沒有任何突破——只有空空妙手——用行政備忘錄代替冗長辯論後立法頒佈的相應法律。這一招，刻意以印度的公共利益為代價，討好美國的核供應商，有悖議會的意圖。但它還是無用。只要存在責任因素，現在被日本資本控制的西屋公司和通用電氣，都不大可能向印度出售核反應爐。

至於計劃的發電能力的三倍，那只是一個華麗承諾和低劣行事的既定模式而已：如果原子能部1967年的計劃實現的話，到2000年印度就有 43,500 兆瓦的能力；可它有的只是 2,700 兆瓦！三倍的假定意味著 19座反應堆將在六年裏開建並完工，而全球的平均施工時間是10年。要進口八個反應堆，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像承包傑塔普（Jaitapur）核電廠反應堆的“核電巨頭”阿海瑤（Areva）這樣的公司，都瀕臨破產。

更重要的是，從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以來，印度政策的制定者和設計者，脫離現實，癡迷於核技術。與寵物神話相反，核電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地萎縮。其在全球的發電份額，從1996年17.6%的峰值下降到 10.8%。其對世界商業化能源生產的貢獻，已從 1984年的 4.5%的槽糕點，跌至新的槽糕低點（4.4%）。

2002 年全球範圍內運營的核反應爐達到 438座的頂點。目前是 390座。[1] 幾十年來，未見有重大的核技術革新：170座反應堆（總數的 44%）已使用了30年或30年以上。但只有十月評論 2015年第1期

65座新的反應堆在興建，比一年前少了4座。十多年來，核反應爐資本的費用上漲了一倍。在一些國家，三年裏，經營成本上漲了16%，而可再生的風力發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每個月都變得更便宜。

福島核難，世界上最嚴重核事故[2]，可能敲響了全球核電業的喪鐘。它殘酷地暴露了甚至發達社會也負擔不起的核風險，使得核能到處都不被接受。2014年，在日本沒有核反應爐發電——自 1963 年以來的第一次。福島清理需要四十幾年時間，而費用高達\$2000億。沒有銀行或保險公司支持核電——除非有資本主義政府的特權補貼。

因為印度一般的國內安全紀錄（本身極為惡劣）情況，還有其高昂的成本——傑塔普（Jaitapur）核電廠發電成本為每度電15盧比，還有破產的馬哈拉施特拉消費者——以及它所面臨的各處的普遍反對，擴大核能發電將是印度犯的歷史性錯誤。普遍的反對將是各處核活動的最大障礙：它直接針對公眾挖坑建核設施，引發嚴重的關於決策的民主性問題，因為這些決策關係到能源、人民的需要和否決他們認為不安全專案的權力。

核電沒有什麼必要——風能和太陽能每年在全球以高於25% 和 40%的速度增長，其發電成本接近基於天然氣或煤的電力，而且它們的模組化和靈活性使其有無與倫比的多功能性。

註

[1]

www.worldnuclearreport.org/World-Nu...

[2] <http://gu.com/p/46fjj/sbl>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聲明

第四國際(2015年3月2日)



以下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聲明，於2015年2月24日在阿姆斯特丹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上通過。

形勢

1)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2014年的特點是過去20年運動的深化。以色列加強了其對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的控制。猶太人定居點的建設在繼續並加快了速度。對巴勒斯坦人的鎮壓沒有間斷，並伴有經常性的、針對性強而極端暴力的軍事攻擊，這種攻擊，在2014年夏季對加沙地帶的最新血腥行動中，達到了一個新的程度。由於以色列社會與政治激進右傾化，對巴勒斯坦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絞殺仍在繼續。

2) 在1993-94年奧斯陸協定之前，這些動態就已經顯示了出來。長期徵用巴勒斯坦土地和進行種族清洗，這個過程中已經進行了很久，在不同的關頭，其規模不同，節奏也不同。但今天的情況，只可以考慮採用‘巴勒斯坦自治’所做的改變。在這個期間裡，以色列對主要的巴勒斯坦人口中心的直接軍事佔領已經結束。直接佔領已由巴勒斯坦政治-行政壓制性機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取代。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巴勒斯坦以外的巴勒斯坦難民被邊緣化。

3) 和平進程，進而分配給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任務，都充斥著內在的矛盾。那意味著，以鎮壓作為後盾，通過國際援助的分發，遏制巴勒斯坦的要求。但由於缺乏任何真正的政治進展，矛盾在2000年9月爆發，爆發了第二次起義。然而這場反叛表明，面臨所謂的和平進程，廣泛的巴勒斯坦各社會階層拒絕保持沉默，因為還面臨前所未有的加速殖民化：在現實中，以色列的佔領幾乎不加掩飾地捲土重來。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中，一方面，有人主張試圖在反佔領鬥爭和同佔領當局合作之間保持令人難以置信的平衡，另一方面，有人支持勉為其難地融入殖民制度，起義進一步張顯了權力機構高層間的分裂。

4) 以色列鎮壓起義，清除逮捕數千名抵抗戰士，其中大多數來自法塔赫。這個暴力鎮壓讓巴勒斯坦領導層中最軟弱的投降派得以加強。亞西爾·阿拉法特的死亡和阿巴斯的繼任，表現了力量的新平衡。2005年以來，在阿巴斯及其新舊同事的領導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充分發揮了輔助以色列佔領軍的作用。在美國監督下

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門的重組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突出。此外，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高官，現任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總理薩拉姆·法耶茲（Salam Fayyad）推動，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加快了把巴勒斯坦經濟融入並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進程，而其要融入的主要當地代表是：以色列。雖然，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內部，仍有來自法塔赫的民族主義分支敵視與佔領者合作，但他們正變得越來越邊緣化。

5) 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在2006年立法選舉中的勝利，是巴勒斯坦社會多數人意願的一個新表達，儘管是曲折的表達，卻表明多數人拒絕服從西方國家和以色列的命令，拒絕給投降而腐敗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層任何政治支持。然而，大多數巴勒斯坦人並沒有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層與法塔赫等同起來：雖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統治者在個人選舉中失敗，但法塔赫作為一個組織，在全國黨派名單投票中獲得的百分比只是略低於哈馬斯。

6) 哈馬斯勝利後，緊接著，在加沙地帶，針對法塔赫領導人穆罕默德·哈蘭（Mohammed Dahlan）的未遂政變，哈馬斯反應的結果是完全掌控加沙地帶，儘管哈蘭有美國、埃及和以色列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但這把哈馬斯暴露在奧斯陸協議的矛盾前。哈馬斯內部有日益明顯的分歧，有人主張抵抗以色列，包括武裝抵抗——進而與阿巴斯領導層對抗——有人支持與阿巴斯領導層和解（因而與以色列‘冷和平’相處）。

7) 哈馬斯面臨的問題，同法塔赫在巴勒斯坦自治第一年面臨的問題一樣：納入佔領系統的共管結構，同時繼續反對佔領的鬥爭，兩者之間的關係緊張。到目前為止，哈馬斯已經設法維持其團結，把其微型國家機器的庇護式管理同

其保持在加沙地帶的武裝鬥爭（與其他巴勒斯坦組織一起，這些組織的知名度較高，規模較其它者更大）方向，特別是對以色列的侵略作出反應，兩相結合。這使得哈馬斯可以保持其合法性，無論是直接受益於該運動制度化（通過挪用一些微型國家機器的收入）的那些人——支援與以色列有較和平的關係——還是那些最邊緣化階層的人們（特別是在難民營），他們反對與以色列有任何形式的和平關係，在這兩者中間，哈馬斯都可以保持其合法性。

8) 這不穩定的平衡也取決於話語——巴勒斯坦伊斯蘭國家的反動烏托邦，其時空範圍仍然是有意未作具體說明的——這使得它能夠團結不同社會範疇的人，甚至其物質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人。哈馬斯沒有壟斷宗教意識形態，在巴勒斯坦政治中，這不是分裂的主線。但宗教是哈馬斯的中心，體現在運動的計畫和實踐中：婦女的邊緣化，宗教取代政治、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之間的混亂、等等。展望以後，建立讓各個巴勒斯坦抵抗派別團結鬥爭的包容性框架，這個需要是明確的，這突顯出替代哈馬斯政治領導的另一種領導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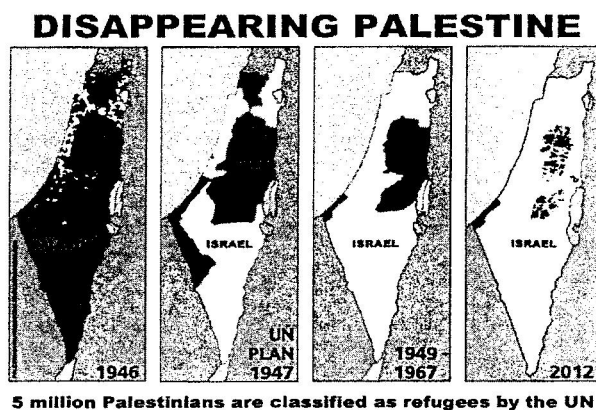
9) 巴勒斯坦左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和巴勒斯坦人民黨（PPP），和穆斯塔法·巴爾古提派（Mustafa Barghouti））今天無法形成必要的另一種選擇。主張完全（巴勒斯坦人民黨（PPP））或部分（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融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者，和主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哈馬斯與阿巴斯領導之間全民團結的人，他們是分裂的。因此，左派對和平進程的曖昧態度舉足輕重。與巴勒斯坦人民黨（PPP）不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表面上反對奧斯陸協定。但其領導人

堅持巴解組織的合法性，這使得他們的一些批評失聲。他們未能建立第三勢力，把唯一可信的反對派外衣留給了哈馬斯，先是反阿拉法特，然是反對阿巴斯。由於這種遠見的缺乏，很多左派的幹部和積極分子逐漸轉向非政府組織工作。雖然他們的工作往往必不可少，但只要它與另一個政治選擇的構建無關，它就在幫助把巴勒斯坦社會非政治化和非政府組織化。

10) 與此同時，以色列社會和政治繼續激進右傾化。最近，由種族主義、反民主的極右勢力控制的以色列政府，繼續並加速定居點、壓迫和種族清洗政策，不僅針對西岸（除去定居點）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而且還針對1967年前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中間派和中間偏左派，對這些事態的發展也有責任，他們要不參加聯合政府，要不就對這些政策保持沉默。和平運動因為轉向工黨而付出了代價。現在只有小型反殖民主義者團體正在進行鬥爭，全面反對以色列殖民主義，和團結巴勒斯坦人。不幸的是，今天，他們在以色列社會中是少數。他們面臨越來越多的，來自以色列政府和極右團體的壓迫和騷擾。

11) 整個來看，這些事態發展以及力量關係轉變得不利於巴勒斯坦人，對此要獲得充分的理解和分析的話，就要把它們置於其區域和國際背景中。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以色列國其實是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得益於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公開或間接的支持。奧巴馬政府和內塔尼亞胡政府之間存在的緊張局勢，不會對以色列有任何壓力；美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削弱了，不能與他們的以色列盟友進行公開對抗。有些國家，像巴西、土耳其或甚至中國，對以色列的政策比較關鍵，這些國家正在繼續加強他們與以色列的軍事和商業聯繫。幾個歐洲國家最近的投票，建議承認巴勒斯坦國，可能表達了對以色列暴力、傲慢自大十月評論 2015年第1期

和固執的惱怒，以色列國變得越來越明顯的孤離，但在外交的力量平衡方面，這並沒有導致任何真正的變化。阿拉伯革命的進程，提出了打破巴勒斯坦區域隔離的可能性，但正處在退卻階段，原因是，不同形式的反革命，專制政權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兩者都在興起。這一進程還沒有被擊敗，而該區域是很不穩定的，新事態的發展是可以預期的，特別是在敘利亞和埃及，它們可能對巴勒斯坦局勢產生影響。目前革命的起落，有利於以色列政府，因為阿拉伯國家之間有極端形式的競爭，以及幾個阿拉伯國家日益加強與以色列的合作：埃及、約旦、海灣國家等。同以色列所享有的廣泛有力的支持相比，巴勒斯坦人的隔離，更加突顯出國際團結的至關必要性，因為那是改變力量關係的關鍵。



任務

12) 近三年來，我們目睹了阿巴斯領導的巴勒斯坦領導層的戰術改變：它已決定直接向國際機構求助，因而部分地離開了奧斯陸協定框架的約束。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因而要求加入聯合國及其各機構分支，加入了國際刑事法院（ICC），試圖使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規定以色列軍隊從1967年佔領的領土撤離的時間表，等等。這最後一次嘗試的失敗，表明戰術轉變的局限。於是，如果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尋求把其

上訴到國際刑事法院，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國的金融制裁威脅，就籠罩著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這會癱瘓巴勒斯坦機構的運作。



13) 不過，這樣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即：這些舉措揭示出巴勒斯坦領導層日益認識到，美國監督下的和平進程和雙邊談判，已走向一條死胡同。即便如此，當時阿巴斯和他的同事並沒有明確地設想與奧斯陸協定做正式決裂。相反，他們的目標是改善與以色列的力量關係。儘管以扭曲的方式，這些舉措也反映，比例穩步增長的被占領土的巴勒斯坦人民渴望逃出和平進程的籠子，因為這個進程的每一天，都使巴勒斯坦人民族權利得以滿足的前景更遙遠。

14) 正是這種特別的認識，引導巴勒斯坦人在2005年7月發動了杯葛、撤資和制裁的民間社會呼籲。他們沒有採取長期解決辦法的立場，他們注意到談判戰略的失敗和力量的不平衡關係，因而設定的目標是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孤立以色列，直到獲得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BDS（杯葛、撤資和制裁）於是意味著擺脫雙邊談判及可接受之妥協的邏輯。其目的是要建立機制，迫使以色列改弦易轍，因為直到現在，除了實力語言，以色列一直頑固地拒絕說任何其他語言。軍事對抗是巴勒斯坦的死胡同，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打破同以色列軍事對抗的邏輯，並在國內把外部壓力與人民運動的新發展結合

起來。

15) BDS（杯葛、撤資和制裁運動）為國際聲援運動提供關鍵工具，不僅是對以色列，也對其他暗助其佔領的國家，進行譴責和加壓，還對直接或間接參與對巴勒斯坦領土做經濟剝削的大型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加以譴責和施壓。在過去的十年，尤其是緊接著2008年-2009年冬天的加沙大屠殺，BDS（杯葛、撤資和制裁運動）的國際規模取得了穩步進展。它已成為聲援運動的中心活動，在抵制和撤資的方面，贏得了一些重大的勝利。

16) 巴勒斯坦BDS（杯葛、撤資和制裁運動）的啟動，依靠的是國際聲援運動的創造力和戰術感，他們考慮每個國家可能的不同方面和適用於特定國家和區域現實的BDS運動。因此，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可以突出不同的要求，有利於對以色列可能有真正影響的要求：中止歐盟-以色列協定，立即終止埃及對加沙地帶封鎖的參與，並且開放拉法過境點、武器禁運、結束與以色列的軍事經濟合作（例如，地中海中的燃氣提取），釋放囚犯——尤其是兒童囚犯，等等。除了對戰術做適應化修改，關鍵的事情，還有拒絕在基本要求上做任何讓步，堅持BDS（杯葛、撤資和制裁運動）停止的前提是，巴勒斯坦作為一個整體，巴勒斯坦民族的權利，包括在1967年領土的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佔領以前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歷史巴勒斯坦境外流亡的巴勒斯坦難民的權利，完全得到保障。

17) 通過BDS運動，在此之外，我們應該特別強調加強不同的社會勞工運動——工會、農民運動、女權運動、LGBTI運動、人權運動、進步基督教運動等等——同其巴勒斯坦同行之間的接觸、連結和夥伴關係。這些夥伴關係直接讓巴勒斯坦人受益，打破對他們的封鎖，啟動聲援運動，使自己更深地植根於全國和區域的社

會政治運動，擴展他們的社會基礎和觀眾。反革命在該區域造成的混亂，特別加強了大批巴勒斯坦難民趨向歐洲的理由：考慮這個新的事實，應該是相關的捍衛移民及難民權利的聲援運動的當務之急。把BDS運動刑事罪化，此外，更大程度上，特別是在法國，把聲援運動刑事罪化，也是一個新的事實，在我們進行盡可能廣泛而統一的動員時，應當注意這個事實。

18) 當然，在聲援巴勒斯坦人運動內部，我們應該打擊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包括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猶太主義、拒絕與極右勢力有任何形式的協作。最近在巴黎和哥本哈根，發生猶太人民被蓄意殺害的事件，突顯出需要鬥爭，反對一切形式的以宗教或種族為基礎的誣蔑，也突顯出猶太人反佔領運動的出現和聲援運動內部網路的重要性。這意味著要發展堅持原則的聲援運動。但是，在帝國主義國家，這並不排除對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採取包容性和積極主動的態度，因為後者經常為聲援運動提供一些主要的支持依據。與此相反，聲援運動應努力或深化與代表這些群體的力量的合作，包括回教運動和基層組織，團結是可能的，只要不放棄基本原則，比如拒絕巴勒斯坦問題的任何懺悔解決法和宗教服務中的任何工具主義化的聲援。

19) 最後，是重要的是，按照巴勒斯坦左派力量的多樣性，不加任何先決條件，建立和培養與巴勒斯坦左派力量的聯繫。一方面，這種對話應集中在聯合工作的形式上，後者可能在國際聲援運動的範圍內，另一方面，對話聚焦於區域和國際範圍內反帝左派的重組，聚焦於我們能夠對這個過程所作的貢獻，尤其是在捍衛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面。在這方面，阿拉伯地區的革命左派組織舉行聯合會議和發表聲明，提供了寶貴的支援，即使我們有時可能會覺得他們不完美或代表性不足。我們的任務是樹立他們，加強他們和擴大他們，同時尊

重多元化並允許戰術分歧的存在。在聲援巴勒斯坦人的運動中，我們應該打擊把區域革命進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對立起來的任何企圖，特別要反對喚回該地區政權對巴勒斯坦人要求的歷史敵意，並強調反對以色列的鬥爭與反對政權的鬥爭是互補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和其他爭取解放的鬥爭，兩者的結合，也應特別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特別包括在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IIRE）的課堂里加以強調。

20) 在所有這些鬥爭和討論裡，我們將堅持第四國際2010年世界大會決議中的要求：以色列軍隊立即無條件地從其1967年以來佔領的領土，包括東耶路撒冷撤出；拆除自1967年建立的所有殖民點；銷毀隔離牆；釋放以色列扣押的政治犯；立即和無條件地解除對加沙的封鎖——這些是作為基於平等權利的政治解決辦法的初始步驟。我們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所有形式的鬥爭，以便獲取他們的權利：不受任何外來干預的自決權；難民回家的權利或要求賠償的權利；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權利。此外，我們重申，必須解放阿拉伯人民，必須拆除猶太複國主義國家，因為它代表服務于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項目，支持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能在一起生活的權利完全平等的政治解決方案。



根本之裂痕：阿拉伯世界的權力、財富和不平等

亞當·漢尼(2015年4月15日)

大規模起義推翻突尼斯和埃及的僵化制度，至今已四年了，可以見到的，似乎是這些運動所代表的初始希望的破滅。利比亞、敘利亞、葉門、伊拉克仍深陷血腥武裝衝突，導致數十萬人死亡，邊界一帶數百萬人無家可歸。埃及的形勢是逆轉的，軍事統治捲土重來，武力鎮壓抗議活動，估計有四萬人遭逮捕，穆巴拉克時代的壓制性結構在重建。而且，今日專制政府的統治看起來比他們過去多年的統治更牢靠。

但是，評估目前的時刻，我們需要超越戰爭、逃難和宗派主義的頭條新聞報導範圍。阿拉伯起義不是簡單地反對專制統治；他們都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停滯數十年之久的生活條件和財富權力上的深切不平等。不涉及該區域這些萎靡不振的社會經濟根源，就沒有辦法走出目前的僵局。

即使2008年-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前，阿拉伯世界就在世界眾多發展指標排名上墊底。埃及、約旦、黎巴嫩、摩洛哥、敘利亞和突尼斯的平均失業率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地區，而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最低的（不到人口的一半）。[1] 阿拉伯世界作為一個整體，青年和女性的參與率在全球的排名也墊底。[2] 此外，實際上現在就業的那些人，他們的工作，趨向於不穩定的、低工資的非正規就業；以北部非洲國家為例，那裡擁有全球增長最快的非正式行業。[3] 類似的其他統計資料有很多，可以歸納為貧窮、營養不良、文盲，還有社會條件的其他措施；二十多年以來，這些趨勢一直大致維持不變的。

解釋這些結果的關鍵，是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贊助而由阿拉伯各國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當然在速度和規模上，有很重要的變化，但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標準功能表：削減社會支出、土地和其他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放鬆勞工市場的管制，金融和貿易自

由化，等等。這些政策都聚焦於促進私營部門的增長，同時把越來越多的人轉向對市場的依賴，同時侵蝕各種形式的集體社會支援。西方國家為這些舉措鼓掌，並大加推動；事實上，阿拉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穆巴拉克的埃及，2008 年由世界銀行封為世界的"頭號改革者"。

[4]

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受損於這些政策。事實上，在幾個主要國家，日益增長的貧困水準與經濟高增長率同時出現，展示財富流動走向一些人，遠離其他人。例如，在摩洛哥、埃及、突尼斯和約旦，從2003年到2008年全球危機的爆發前，股票市場繁榮，實際人均GDP水準一直上升。[5] 關於埃及，聯合國最近對共同存在的這兩種趨勢——一邊是財富的不斷增長，而另一邊是日益嚴重的貧困——感到困惑，聲稱，這構成了一個"悖論"，是標準經濟模型的一個意外結果。[6]

然而，一旦我們拒絕關於市場運作總體正面、互惠互利的假設，所謂的悖論就消失了。隨著社會和經濟生活變得更深地植根在市場關係，在這些市場中那些最大權重者趨於受益。結果是兩極分化和不平等、並非所有人都感受到的一個均勻的下螺旋式發展（事實上，或者，一個穩定向上的爬升）。在這方面，阿拉伯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歷完全無例外；在全球各地，可以看到同樣的模式在複製。

財富和權力的兩極分化，對於剖析中東地區的專制社會根源是關鍵的。作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侍女，獨裁統治者不僅使自己及其結盟精英變得富有，而且也全力鎮壓國內對這些政策的任何反對。同時，他們作為西方政策在該地區可靠的合作伙伴，獲得的回報是收到充足的金融、政治和軍事支持。因此，問題不是簡單地"政治問題"；而是腐敗和裙帶統治者的存在。相反，這些形式的政治統治反映、保護和加強了社會經濟力量的差異。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

不斷擴大的權力和財富的差距，不只是出現在個別阿拉伯國家境內；他們也出現在區域範圍，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現在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和其他阿拉伯國家之間。在最近多個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危機之後，這些區域等級差別變得越來越大，再一次說明，贏家和輸家之間，危機的影響還需要區分開。

根據 2014 年 10 月國際金融協會 (International Finance) 的報告，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 成員國的淨外國資產 (外國資產的毛額減去對外債務) 從 2006 年的 8780 億美元漲到了 2014 年底的預測值 2 萬 2700 億美元。[7] 相比之下，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外國資產淨值則下降，從 2006 年的 110 億美元的盈餘，落到 2014 年底預測的赤字 467 億美元。[8] 同樣，2014 年海合會 (GCC) 的六個國家，據估計，總的經常帳戶盈餘只有 3000 億 (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7%)，是他們 2009 年的四倍多。[9] 在同一期間，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經常帳戶餘額達到 2014 年的 259 億美元的估計總赤字 (-4.6% 的 GDP)，而 2009 年的赤字為 188 億美元 (GDP 的 -4.3%)。[10]

在海合會 (GCC) 內，從 2010 年至 2014 年，私有財富每年增長 17.5%，在此期間的，總金額翻了一倍，從 1 萬 1000 億美元達到 2 萬 2000 億美元。[11] 有 5,100 戶海灣家庭，估計每戶有超過 5 億美元的流動資產；他們聯合的總資產超過 7000 億。[12] 應指出，這幅圖尚不包括所謂的 "流動性" 資產，如房地產股票、業務股權或如藝術作品這一類收藏品。

再次，我們發現，不平等日益加大，財富不斷增長，這個相輔相成的發展趨勢，在區域水準上被複製。儘管全球近期油價下跌的後果仍有待觀察，世界經濟核心區——尤其是在歐洲——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意味著該區域的兩極化仍有可能是當代形勢的持續特點。

這些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對理解反革命的契機至關重要，並為宗派主義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當然，各種形式的外國和區域的干預——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總是會尋求阻止任何對區域秩序的根本性挑戰。過去二十年，西方毀滅伊拉克的可預測後果，幫

助培育宗派團體和伊斯蘭統一主義的崛起。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血手，故意煽動這些進程，似乎贏得了西方的暗中支持。

然而，所有這些事件，左派和進步的聲音仍然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太容易被摩尼教的地緣政治世界觀，或他們自己 "愛國資產階級" 的幻想所左右。如果沒有解決社會和經濟正義的問題，提出替代近幾十年來的市場導向政策的替代方法，就沒有希望建立進步的一極，反對現存的精英和宗派主義災難。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在本質上是深刻的政治問題；這必須涉及到對高階軍政官員、富商和繼續受益於現狀的大型企業界的挑戰。

2015年3月1日
中東觀察

註

-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經濟展望：中東和中亞地區，世界經濟和金融調查 (華盛頓特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 年 4 月 11 日)，39，www.imf.org/external/pubs/ft/reo/20...
- [2] 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2013 年)，阿拉伯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面臨的挑戰和超越 2015 年，第 9 頁。<http://www.escwa.un.org/information>
- [3] 開發計畫署、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對人類安全的挑戰 (紐約：開發計畫署，2009 年)，111 頁。
- [4]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eform...>
- [5] 世界銀行數據，近幾年。
- [6] 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2013 年)，阿拉伯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面臨的挑戰和超越 2015 年，第 6 頁。
- [7] 國際金融研究所 (IIF)，2014 年，"中東和北非地區：地緣政治風險下的復蘇"，10 月 8 日，第 32 頁。
- [8] 國際金融研究所 (IIF) 2014，第 34 頁
- [9] 國際金融研究所 (IIF) 2014，第 31 頁
- [10] 國際金融研究所 (IIF) 2014，第 31 頁
- [11] 策略 (2015 年) "海合會 (GCC) 私人銀行業研究 2015 年：抓住機遇"，第 3 頁，<http://www.strategyand.pwc.com/medi...>
- [12] 策略 (2015 年)，第 8 頁。

非洲在崛起嗎？一個批判性的觀點（1）

費洛茲·曼吉(2014 年12月29日)

“非洲崛起”這種流行觀念的基礎是所謂5%-6%的GDP 增長速度。但這主要歸於初級商品，尤其是採掘業初級商品的價格飛漲。例如，每桶石油的價格，從1999年的20 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45美元。雖然那以後價格便開始下降，但仍然遠高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水準。

其他礦物和糧食價格已經顯著增加。非洲是最富有的大洲之一：它有世界上10%的石油儲量，40%的黃金和 80%-90%的鉻及鉑。

自 2000 年以來，天然資源開採和相關的國家開支占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 30%以上。對GDP增長的主要貢獻，來自少數幾個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阿爾及利亞、安哥拉、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利比亞和尼日利亞)，它們有非洲大陸最高的GDP，但也是多樣化最低的經濟體。

國際資本從石油、天然氣、礦物、掠奪土地和類似的可能性中，看到了大量的利潤。跨國公司促使非洲各國政府執行的政策，包括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私有化，低額徵收甚或免征企業利潤稅，向蜂擁而入的製造商品開放市場。

所有這些措施對本地製造業的生存能力有破壞性的影響。根據麥肯錫的報告，“外國直接投資到非洲的年度資金流，從2000年的\$90億增至2008年的\$620億——相對於GDP而言，幾乎同流入中國的一樣多”，這一點不足為奇。這項投資的大部分進入了採掘業。

那麼非洲如何受惠於此呢？根據非洲經委會(UNECA)執行秘書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的說法，“2010年，頭40名的礦業公司平均淨利潤增長為156%，而各國政府所得僅增長60%，其中大部分為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所得。”

他指出，相同的礦業公司在2010年的利潤是\$1100億，相當於同一年所有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出口額。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使事情更糟的是，非再生性資源的開採相當於截肢：對所謂的“發展”完全沒有幫助，榨取消耗非洲大陸最富的國家，除了讓極少數人致富而犧牲絕大多數人利益外，很少或沒有讓其人民獲益。

“非洲崛起”觀點的支持者所依賴的GDP增長率，掩蓋了以下事實，即整個非洲大陸製造業的下降，主要由新自由主義政策引起，因為這個政策把各經濟體開放給工業化國家的產品。

正如里克·若登(Rick Rowden)在其2011年貿發會議(UNCTAD)報告中分析指出的，在非洲GDP中的製成品增值指數(MVA)“從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8年的10.5%”，而同期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它從22%上升到35%：“在非洲的出口方面，製造業的重要性也下降，製成品在非洲總出口中的比例，從2000年的43%降到2008年的39%。就製造業增長而言，大部分停滯不前，有23個非洲國家曾在1990年-2010 年期間呈現人均MVA負增長，只有五個國家達到 人均MVA增長4%以上”。2014年貿發會議(UNCTAD)關於最不發達國家的報告，再一次證實了製造業下降的趨勢。

所以雖然他們的“非洲崛起”意味著對GDP上升和跨國公司利潤的垂涎三尺，但非洲的現實是，我們有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對自然和不可再生資源不斷加大的截取，土地剝奪愈加劇烈，跨國公司的利潤不斷上升，不斷上升的土地喪失率、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越來越貧窮的大多數人。

就像最近一份報告所強調的，世界其他地方在吸取非洲的資源。“每年\$1340億流入該大陸，主要形式是貸款、外國投資和援助；同時有1920億美元被取出，主要集中在外國公司的利潤、企業偷漏稅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費用。結果是非洲每年淨損失\$580億。”

不斷升高的不滿

但“非洲崛起”思想的另一個方面，讓我們對非洲大陸人民的未來和自治潛力寄以希望，對這個方面需要更加重視：那就是橫跨整個非洲大陸的人民起義，這是我所經常強調的。

除了在突尼斯和埃及爆發的，導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分別下臺的革命形勢，在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貝寧、博茨瓦納、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吉布地、加蓬、肯雅、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里、茅利塔尼亞、摩洛哥、莫三比克、納米比亞、索馬里、塞內加爾、南非、蘇丹、斯威士蘭、多哥、烏干達、西撒哈拉，辛巴威也有群眾起義。

最近，我們目睹了在其他一些國家，包括尼日利亞和乍得，爆發的起義。最近，在伯基納法索的起義，導致布萊斯·坎帕奧爾下臺，布萊斯·坎帕奧爾是殺害伯基納法索革命者湯瑪斯·商羯羅的兇手。

引發這些起義的，是俗稱為“新自由主義”之資本主義最新階段帶來的幾十年的剝奪和貧窮。還有，既成的普及教育、健康保險、社會福利、水、電力和廣泛的社會基礎設施，這些獨立成果遭到逆轉，也助長了起義的爆發。

但在新自由主義時期之前，南方就已經取得了經常被媒體、學術界和“發展”業界等遺忘的重大成就。根據蘇蘭德拉·派特爾撰寫的聯合國經濟發展世界學院(UN/WIDER)一份報告，從1950年-1990年的40多年來，南方國家，其人口比發達國家高出十倍，每年平均增長率持續超過5%。

這期間，出現了很高的工業化水準，製造業所占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儲蓄率和投資率增加；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社會專案發展空前擴張，識字和平均壽命顯著改善(從35升到60歲以上)、教育規模空前擴張。

然而，整個非洲大陸所經歷的不只是物質剝奪，而且還有不斷增加的政治剝奪。對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銀行和帝國主義國家，我們的政府變得更負責任，而非對他們的選民(或至少對那些受他們政治控制的公民)負責。

我們見到，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始挑戰這些政府的權威，但尚未給現有的權力關係帶來變革。

要改變現有的權力關係，需要我們超越對投票箱的迷信。公民(如果他們幸運)被允許每四至五年投票一次，但資本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秒都在股票交易所投票。資本的“投票”對人們的生活，甚至對食品價格有直接的影響。非洲國家需要重新控制他們的命運和尊嚴。問題是：我們如何能使我們的社會民主化？

為了讓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民主化，我們需要怎樣做？誰決定製造什麼，怎麼生產，做多少，由誰做，為誰做？誰來決定如何使用盈餘，以及他們是如何做出這些決定的？這些問題也適用於其他部門：保健、教育、社會福利、電訊、農業、自然資源的利用等等。

非洲正在上升。但不是按照大眾媒體想像的方式。

Amandla第37/38卷 2014年12月



非洲在崛起嗎？一個批判性的觀點（2）

約翰·南伽(2014 年12月29日)



在國際媒體，特別是在經濟新聞以及學術期刊上，關於非洲的敘述，正在發生變化。經常被稱為"非洲悲觀主義"的東西不再是主流，"非洲悲觀主義"曾使得發展性非政府組織（development NGOs）特別致力於非洲的新殖民主義文明。現在我們面臨的是"非洲樂觀主義"，後者大有取代"非洲悲觀主義"話語之勢，原因是過去10年，整個非洲GDP的平均增長率大約為5%。按照資產階級的經濟邏輯，這有效地使它成為僅次於亞洲的世界第二經濟驅動力，而此時，大量資本主義的傳統中心晃蕩在經濟衰退的結束和陷入下一個經濟衰退的恐懼之間。

非洲經濟覺醒的其他跡象是非洲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與日俱增的知名度，還有非洲中產階層的增長，被認為是指數式的。非洲發展銀行(ABfD)稱，目前三個非洲人中有一個屬於中產階層。我們被告知，這只會越來越好，"涓滴效應"將最終惠及窮人。這種"非洲樂觀主義"甚至又轉變成"非洲的熱情"：我們如何能不歡喜

即將解放的非洲？

當然，儘管在幾乎所有的非洲社會出現了這些明顯的變化，但這些倍受稱讚的增長，遠非是導致這種解放的途徑。相反地，它倒類似改頭換面的社會不公正統治的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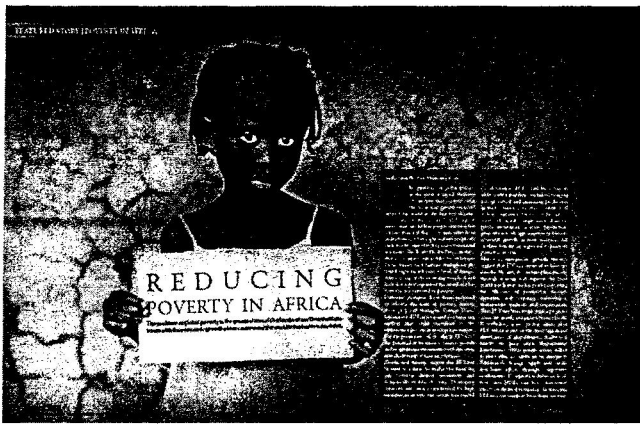
毫無疑問，非洲GDP的平均增長，包括一些國家甚至達到兩位元增長，這個情況目前在資本主義的中心是找不到的。然而，例如，布吉納法索的GDP增長（2010年7.9%，2011年4.2%，2012年9%，2013年的7%）或埃塞俄比亞的GDP增長（相應同期為12.6%，11.2%，8.7%，10.4%），就(社會)"發展"方面而言，無法進行比較，更不用說接近丹麥的增長數字(1.4%，1.1%，0.4%，0.4%)或瑞士的數字(3%，1.8%，1%，1.9%)。

當前對非洲增長的稱讚，來自資本主義的讚美歌手，本質上是為投資的盈利能力喝彩，而無視投資的來源。非洲被認為是一個投資回報的"前導空間"。這種增長，有時涉及非洲的資本，事實上獲益的是主要投資於採掘業的跨國公司，而採掘業仍然是非洲大陸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採掘業是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老"專門化"行業。

在加納，抽油工作啟動的幾個月後，其GDP增長了近一倍：從2010年的7.7%至2011年的14.4%。撇開它對全球變暖的影響不談，這種繁榮已經把工人丟在一旁，加納石油工人最近在罷工，因為他們收到的薪酬，同他們的"老外"同事相比，微不足道。

新的資本主義土地掠奪者受益於這種增長，其中包括一些本地的資產階級，他們有效地驅動成千上萬的農民，並非驅向中產階層——據說是非同尋常的擴張——而是驅向受到超額

剝削的農業無產階級，讓他們在土地上為主要用於出口的作物而工作。這些人包括諸如那些在西埃塞俄比亞被剝奪了初等教育的兒童。這種模式強化了還在繼續增長的對食品的傳統依賴，即便是在GDP增長的這些時期，食品也至少耗去了非洲的300億美元。與此同時，當地小規模生產遭到砍殺，隨著同歐盟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批准，這個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同時，跨國種子公司促使非洲更加依賴專利化的種子，依賴基因改造種子或公共資源的"盜版"。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和非洲開發銀行(ABFD)是這種有害生意的主要傀儡，生意人則是如孟山都(Monsanto)那樣的跨國種子公司。主要股東之一，正是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這個組織以慈善事業為名、負責持續的宣傳，施加其對所謂的非洲精英們的影響。

以合法或非法手段，與非洲各國政府串通一氣，利潤得以從非洲大規模調返本國。這些做法，解釋了法蘭西非洲分區教父，布萊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e)篡改憲法和依附權勢的企圖，——但對於每個為群眾運動沖走的孔波雷，有多少類似的個人正在密切關注，希望在他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專制且斂財的羅伯特·穆加貝，通過他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貝準備他王朝的接班選舉。另外，在剛果，若有人反對他的篡改，會毫不含糊地遭到血洗。非洲是資本主義吸血鬼的溫床，就像石油美元魔咒

下南蘇丹的各派別所證明的那樣。進一步的例子是在南非的馬瑞康納(Marikana)對礦工的大屠殺，似乎是由變成億萬富翁的前工會領袖鼓動的。

當前對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慶祝，事實上慶祝的是新自由主義之帝國主義為非洲編造的在建專案。它啟動了結構調整方案，把它作為解決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公共債務危機的萬靈藥，讓後者發現自己獲得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幫助"。

這些新興大國，儘管與具不同帝國主義傳統的非洲國家弄好經濟關係，但他們絕不反對推動和鞏固全球資本主義。他們想要在等級結構中獲得更好的地位，包括佔領傳統強權的地盤，在同一時間既合作又競爭。與非洲的"南南合作關係"是達到這一目標道路上的一項資產。由於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對於鞏固的新興大國，非洲被證明是一個必備的目的地。

日漸"擺脫困境"的非洲資本家，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當然受益於這種增長，他們所犯的罪絕不比其他人少。同時，一般而言，增長對非洲人民，特別是打工仔，並不是非常有益的。受高失業率影響的青年，結果加入罪犯組織博科聖地，這一類例子，我們且不談論。在中非(CAR)，政治危機前，其增長率是3%，青少年貧困沿著宗教懺悔線把其本身分裂，分裂成穆斯林武裝塞雷卡(Seleka)和基督教反戰(anti-Balaka)民兵。如果具有主權的幾內亞社會，按照實際的普遍利益，組織改善人民生活，就不會助長幾內亞、利比理亞、塞拉里昂的埃博拉悲劇。後兩個案例，也說明人類意義上的兩位數增長速度毫無意義：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和2013年在利比理亞分別為：15,7%、10,5%、13,8%、10,2%和11,3%的GDP增長；2012年和2013年在塞拉里昂分別為：15,2%和20,1%，。所有這一切，對於窮人和公共衛生服務都沒有正面影響。



新的中產階層，確實隨著電腦科學、金融和商業方面的工作在興起。對於新自由主義增長的讚美歌手來說，關鍵之處在於其無限、愚蠢的消費主義。然而根據非洲發展銀行的說法，其“優越”的等級，只占中產階層的少數，。在這“優越”的等級裡，加上所謂的“低等”中產階層，其非洲人口的百分比，並不高於實行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以前，該方案的特點是工資凍結、清算企業、裁員等。這個等級貼上了標籤“浮動”——即是說，總是存在重新陷入貧困的危險，這在非洲社會中仍然是非常普遍的——它構成所謂“中產階層”的絕大多數。

今天，在開普敦就像在開羅、在阿克拉和其他地方一樣，很大一部分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受害於——由於地方政府的徵收——燃料價格的上漲，以及連帶而來的其他基本商品價格的上漲。更糟糕的是，這個所謂的中產階層增幅不會與嚴肅的社會資料收集同步而行。它更像是純粹而簡單的虛假資訊。然而，我們可以相信非洲發展銀行和其他相似的診所，只要他們確認非洲的經濟增長與日益增長的不平等一起產生，而且估計窮人仍占非洲人口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因此，按照這個罪惡的社會經濟邏輯，它將是未來幾十年的情況。

然而，它還不是致命的。現在同過去相比，遠沒有必要結束非洲作為積累資本主義強權跳板的地位，即使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強權的未來非洲基礎，也遠沒有必要結束。只要有剝削，統治或壓迫他人存在，就沒有真正的解放可言，那是漸進滅絕的一部分。強行要求人們必須坐在那瘋狂驅動資本主義增長的汽車駕駛艙裡，是不應該的。今天，讓人後悔莫及的危險，遠遠超過昨天，運輸方式必須改變，應朝向另一個目的地，而不是朝向非洲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後者是極其不平等、不公正、壓迫的，具有戰爭，種族屠殺的苗頭。

那些被剝削的、受壓迫的和反對種族滅絕的人將在地區和區域為非洲解放的鬥爭中團結起來，聲援那些在別處面臨類似鬥爭的人們。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會解放他們——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的黨羽，無論他們來自非洲或其它地方，南方或北方，即使他們戴上工會面具，或過去光榮鬥爭的光環，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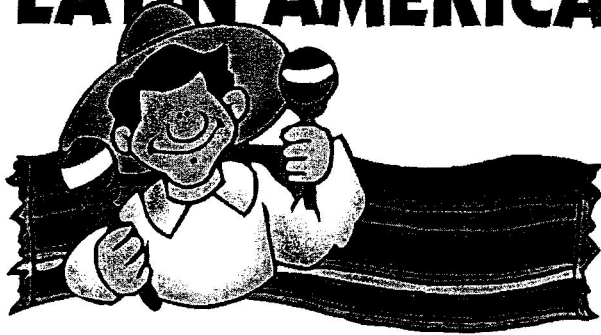
Amandla 第37/38期 2014年12月



拉美國家的雙重性

克羅迪歐·卡茨(2014年2月13日)

LATIN AMERICA



在過去的十年，拉美國家獲得了自主性還是變得依賴性更強？是擴大了還是減少了其主權邊際？面臨全球經濟危機，有更大的保護還是只有更多的無奈？（這是該文章三個部分的第一部分）。

I. 經濟和階級

南美洲的演變為自治的論題提供了許多論據，中美洲的進程也同樣為依賴性提供了判斷論據。如果我們把委內瑞拉或墨西哥進程的軌跡一般化，也可作同樣的對比。如果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層面，當經濟評價列為優先事項時，週邊重整躍然入眼，那麼，該地區獨立的新邊際就出現了。

"後自由主義"和"商品共識"是綜合這兩個願景的兩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注意到，出現了一個以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標誌的新階段、出現了進步政府同倒退右翼的結合[1]。第二個概念強調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中心的模型的均勻強化[2]。

哪個是正確的表徵？答案需要評估過去兩年在該區域發生的巨大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

農業出口和採礦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重組得以加強，出現了一個出口專業化的模式，重新把該地區創建成國際鑿子，成為一個基本的產品供應商。這種分量重新加大的商品，意味著農業方面的深刻變革，促進為出口而進行的種植栽培，造成當地供應的衰落。在所有國家，都加強了一種商業模式的運行，用密集積累的資本主義標準營運農村企業。舊寡頭與"農業"大公司密切聯繫，領頭這個轉型。

小生產者必須忍受投入的增加、更大的競爭壓力和日益增多的轉嫁風險，因為合同都是按照出口規則訂造的。他們必須調整活動適應新的製冷、運輸和農業化學的投入要求，以便生產出全球行銷的成型製品。他們經常負債累累，賣掉土地，最終加入移居到城市的大眾裡。

這種提高產量的壓力，傷害殘存的非資本主義農業，沖淡了關於這一部門不同生產模式調節的以往討論。在外部需求的約束下，初級和次級部門之間的界線減少了，泰勒模式的雇傭勞動份量得以擴大。

大豆是這個新農業計劃的一個典型例子。它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擴散，摧毀其他種植業，所用的手段是直接播種轉基因作物和對孟山都公司作為種子供應商的依賴。由於生產油或動物飼料需要的勞動力不大，每100-500公頃只產生一個工作 [3]。

但在其他區域和產品方面，也能看到相同的轉型。智利的水果和葡萄酒是隨著外銷的新參數而發展的，隨著農村臨時工的密度及轉包的增加而發展的。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的花卉種植，靠的是密集型灌溉技術和高度剝削婦女

的體力勞動，它取代了傳統的营养生產。在中美洲的種植園裡，新鮮冬季蔬菜的出口以犧牲傳統生產為代價，而它們已經使基本糧食的進口出現了大幅的增加[4]。

在採礦業方面，也出現了同樣的初級商品出口專業化，採用新模式的露天採礦作業方式。為了提取礦物，高山被炸毀，用化學化合物（水力壓裂法）裂解岩石。因為替換老坑的這些技術都需要更多的投資，外國公司的出現增加了，而且獲得很多減稅。加拿大的公司——以及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和美國的公司——控制了大部分這樣的企業。

智利是這種活動的天堂。不再只有國有的智利國有銅業公司（CODELCO）開採銅。其他公司也參與開採，付出低稅（7.8%）而獲得高收益（50%）。秘魯也是這樣，在康茄（Conga）地區，正在開發規模巨大的採掘專案[5]。

這類採礦挖掘使用大量的水，直接影響農業企業並增加污染。這就加重了環境災難，該區域正在罹受災難影響，面對安第斯山區冰川融化，亞馬遜河流域的森林退化和沿海地區的洪災。以出口為導向的礦物萃取，使氣候變化的所有影響更加尖銳[6]。

工業衰落

工業衰落是農產採礦業繁榮的另一面。拉美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第二產業的比重從12.7%(1970-74年)下降到6.4%(2002-06年)，在生產、生產率、技術、註冊專利和研究與開發支出方面，同亞洲行業的差距已經擴大[7]。

這個向後倒退的運動經常等同於拉丁美洲經濟的“再原始化”。但工業並沒有消失，它會更準確地調整到一個新的依賴性再生週期。巴西和阿根廷作為戰後工業化最具代表性的兩個經濟體，其發展是非常明顯的。

在巴西，生產率已經下降，成本增加了，外部工業赤字有所擴大，處於投資滯後，能源和運輸的基礎設施大為惡化的情況。一些分析

人士認為，巴西的工業設置已經淪為其1980年代規模的一半[8]。

在阿根廷出現了同樣的工業衰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有復蘇的紀錄。這一行業佔有的地位較上世紀80年代小（GDP從23%降到17%），而且高度集中在五個部門，受外國控制，進口增加，國產度低。

在墨西哥，傳統產業——通過替代進口以供應本地市場而建立的——已經被崛起的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廠（maquilas）而取代。這種類型的工廠以出口為優先，通過網路運作，以適應靈活積累的規範。它們開始於服裝和電子產品，然後擴展到汽車，它們已占墨西哥GDP的20%。這種模式的象徵位置是美國的邊界。在位於邊境區的兩側，1965年的50個初始工廠發展到2004年的3000工廠。

從低品質勞動裝配廠發展起來的這些工廠，包含影響整個拉丁美洲經濟的基本專業化的許多特點。其主要的輸入是廉價的勞動力。公司聘請來自農村的工人並把工會刑事罪化。生產率同母公司的水準相仿，工資卻比美國的平均水準低幾倍，而且低於墨西哥有工會的行業。

這種勞動剝削模型的固化，在位於多明尼加共和國、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新一代公司裡更易見到。那裡，他們用合同讓年輕人屈服於使人筋疲力盡的紀律。由於同亞洲的競爭，因而提高生產力的壓力重新出現了，而且是永久的。

匯款和旅遊

基本出口專業化模型創造的就業機會沒有幾個，加劇了移民，並在該區域的一些小國家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對各種匯款的依賴性。拉丁美洲是這些資金的主要接收者，這些資金是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圭亞那、海地、洪都拉斯、牙買加和尼加拉瓜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外幣轉移是伯利茲、玻利維

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拉圭和蘇里南的第二大外幣來源。他們已經取代了薩爾瓦多的咖啡和洪都拉斯香蕉的首要地位[9]。

因為匯款，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雙重困難局面，即在一個國家賺錢但在另一個國家消費。在一處獲得報酬的勞動力，卻向另一個地區中同輩人的再生產負責。全球通信和運輸價格的減少，已經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多國空間，讓人在同一時間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移民與他們的原生地區的聯繫，在某些社區鍛造出一種雙重模式的生活[10]。這一進程加強了出口過剩人口的國家和選擇性地吸收流民的經濟體之間的裂痕。運動是多方向的，但被拋棄的地區和尋求到的地方總是相同的，就如目前居住在美國的3000萬拉美裔人所表明的那樣。

此外，旅遊業已成為該地區的小國生存所必需的。這個服務業已經取代香蕉，成了哥斯大黎加的主要出口品，而且是洪都拉斯、瓜地馬拉和加勒比地區的第二大經濟活動。基於標準化的服務，拉丁美洲的現成廉價勞動力、祥和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文化遺產，讓它具有吸引力。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用個人主義的標準取代了社會旅遊的老規則，把富人(有享受閒暇的權利)和窮人(有提供服務的義務)之間的劃分自然化。大眾媒體烘托異國情調的吸引力，進行文化同化，並把第三世界國家變成了一個"快樂的週邊"。中產階層置身於這些新的體驗，把自由貿易的神話內在化，漠視圍繞這項業務的日益不平等的情況。在恢復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方面，全球旅遊業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影響。

該模型的持久性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把拉丁美洲重新變成一個高度集中于農產出口、採礦和服務業的經濟，其代價是犧牲工業的發展。但在最近的全球危機時期，最明顯的是這些趨勢的連續

性。

這種持久性反映了全球金融震動對該區域的中度影響。在危機以前的期間(2003年-2008年)和以後的階段(2008年-2013年)，拉丁美洲的增長速度一直高於國際平均水準。近幾年那平均水準在下降，但並沒有變多少。在2013年它達到3.2%左右，而前一年則在3%的水準[11]。

同發生於1980年至2003年之間的災難性崩潰相比，到目前為止，危機對拉美國家的影響有限。既沒有發生銀行崩潰也沒有發生外債爆炸。這種中立情況，在中部比南部更有意義，但該區域中部國家沒有經歷強烈的衰退。

與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做對比，能說明問題。在那崩潰期間，拉丁美洲出口減少了65%，進口減少了37%，而多數國家經歷了財務狀況惡化，迫使他們暫停支付外債。那個下滑被伴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出口增長與儲備的積累而逆轉過來[12]。

此外出口專業化格局的連續性，得利於大宗商品維持的高價格水準。2008年，物價下跌，但它們很快就恢復了。內部貿易條款的一個改善得以持續，在過去十年的記錄中，原材料價格增長了三倍。石油價格翻了一番，銅增長了四倍，而大豆已上升了2.5倍。這個升值刺激了出口量增加55%[13]。

對於原材料價格這種上漲的原因，存在不同的解釋。一些解釋注重金融投機活動的發生率，其他解釋則強調農業燃料的擴大，然而有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需求建立了一個新的價格水準。但無論如何，這一過程激發了之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深化。

最後，外國投資流的運作，一直是趨勢連續性的決定因素。2012年這筆收入總額1730億美金，超過前一年百分之六，比十年的最高數額還增加一倍。資本流入和出口價值促進了外匯儲備的增加，並減少債務比率[14]。

近幾十年來的畫面和最近的危機加強了

這種判斷，即強調商品在拉丁美洲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地位。通過這樣的權衡，就綜合情況(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債務)而言，該地區不是那麼脆弱，但其結構的脆弱性有所增加。

上述改變

本區域作為一個基本的產品出口者得以鞏固，也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概況，促使舊的民族性資產階級轉化為本地區的資產階級。第一種模式對應於內部市場的製造實業家，連帶有進口管制與補貼，優先擴大需求。第二個概況所涉及的是一個部門，這個部門不再限制它的活動於製造、不提倡自我慢跑式的開發。它促進出口，而不是內部市場，傾向於降低成本更甚於擴大消費。

這種轉變加劇了一個百萬富翁精英階層的暴發。這樣的暴發戶中的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名字是：斯利姆(Slim 墨西哥)、西斯內羅斯(Cisneros 委內瑞拉)、Noboa(Noboa 厄瓜多爾)、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 哥倫比亞)、安得羅尼科·路斯可(Andrónico Lucski 智利)、布林戈羅尼、羅卡(Bulgheroni、Rocca, 阿根廷)、黎曼，薩夫拉，墨拉爾(Lemann, Safra, Moraer 巴西)。他們的財富可追溯到過去，但近幾十年來通過出口業務，他們的財富有了巨大增幅。

整個來說，拉丁美洲資本家是全體人口中的少數部分。他們的力量和其成員數目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業主和公司經濟利益的接收者不超過經濟活動人口的1-2%。如果我們把管理和控制勞動力或一些在公司具有戰略作用的高管和專業人士包括進來，那麼這一比例增加到10%。通過這些功能，他們參與了沒收他人勞動的活動 [15]。

最後十年的轉換，增加了主要資本主義集團的集中度和國際化，那些集團走到一起，成為區域性企業集團。新的拉美跨國公司興起，它們來自富裕家族，因為這些家族用全球管理

方式和區域優先專案擴大他們的公司。巴西和墨西哥的企業集團領頭這種趨勢，其次是阿根廷和智利。

土地採礦、工業和銀行業各部分之間的傳統差異並沒有消失，但由於引進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導致互相聯繫增加了。這種競爭已修改了500個最大拉美國家公司的組成。1991至2001年期間國家企業的參與下降(從20%到9%)，而外國的比重增加了(27%至39%)[16]。

本地集團用更多的外部融資和股票交易資本重組他們的活動。股票市場的進入同迴圈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從1981年的800億美金到2005年的5兆)的股份增加一致。這增加了國際資本對拉丁美洲公司所有權結構的滲透。

今天的公司功能更強大，但該區域的資產階級無法克服其次要的全球角色，而且面對來自東方的新競爭不知所措。這一結果符合基本分支中的專業化，同製造活動漸行漸遠。因此，同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差距變成了無法恢復的裂痕。

地區資產階級增加了其與外國資本的聯繫，但作為一個受歧視性對待的部分，其狀況並沒有消失。它維護特定積累的要求，這些要求超出了國家框架，影響到地區活動範圍。與外國公司較多關聯的資產階級業已鑄成，加強了一個進程，這個進程始於1960年代的巴西，繼續於1980年代的阿根廷，鞏固於1990年代的墨西哥。這一部門起源於工業，擴展到農業-採礦業和服務業 [17]。

最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加入G20峰會，標誌著現存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關係的又一次飛躍。但在各部分之間存在拮抗性的合作，同這比較密切有關的原因是，要維護北方更大的合作夥伴與南方較小者之間的差異[18]。

雖然與外國資本的貿易已成倍增加，但原籍國堅持要作為業務基地、利潤的優先來源，以及本地區資產階級決策的中心。國際化的信

用、市場和股權並未消除主要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地域特徵。

錯誤分類

相關的地方資產階級，帶領出口專業化、分享外國公司的利潤，但不順從"新寡頭"。這部分資產階級的前資本主義特點，在資本化過程的進展之前，就完全熄滅了。舊的拉丁美洲精英---訴諸過時運作方式，企圖支配其農業採礦財產的使用權 --- 正在失去份量。

有一些做法強調統治群體的跨國性質，因為這些群體選擇將其業務全球化[19]。但在這裡，協作同融合相混淆，忘了正在發生的國際化來自現存的階級和國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沒有取消這些結構，也沒有消除相同民族出身的資本家之間的優先互連性。

目前，全面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僅限於國際化管理部門或全球化機構中較高官僚層的部分。然而，公司所有權仍然植根於不同的地理區域，而且國家政府持續是唯一可以合法約束工作者的機構。

拉丁美洲地方的資產階級不是由大都市操縱的衛星。他們作為資產階級而活動，利用農業採礦業的出租，榨取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他們的行為像統治階級，而不是寄生，買辦或外國資本的附庸。他們缺乏發展當地的能力，不意味著對這一目標缺乏興趣。

拉丁美洲經濟受競爭、投資和經營模式控制。由於這些規則同掠奪有很大的不同，要描繪這個資產階級，一個簡化的方法是，稱之為"傻乎乎的資產階級"[20]。這個說法只對應於遊走在法律邊沿而積累資本的那部分。例如，毒品販運，賺取財富，這筆收入部分地在財務或生產性活動中做漂白清洗。它符合邊際部分，但不被納入統治者的穩定俱樂部。

把小飛地的具體情況一般化也是錯誤的。拉美地區構成一個分析單元，但基於洪都拉斯或巴拿馬的刻畫並不適用於巴西。只有由華盛

頓遙控的"新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的情況，到處盛行。

商品轉向使拉丁美洲壓迫者的個人資料尖銳化。他們是資本家，在經濟上剝削雇傭勞動者、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壓制工人，又是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蔑視被統治者。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它的同輩也發展了相同的功能。

但他們這個階層的權威也薄弱，並未導致民族鬥爭，沒有招募到對其統治重要的人員，也沒有促進中產階級的流動性。此外，在出口專業化之新的積累格局下，這些弱點加劇了。

下層的改變

拉丁美洲社會結構的轉變也改變了統治階級的組成。因為這種變化的一個主軸位於農業，我們看到，老式農業的凝聚力消失，越來越多的人口湧向城市中心，老式農業因而受到影響。為此，農業的緊張局勢成了另一個方面。

舊式的大田地併吞，重新製造農民的苦難，妨礙土地資產階級的管理，它在資本主義公司面前衰微，後者剝奪他們土地的農藝師、雇傭不穩定的合同勞工，並強迫過渡轉向城市。

在拉丁美洲的剩餘人口沒有多少就業出路的情況下，城市裡沒有什麼工作，收入非常低，這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大遷移。出於這一原因，無論榨取式經濟處於衰退之中還是正在蓬勃發展，非正式性成為常態。移民--- 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積累失衡的幾個時刻的逃生閥門--- 目前無助於壓力的緩解。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該區域的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

這種排斥的直接後果是犯罪率成指數式上升。毒品為基礎的經濟已成為推向邊緣化的行業的生存避難所。該區域的兇殺率記錄在全世界最高。犯罪率隨同社會分裂和淫穢消費以及富人的享樂而增長。

由於榨取式模型創建的是低品質工作，拉美地區的勞工不穩定率超過中部國家的平均數。在前資本主義的土地流轉裡或在熟悉的勞動力

再生產的情況下，這個非正式就業率不會重新創建。它隨同資本主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延伸。一些調查認為，不穩定的部門涉及46%的拉丁美洲工人 [21]。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貧窮的擴大，在拉丁美洲這已經超出了非正規經濟部門。它也影響範圍廣泛的穩定工人。不同于發達經濟體，在這裡，收入太低，連基本必需品都得不到滿足的人的範圍，並不局限於受排斥者。它延伸到現代企業裡的受剝削工人。窮孩子的百分比（總數的45%）顯示了這一禍害的利害程度[22]。

非正式工作的擴大，也是加工廠（maquilas）和工業倒退的結果。在區域製造的情況下，技術變革的加速增加了專門工人與不合格工人之間分化。同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合同工職位相比，有社會保障的穩定職位在減少。

這種分裂的嚴重程度是勞動力市場的突出特點。戰後時期的典型男性工會工人往往被更靈活的女工取而代之。正規部門的這種衰落發生在加工廠（maquilas）。工人階級的擴展已經失去了其過去的動力。製造行業的無產階級並沒有消失，但其產生率已萎縮。

在目前的初級商品出口模型中，與先進國家相比，拉丁美洲中產階層的狹隘傳統仍存在。在填補分隔富人與窮人的鴻溝方面，這個階層的貢獻仍然微不足道。此外，舊的中產階層堅持同這個範疇的新部門的聯繫。多種小型零售商和自雇營業家持續存在，而高品質的專業人員或技術人員的數目成長得並不巨大。這個額外發展反映了行業的狹隘性。

當然，隨著信貸擴展和廣告以及大型商業連鎖的到來，中間階層正在增加他們的消費。但經濟體如此依賴基本產品的出口，所以消費力的生產基礎很脆弱。

過去的十年，許多分析師還強調減少貧窮、失業和不平等，但即便範圍狹窄的來自活動水準週期性上升的改善，都未見出現過記錄。

最大的新奇是旨在緩解貧窮的社會援助

的普遍化。不過，官方的援助只暫時保護被遺棄者，而不會改變這一問題的原因。這些計劃帶有更大的臨時性，並且確認勞工分化。

另一方面，不平等的輕微減少並不會修改該地區處在全球不平等指標頂部的位置。在這一區域，衡量這種兩極化的基尼係數（51.6）高於全世界平均水準（39.5），是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雙倍，拉美國家中有四個國家（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洪都拉斯、巴西）處在世界貧富差距表的頂端。拉丁美洲人口中20%的最富者的收入超過20%的最窮者的收入近20倍[23]。



問題的解釋

後自由主義的診斷不適合拉美國家目前的經濟情況。基於農業出口、露天採礦，整個地區生產專門化模式盛行，還有傳統產業、匯款和旅遊的減少。這種模式意味著廣義週邊的或半週邊的再融入國際勞動分工。

連同這些傾向，新自由主義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轉化為本地的資產階級，但國際化了並且連結到外國資本。相同的改變已加劇了農民的外流、勞工的不穩定、城市的邊緣化以及中產階層的脆弱。

這種情況與整個拉丁美洲的"商品經濟"的對應願景比較一致。但這第二特點不是純描述性的，因為它假設存在一個圍繞榨取主義的"共識"。因此，它超越了經濟領域，有政治意味，需要評估在地緣政治和政府範圍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將在該文的第二部分作分析。

摘要

通過分析該區域中的變化，闡明了“後自由主義和商品共識”（Post-liberalism and Commodities Consensus）概念的有效性。資本主義已在農業中擴散，巨型礦業很興旺，強調基本出口的首要地位。供應國內市場的行業已經跌回到出口加工廠的狀態中，匯款是生存的手段，而旅遊是小國家的主要收入。自全球危機開始以來，這些經濟的趨勢得到了加強。

民族資產階級的優先需求已由本地資產階級的要求取代，後者優先考慮降低工資。通過與外國公司建立夥伴關係，其少數地位得到了鞏固。它的前-資本主義特點消失，而且不會創建新的寡頭。它保持其基地積累而沒有成為跨國化的集團。只有輕微分量的傻瓜資產階級和新-殖民附庸地位沒有延伸到中等規模的國家。

在貧窮、失業和不平等的情況下，非正式工作的擴張、農民的出走和新中產階級的停滯，重構了統治階級。經濟形勢並不能佐證對後自由化的評斷，應納入政治方面的考慮對相反的觀點作評價。

參考書目

- 阿達莫夫斯基·伊茲奎爾（Adamovsky Ezequiel），中產階級的崛起神話，www.clarin.com, 2012/12/26
- 基博伊托·Jr·阿曼德（Boito Jr Armando），"新自由主義階段的巴西的階級關係"，拉丁美洲近代歷史中的社會主體和新形式的抗議活動，CLACSO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社會科學理事會），布宜諾賽勒斯，2006年。

- 波榮·阿提略（Boron Atilio），依賴關係理論，經濟現實，238期，2008年8-9月。

- Carchedi, Guglielmo. *Frontiers of political economy*, Verso 1991, (chapter 2)

- 古格列爾莫·卡爾凱迪（Guglielmo Carchedi），政治經濟學前沿，Verso 1991年，（第2章）

- 法齊奧·雨果（Fazio Hugo），"過去15年拉丁美洲的巨大危機"、全球危機的爆發，LOM，聖地牙哥，2009年。

- 弗蘭克·安德魯·崗德爾（Frank André Gunder），在拉美地區的落後和資本主義、二十一世紀、布宜諾斯愛麗絲 1974

- 甘達塞吉·馬哥（Gandasegui Marco），拉美國家和外國投資，alainet.org, 30/05/2013

- 古丹那斯·厄多爾多（Gudynas Eduardo），"進政府辯解"，2013/12/23，www.mediosdelospueblos.org.

- 傑索普·鮑勃（Jessop Bob），福利國家的危機。男性世紀編輯，波哥大，1999年。

- 卡茲·克羅迪奧（Katz Claudio），資本統治，阿根廷版，盧森堡，2011年12月

- 曼德爾·歐尼斯特（Mandel Ernest），"評論"，拉丁美洲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危機，二十一世紀，1977年，墨西哥

- 奧索里奧·傑梅（Osorio Jaime）"資本增殖的標準：一個理論建議"，資本增殖的標準，Boitempo出版社，聖保羅，2012年

- 帕薩林和·保羅（Pasarinho Paulo） - "中產階層"暴發的宣傳奇跡，'南風'雜誌，2012/06/08

- 薩拉馬·皮埃爾（Salama Pierre），歐洲必須學習阿根廷，第12頁，2012/10/28

- 塞昂·約瑟（Seoane José），塔代伊·俄米略（Taddei Emilio），阿爾戈蘭納提·克拉拉（Algranati Clara），榨取，剝奪和氣候危機，編輯版，2013

- 塞拉諾·佛蘭克林（errano Franklin），巴西應該是機車，www.pagina12.com.ar, 2013/4/26

註：

- [1] 這是薩德爾·俄米爾 (Sader Emir) 前瞻："拉美國家的權利危機"，2013/5/12，www.rebellion.org/mostrar
- [2] 這是項帕 (Svampa Maristella) 的看法："商品共識和拉美語言的評估"，2013/2/5，www.iade.org.ar/modules/noticias
- [3] 卡茲·克羅迪奧 (Katz Claudio)，"大豆的農業-資本主義"，EDI年鑒，第4期，2008年，布宜諾賽勒斯
- [4] 請參見：羅賓遜·威廉姆一世 (Robinson William I)，拉丁美洲和全球資本主義：關鍵的全球化觀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巴爾的摩，2008年，58-101頁
- [5] 參見：古丹那斯·厄多爾多 (Gudynas Eduardo)，"關於康茄舞案的五個假設"，brecha.com.uy，2012/7/17。另外：赫南德茲·納瓦羅·劉易士 (Hernández Navarro Luis)，"拉丁美洲的改造"，2013/12/26，alainet.org/active
- [6] 拉加經委會 (CEPAL)，"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綜合分析2010年，www.eclac.cl
- [7] 羅德里古茲·約瑟·劉易士 (Rodríguez José Luis)，"拉美地區產業化的目前辦法"，2012年下半年，www.espaciocritico.com。
- [8] 帕爾馬·伽布里爾 (Palma Gabriel)，"退出主義"，第12頁，12/7/15
- [9] 匯款產生利潤豐厚的速匯金中間機構 (西聯匯款 (Western Union)，通濟隆公司 (Thomas Cook)，速匯金國際有限公司 (MoneyGram))。參看華爾街日報，"匯款幫助新興國家"，24/9/2012，online.wsj.com。
- [10] 參閱：安德森·本尼迪克 (Anderson Benedict) "出埃及記"，關鍵質詢，第二期，1994冬季
- [11] 見：烏嘎特車·奧斯卡 (Ugarteche Oscar)，"危機的三種速度"，2013/3/5，alainet.org。另外見：魯賓雅爾·迪果 (Rubinzal Diego)，"贏得了十年"，2013/2/17，第12頁
- [12] 見：格拉·維拉博伊·色季奧 (Guerra Vilaboy Sergio)，拉丁美洲簡史，哈瓦那·社會科學，2006年，第163-165頁
- [13] 阿日阿組·日卡多 (Arriazu Ricardo)，"小警告跡象"，2013/1/27，號角日報
- [14] 南·莫伊塞斯 (Naim Moises)，"歐洲的拉丁化"，國家，6-11-11。號角日報，2013/1/27
- [15] 見：珀特·阿勒見德羅 (Portes Alejandro)。拉美國家未來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階級社會和跨國主義，Antropos版本，波哥大，2004年5月，第一章
- [16] 桑提索·加威爾 (Santiso Javier)，"拉美跨國公司的出現"，拉加經委會 95年雜誌，2008年8月
- [17] 轉折意味著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從屬於外國資本以及隨後放棄實施進步改革：多斯·桑托斯·提托尼奧 (Dos Santos Theotonio)，依賴理論——一個歷史和理論的平衡，在全球化的挑戰中，教科文組織，卡拉卡斯，1998年
- [18] 這種特徵是馬尼尼·瑞·毛羅 (Marini Ruy Mauro) 預期的："巴西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不發達和革命，21世紀，1985年
- [19] 這是羅賓遜·威廉姆一世 (Robinson William I) 的觀點，拉丁美洲和全球資本主義，176-178頁
- [20] 此錯誤的起源在：弗蘭克·安德魯·崗德爾 (Frank André Gunder)，傻瓜資本主義和傻乎乎的發展，拉美一體化協會，巴賽隆納，1979
- [21] 波特，未來的發展，第1章和第4章
- [22] 見：拉美經委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CEPAL-UNICEF)，"新聞挑戰" 第10期，2010年5月，www.oei.es/noticias/
- [23] 圭聯米·路本 (Guillemi Rúben)，最不平等的地區拉丁美洲，www.lanacion.com.ar，2012/9/22

從短暫的“蘇聯世紀”到普京的俄羅斯： 破裂和再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凱薩琳·薩馬利(2015年2月9日)



反復慶祝柏林牆的倒塌，是用一個美麗的意識形態燈樹，掩蓋黑沉沉的森林。德國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轉捩點，其歷史意義因為戈巴契夫拆除蘇聯而得以加強。1989-1991年，這個轉捩點結束了短暫的“蘇聯世紀”(用墨舍·勒文(Moshe Lewin)的句話說)。它遠非一場“民主的革命”，反倒更具有社會反革命的性質，其內外行動者，把他們的目標藏在“民主-獨裁”議會的螢幕背後，沒有任何真正的選擇。

喚醒內外行動者——這樣做——意味著拒絕任何一個國際陰謀論，反對被迫服從帝國主義列強或“世界市場”的宿命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可怕的國際約束和行動者有任何的低估。同樣，拒絕“民主革命”論，意味著對以工人名

義的一黨獨裁的不滿，因為那是“真實的現存社會主義”失敗的“有機”成因。與此相反，它意味著不倒退至古拉格和柏林牆，並估量短暫“蘇聯世紀”對國際關係力量的影響現實，在相反的意義上說，正如湯瑪士·皮科提(Thomas Piketty)指出的那樣，有目共睹，“蘇聯世紀”後，“二十一世紀的資本”回歸到十九世紀的不平等機制。

“真實現存的社會主義”：一個反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及其自身的矛盾

二十世紀革命經歷的特定環境和發展無法在這裡涉及。但一切都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決裂，同帝國主義“中心”強加於其(半)週邊的統治和依賴關係決裂。[1]“在一個國家建社會主義”的邏輯，被克里姆林宮用來約束整個共產主義運動與革命，結果失敗了——鐵托南斯拉夫和毛澤東中國的領導人的抵制，就是特別的見證——這個邏輯沒有制止官僚主義，包括出現在新革命中的官僚主義。

這些革命的基礎，是有關社會的廣大最貧窮人口，他們在國家社會的反帝國主義戰爭中動員起來，其每一次勝利實際上鼓勵了其他人。挑戰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支配權，挑戰它以市場利潤為投資動力的邏輯，他們可能使經濟選擇從屬於政治選擇；但這些選擇由一黨專政國家“決定”，這樣既可捍衛他們的特權又能保住其社會發展主義的邏輯。“蘇聯集團”國家的執政黨，試圖重現同樣的社會經濟機構和機制，優先考慮國家工業化的邏輯。

在“真實的現有社會主義”政權和他們認定的理想之間，尤其是在巨大極權暴力階段，比如首先在史達林主義化的蘇聯，然後在一系列國際社會主義國家，到處都有巨大的差異。除了直接的鎮壓外，這些政權根據特定的內容和形式，結合真實的社會文化成果，建立了官僚剝削和支配（性別、民族、文化）的關係。新政權試圖把自己立基於工人上，因為工人是其制度的產業核心，於是，確保工人有一些形式的社會主義化保護，特別是在大型企業中，通過官方的工會，在那裡分配某種“社會收入”（住房、日托中心、休閒中心及假期，醫療診所，消費品）。強勁的“粗放型”增長，得到高度保護而不受市場機制控制，確保人的（不好的）充分就業和自然資源的使用，還有，社會收益作為基本權利而出現。所有這一切，儘管有壓制性的一面，卻給這些政權提供了群眾基礎。

1989：轉捩點的內外因素

在“真實現存社會主義”的內部層面上，該制度培養的社會主義願望和其官僚的現實之間存在根本矛盾。在蘇聯和東歐國家[2]，20世紀60年代的局部改革嘗試遭遇失敗，因為他們試圖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勞動品質和生產率：這樣做，他們同公認的充分就業權利發生衝突，同挑戰官僚特權的“平均主義”矛盾，擴大了由市場引起的貧富差距。抗議活動遭鎮壓後，改革受阻；七十年代是通過負債而增長的十年，因為負債使進口得以重新開放。

這造成了危機的第一個外部因素：債務可自由兌換成貨幣，那以後，主導這些系統的閉關自守，被打破了。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美聯儲提升利率而使這種債務增加了，把這些國家第一次置於債權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同時，1979年，蘇聯在其干預阿富汗後，遭到了羅奈爾得·雷根發起的終極軍備競賽的影響。

但這些外部壓力本身都不足以讓這些國家變成資本主義社會。是“纏結”把內外因素和

行動者連接一氣。

關於戈巴契夫所作的選擇，有一個主要的國際說法：蘇聯的“解體”，目的是獲得西方信貸和減少軍事開支的比重，以便推進內部改革（“公開性”/透明度和“新思維”/經濟重建）。西德的信貸和技術，蘇聯撤軍的可能性，對這些，莫斯科算計得比不受歡迎的昂納克政權更多。戈巴契夫旨在拆除兩大冷戰軍事集團（北約和華沙條約組織），在歐洲“共同家園”框架的系統內“和平共存”。經過與科爾的洽談，他接受了柏林牆倒塌。美國推動統一的德國併入北約。戈巴契夫不得不接受這個既定的事實，北約違背了它不會超越德國的諾言。

無論1991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與否，這一切都不會得到尊重。但就目前而言，美國熱衷的是蘇聯及其財產制度的終結。達成這些目標的內部盟友是葉裡欽（Yeltsin）。他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在1991年12月通過談判達成的協議，策劃蘇聯的解體，導致戈巴契夫辭職。然後，他加速普遍的企業法人私有化進程（變成股份公司），在1993年反對頑固杜馬的政變後，私有化進程採取了“大規模私有化”的形式：免費分發優惠券給工人，讓他們可以“購買”企業的股份，以此表明歸還因他們的工作而產生的財富，而這些財富是被共產黨機器侵佔的。這表明，在某種程度上，社會的反革命並未宣佈其“資本主義”特性。雖然“大規模私有化”（沒有資本的輸入）慢了下來，在短期內，他們在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進行重組時，避免同集中於大企業的工人作危險的對抗：這些企業失去了他們的生產物質，持續幾年，有越來越多的正式工作單位，經常不發工資，但其產品實物照樣分送各地。同時，關鍵部門被佔據，佔據者主要是政府和寡頭們。

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自身的多元化，引起整個東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繼葉利欽的例子，很多共產黨的“權貴階層”選擇鞏固其特權和權力，所用的手段是私有化和自稱“民主”的激進”

反共主義”，也即是說，支持市場、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這完全說不上是顛覆，因為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人性化社會主義”的“蘇聯正常化”和1980年波蘭雅魯澤斯基將軍反對團結工會及其“自治共和國”計畫的政變之間，任何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反官僚運動，都被查禁。

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公式看起來很簡單——“市場 + 私有化 = 經濟效率與自由”——而人們並不瞭解所說的“市場”和“私有化”是什麼，或要應用什麼樣的效率標準。遠不是什麼“民主革命”，他們用“歐洲計畫”一個重要而意外的轉折做標記，極度模糊地把社會反革命強加於人，後者反過來就可以對東歐國家制度的變革施加強大的影響力。

東歐資本主義復辟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

東德併入聯邦德國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第一次向東的“擴展”。對於東德人，就業被毀滅，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衝擊。但它還表現為德國財政預算赤字的擴大。1991年德意志聯邦銀行決定填補這一赤字，於是上調利率以吸引外資，使得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各種貨幣的官方平價不穩定。投機資本利用外匯管制的解除(由1986年單一法案決定)為歐洲貨幣體系(EMS)危機和經濟衰退提供了催化劑。

面對這場危機，德國同意放棄德國馬克，走向單一貨幣，以便消除利用匯率的投機活動。但它要求有嚴格的標準來管制未來貨幣的製造，表明其對通貨膨脹的關注，和對所謂“地中海俱樂部”國家的不信任。因此，建立了新歐洲聯盟(EU)的1992年“馬斯特裡赫條約”，納入了這些標準：尤其是政府赤字的限制，會員國的公共債務，以及禁止中央銀行資助公共預算赤字。

但是本世紀初，發生了向歐元的過渡，當時正值從東歐選擇要整合的“新會員國”(NMS)，讓這些會員有權享用歐洲預算的“結構基金”。

統一後的德國領導人，像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領袖一樣，因為整合東德(GDR)和南歐國家以及愛爾蘭已經花了不少錢，並不願意再“支付”其他更多的錢。而在最貧窮和最富有國家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在1986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時為1至4.9，到了2007年，隨著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到來，這個差距為1至20以上。然而，儘管在第一種情況下，“凝聚力”和結構性資金大為增加了，而2000年-2007年的歐盟預算，反而限制在歐盟GDP的1%左右，此時正值歐盟“慷慨”決定向東歐擴大10個新成員國的階段。

因此，在資本自由流通的情況下，被認為能確保增長和“趕超”的，正是基本的私人融資(通過信貸和外國直接投資 - FDI)。資本主義的復辟碰到極端脆弱的“國家”的資本。起于90年代末的金融服務自由化和加入歐盟的承諾，創造了條件，讓西歐的銀行得以絕對統治(約為70%到100%)所有候選國家(除斯洛文尼亞外)的銀行資產。在2003年-2008年期間，在波羅的海共和國，他們的大規模信貸持續增長率在7%至12%之間：在生活水準的大幅下降後，信貸到來，以回應消費的渴求，並由財務安排購買房產(並非沒有房產泡沫)[3]

總體來看，為了讓“歐洲結構”按美國所期望的方向轉化，東歐和東南歐(包括上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及其戰爭)充當了馬前卒：通過巴爾幹地區的歐洲-大西洋“組織”，鞏固北約和東擴[4]。美國想要對付的，主要是歐洲“力量”的自主性。歐盟“自由貿易”特徵的重點正走向相同的方向。反對任何“歐洲社會模式”，就意味著一個激進的做法，要把工人置於相互爭奪之中。

介於半週邊與帝國主義中心點之間？

加入歐盟，成為其新成員國前，要進行談判，這個過程冗長，所起的作用，類似於同強制實行“結構調整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談判。

不過，歐盟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南部歐洲國家發生擺脫獨裁統治的情況，但是正如我們已經在烏克蘭看到的，融入歐盟可以（仍然是）被視為脫離邊緣化，加入法治的和“有錢人的歐洲”，——雖然危機與歐盟現實情況的披露，使得這種吸引力在下降。

然而，有必要根據與這些主導中心在地緣上和歷史上的接近情況，根據他們具體提供的計畫，區分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不同“範圍”。對俄羅斯強權態度和行為的不信任，是不可否認的因素，促使一些東歐國家的新資產階級，採取“買辦”資產階級的熱心態度，服從歐盟和北約的政策和規則。這是波羅的海共和國的情況，這些國家曾被強行併入蘇聯。他們與中東歐國家（CEE）和巴爾幹地區國家，是最直接處在歐盟商業金融軌道上的國家，尤其是當證實他們有成為成員的可能性時。[5]

中亞各共和國情況則不同，有一個特殊之處，牽涉到國際能源問題和同中國的鄰近地緣。但他們是俄羅斯聯邦的歐亞聯盟計畫（起於2015年）最直接看中的國家，該計畫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歐盟兩個方面都鞏固自己。在同歐盟現在接壤的六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這樣的一個項目計畫在繪製[6]。2009年，歐盟已徵求這六個國家加入其基於自由貿易的“東部夥伴關係”（是由波蘭特別提議的），未能得逞。這些國家面臨排他性的選擇（因為俄羅斯和歐盟兩者的原因）——我們知道，這是一種異常現象，例如，烏克蘭的外國貿易大致分為：三分之一到歐盟，另一個三分之一到俄羅斯和獨聯體，最後三分之一到世界其他地區。這也是一個痛苦的選擇，如果這些國家的內部衝突被利用和挑起：就很難預測他們將墮入什麼樣的“混亂”或公開的戰爭。

俄羅斯怎樣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

上世紀 90年代是俄羅斯力量解體的十

年——儘管有十年骯髒的車臣戰爭。寡頭佔有的租金大量外出到避稅天堂，而這個經濟體的所有部門都大幅下滑：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仍然低於1989年的水準，一半以上的國內貿易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沒有工資和稅收；古老的實物分配方式通過大型企業得以維持，而主宰石油工業的寡頭正在同政府談判，要用其債務（稅）兌換政府持有股份，並維持家用能源分配的低費率。

變弱的俄羅斯卻被接納進八國峰會，被美國當作為其擴張的一個重要箭頭，當作為一個盟友。向外資開放石油部門和部分行業，得到了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買辦階層的支持。但1998年的國際收支危機有利於較為“保護主義”的傾向的興起，有利於回歸到普京年代的成長[7]。

推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的第二個因素：2003年-2004年的“顏色革命”，特別是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現有“親俄”政權的選舉舞弊和大規模腐敗，激起了支持“自由”與親西方黨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莫斯科指責後者在全球被美國“收買了”。西方陰謀論和包圍俄羅斯論開始形成了，得到了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著作的支持，外部融資資助反對運動，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新政權要求加入北約和歐盟，要把他們加在東歐新成員的長長名單中。

新的俄羅斯強大政府把寡頭們和錢幣流通置於控制下，同時將社會運動和抗議者定為罪犯而壓制，把他們作為外部敵人的潛在工具。儘管增長強勁，然而俄羅斯的經濟仍然有明顯脆弱的元素：首先是圍繞本身構建經濟空間的困難，這個空間包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一個歐亞聯盟須要緩解的問題。還有危險的“荷蘭病”（“比較性”的優勢，通過出口原材料，扼制了經濟的多樣化，成了一個“食利者”）。最後，政治衝突引起了對歐盟的依賴問題——並非沒有資金流動的透明度；在2012年，在俄羅斯所有外國直接投資資本的記錄中，幾乎60% 來自

避稅地（可能大量的源頭在俄羅斯），約 30% 來自西歐、亞洲為1.6%，0.6%則來自美國。對歐盟的出口（包括能源）在2012年大約為總出口的50%，而18%出口至獨聯體國家，至金磚四國的出口則少於 10%（而40%的進口來自歐盟、約13%來自獨聯體，20%來自金磚四國）。

2008 年，俄羅斯大張旗鼓地回到國際舞臺，這得益於信譽掃地的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的錯誤（高估了美國對他進攻南奧塞梯的支持）：莫斯科鞏固了其軍事存在並決定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獨立，而其他大國承認的是科索沃獨立[8]。與此同時，普京玩起“天然氣大戰”（運用價格武器，同時使用天然氣的交付量），特別是對付2005年後的烏克蘭“橙色革命”——對歐盟並非沒有產生影響，因為後者極度依賴於烏克蘭管道接收俄羅斯天然氣。

自那時以來，開始（無處不在）瘋狂尋找新能源供應來源和另外的“戰略性”走廊：針對由歐盟委員會和美國支持，擬議的繞過俄羅斯的“納布科”石油管道，莫斯科避開烏克蘭，談判了其他專案，談判對象是歐盟的幾個成員國——包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在2013年，由於成本過高，不得不放棄納布科項目；但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有所加劇，圍繞南流項目（South Stream project），把幾個歐盟成員國或候選國，置於重大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困境中，夾在俄羅斯的好處與歐盟的約束之間——直到 2014年底，俄羅斯決定放棄該管道。

多極化的世界

但我們身處的世界，其強權之間的聯盟是不確定的，強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競爭對手，但又共用階級利益和真實辦法，還有一致的話語——“反恐戰爭”的說法，體現了這一點；但俄羅斯也擔任敘利亞問題的調解人腳色，同時，俄羅斯寡頭在倫敦金融城很受歡迎，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正在擴大其在歐洲的網路。普京的俄羅斯對歐盟的批評是它

排斥俄羅斯。還有它的“墮落”——引發了反對運動，即引起了基於反對同性戀和性別歧視的宗教正統觀念的“保守革命”。但是普京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計畫想要複製的，是歐盟模式；該聯盟的目的，是創建力量關係，重新談判歐洲的所有關係。它的靈感部分地來自“歐亞文明”的理論家，對應于“俄羅斯世界”的宏偉和多樣性，從沙皇到蘇聯——已有變種，無論有或沒有普京——都反對美國[9]。在此基礎上，紅-白或國家社會主義的陣線形成，吸引了整個歐洲的極右派（不幸的是，有時是極左派）。

俄羅斯在“大聯盟”中發揮的“好處”是其軍事力量——在2011年的軍火市場，相對於美國30%的份額，它佔有24%的份額，但它還有豐富的原料。可是它在世界GDP的比重卻比巴西和印度低（2.5%）。根據雅克·薩丕爾（Jacques Sapir）的說法，20世紀中期，自由主義者和俄羅斯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之間，達成了不容易的妥協。摩擦點是：用石油收入使經濟多樣化，求助國際融資、政府的直接和間接控制的劃界問題。2009年的國際以及隨後的歐洲銀行業危機，導致了轉變，傾向于在金磚四國內部有更多的貿易和金融自主。但它只是自2014年至今在烏克蘭推動的重大調整的擴大。

中國（40%）-俄羅斯（60 %）聯合投資基金成立於2012年，但隨著對莫斯科的制裁，它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已經投資了40億美元，主要是投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的基礎設施、鐵路和航空運輸上。但已有計劃，在現在和2038年之間，通過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公有））出口到中國的碳氫化合物將達3億 6500萬噸的石油。目前的數量少得可憐 2014年的200萬噸相比之下... 2013年輸送到歐盟以外的歐洲國家有2億800萬噸。

換句話說，國際制裁的影響促使俄羅斯經濟有更大的自主性（通過進口替代和貿易重組）；但短期來看，經濟變得脆弱。資本外逃導致盧

布下跌，增加進口產品的價格；大量動用儲備金紓解受制裁的銀行，並為新項目提供資金。但同時，正如雅克·薩丕爾指出的，中央銀行選擇了提高利率以限制盧布下跌，犧牲了大規模國內信貸政策對經濟的作用。

最後，尚不清楚魯莽沖向烏克蘭的“混戰”，是否有利於普京的目標。北約在烏克蘭“合法化”；俄羅斯的合作夥伴（歐亞專案）表現出緊張情緒，因為他們珍惜自己的獨立。最後，雖然普京已經取得了短期內的主要目標——鞏固了權力，該權力受到2011年-2012年運動的挑戰，而那個運動本可以從烏克蘭獨立廣場運動（Maidan）汲取新鮮的靈感——在烏克蘭被殺害的俄羅斯士兵的第一批母親抗議者，以及反戰運動，正在開啟愛國主義共識方面的巨大差距。

歐洲大陸，包括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和平與平等的重組，將既不是普京，也不是歐盟的工作。

註

[1] 我在這裡使用的概念和理論，是布羅代爾（Braudel）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或“世界體系”的論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出現於十九世紀該行星的某部份（隨著時間而演變）。它並不涉及所有的國際關係，只涉及那些整合進“系統”者，而這個系統則由（帝國主義）中心強權施加國際分工（IDL）。嚴格地說，“週邊”就是殖民地。半週邊則通過來自“中心”國家的信貸融資而依賴國際分工（IDL），但他們是形式上獲得獨立的國家。因此，我們不是在帝國裡（中心國家本身是競爭對手），但在國家與統治關係構成的空間裡，那主要是經濟的，即便它們基於新殖民主義的軍事和政治勢力。

[2] 這裡沒有涉及中國情況。七十年代末期，它的農業份量特別不同，最初的改革側重於這個部門，有相當大的空間，提高生產效率，同時造成了大量

的農村人口外流，創建了新的工人階級，該政權的“歷史性”的社會基礎並沒有一起受到保護。

[3] 特別見：“東歐國家中的自由主義擴張”，2012年，<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4] 見“大西洋歐元能給巴爾幹穩定嗎？”，債務舒緩計畫手冊（和平研究和文獻研究所），2009年6月：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2004年八個中歐和東歐國家成為歐盟成員（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國），隨後在2007年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2013年是克羅地亞。在2003年薩洛尼卡理事會，其他的前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被確認為“可能的候選國”，儘管談判過程的結果是不確定的。見“西巴爾幹半島”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6] 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烏克蘭、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莫爾達瓦

[7] 見雅克·薩丕爾博客：
<http://russeurope.hypotheses.org/>

[8] 參見“從高加索到巴爾幹——不穩定的世界秩序”。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9] 見約翰·馬利·謝維（Jean-marie Chauvier）
<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20...>；溫森特·普熱孫眉（Vincent Présumey）、
<http://blogs.mediapart.fr/blog/vinc...>
Ukraine/



一戰世紀

艾倫·拉夫(2014年8月25日)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極端時代”一書中，把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1914年8月，標記為“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按霍布斯邦的說法，那個短世紀結束於德國統一和蘇聯“東方集團”解體的1989-1990年。他認為，1914-1918年的“大戰”，是該世紀的決定性事件。

就像霍布斯邦所寫的，正當九十年代早期南斯拉夫遭肢解時，他觀察到社區間的衝突重新點燃，地點就在代表“凡爾賽宮的老雞們再一次回巢”的“巴爾幹火藥桶”——意思是，1919年施加在巴黎以外地區的懲罰性和平的回蕩，一直持續至70年以後。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當然會注意到，那場“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之創傷在如何地繼續潰爛。

工業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第一次廣義“全面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總共的傷亡人數、包括軍人和平民，估計高達4000萬——受傷者更多，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士兵被芥子氣噎死或落得終身殘疾。

這場戰爭結束了數百年來由凱撒、沙皇、皇帝、中歐東歐皇帝和中東蘇丹的王朝統治；

把大英帝國帶到了最終消亡的階段；並把法國進一步降為次等強權。它結束了搖搖欲墜的“歐洲病夫”，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帝國，這個帝國曾經統治過南歐洲的大部分地區、西亞和北非。它助長了日本想成為主導東亞地區的帝國主義強權的欲望。

帝國的核心競爭

這場戰爭破壞，為1917年2月和10月的俄羅斯革命創造了條件，而且就像列寧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大膽宣佈的那樣，導致了第一次“構建社會主義秩序”的嘗試。同時，它預示著一個新帝國秩序的到來，因為美國已經具備了一個強國的生產力，從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正在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首要超級大國的路上。

雖然把戰爭完全點燃的火花幾乎是個意外——1914年6月末，奧地利王位繼承人弗蘭茲大公費迪南在塞拉耶佛被波黑塞族極端民族主義者刺殺——但這場戰爭的根源顯然則更深刻。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基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但不止於此，還包括一系列具體的因素——資本主義追逐的市場、原料、廉價勞動力、靜態投資市場，或者週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的解決方案。

在某種意義上，第一次全球戰火確實是國際範圍內綜合資本主義不平均發展的結果。雙方都有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協約國方面是英國以及法國和日本，後來加入了美國。同盟國方面由統一的德國領導，1914年時德國是歐洲大陸上最強最先進的經濟體。

各自的戰爭聯盟還包括半工業化舊秩序政權，這些政權已經被法國、德國和英國的資本

滲透了。俄羅斯加入了協約國一方，雖然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已經是衰落中的帝國，他們卻站在德國方面。一旦開戰，戰爭也提供了或真或幻的機會，讓一些“次級帝國主義”強權義大利、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強化他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收復領土的野心。

在這場戰爭結束時，為了懲罰性戰爭賠償，1919年戰勝者在凡爾賽宮迫使德國為這場戰爭擔負唯一的責任，這種強迫做法導致了阿道夫·希特勒與納粹的興起。但有很多“戰爭罪責”涉及者是多方面的。

戰前德國的執政圈肯定都渴望擴大該國所謂“陽光之地”的全球政策(Weltpolitik)。在製造業實力方面，德國已經是該大陸僅次於美國的主要軍事力量，德國起而挑戰英國，後者不再是“世界工廠”，但仍主導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商業和保險中心。

英國霸權的關鍵在於其“統治海波”的能力，瞭解到這一點後，不只是德國，還有美國和日本計畫建立自己的海軍，把它作為一種在全球投射實力和威脅的方式。長時間的進展，一個大國爭相獲取和控制正式和非正式的殖民地，“勢力範圍”和以前瓜分的或令人垂涎的領土，也加劇了競爭者之間的相關“陸地軍備競賽”和戰爭計畫突發事件。

重要的是，推進帝國野心的不只是經濟因素，還有突出相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膨脹的民族優越感觀念，“命運”和神定的“使命”。

那個時代充斥著“科學”種族主義——關於人民的種族等級劃分和變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說法，那虛假的教義（達爾文自己從未聲言的說法）“生存競爭，適者生存”被投射到所有民族。

各個主要交戰方都推銷自己的軍事成就或者“軍事種姓”，名義上總是“防禦”，推銷者是帝國主義戰略家，企業“說客”，保守政黨，一個沙文主義新聞社和一個致力於“男子

氣概”的男性神秘軍國主義。

在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他們王國統治者的神授權力時，把戰爭是治國的合理媒介和淨化全民健康的關鍵力量的說法，通過學校及大眾文化和講壇散佈開來。

在某種程度上，這場戰爭是作為一個嘗試來臨的，它試圖清算民族主義的舊賬——像法國的那些資源豐富的省份，如被普魯士在1871年扣押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另外，它不過成了多個強權長期爭奪戰中的一個確定回合而已，強權進行了一連串的長期爭奪，目的是控制東歐、中東、非洲、高加索地區和黑海及裡海地區——這些地區至今仍然令人覬覦，因為其具有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富有碳氫化合物和其他“至關重要的”資源。

在某種程度上，引起這場戰爭的原因，還有各交戰方都嘗試解決其內部的階級對立和社會動盪的影響，因為，在他們的基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轉換和日益嚴重的週期性危機。並不是各個統治階級都一致地把戰爭看成一條通向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的路。但是，肯定有人把帝國的擴張設想為補救國內階級動盪的一種辦法。

此外，許多在政治上有影響的企業金融公司，不受國界限制，插手破壞長期的既成結構，破壞帝國內部關係準則的穩定。正如霍布斯邦指出的：

“…資本主義積累的典型特徵，恰恰是它沒有節制。標準石油公司、德意志銀行或德比爾斯鑽石公司的‘自然邊界’是宇宙的盡頭，更確切地說，是其擴張能力的極限。”（帝國時代，318）

先是兩場巴爾幹戰爭和北非及其他地方帝國主義內部的爭端，導致1914年的強權陣營形成，大戰則接踵而至。還有，大戰之前，早些時候的衝突和社會動亂，也改變了歐洲強權的看法和現實。

最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俄羅斯敗在日本

手中，導致俄國革命的“預演”，鼓勵了維也納執政圈把奧地利當成地區強權，犧牲俄羅斯的“南方斯拉夫人”塞爾維亞表親——這成了巴爾幹緊張的一個關鍵原因。



全面戰爭，全面恐怖

中產階層年輕人——來自法國、德國、英格蘭、奧匈帝國和其他地方——執著於民族主義熱情，相信他們將“在耶誕節之前”回家，成群結隊的在8月份迅速地從軍。其他人，尤其是工人階級，表現了較少的熱情，而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動員起來的炮灰，大部分是裝備不良的農民募兵。

1914年11月，毀滅性的陸地戰激鬥到東面，法國東部僵持不下的軍隊已經深挖戰壕，為了超過四年的結局不定的互相殘殺而挖掘。

這場戰爭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可怕，受害者主要是大眾階層。總的統計資料肯定是低估了，但傳達出某種意義。被動員參戰的人數估計有6500萬人。其中，估計有680萬人的死亡與戰鬥有關，同時也許還有300萬人死於疾病。另外失蹤的770萬人，估計已死亡，而且大約有800萬人落下了終身殘疾。

由於一連串可怕但無結果的戰鬥，西部戰線的戰爭成為一個人間地獄，德國士兵會稱之為“榨血機”（blood mill），英國士兵“湯

米們”，稱之為“大型香腸機”。

單是一個無結果的相互殘殺，1916年7月至11月第一次索姆河戰役，估計造成了120萬人死傷。在接仗的第一天，單是英國就遭受了約60,000人的傷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在總共400,000人的傷亡中居第一。德國人的傷亡者約50萬人、非死即傷。

經常被忽略的是，總的傷亡人數，包括軍人和平民，在東方——奧匈帝國，俄羅斯、巴爾幹半島和奧斯曼帝國——就更高了。

戰爭國家資本主義

對於那第一次真正國際化的“全面戰爭”，一個人要如何開始把握它的性質呢？最新近的大戰史學家之一，約翰·H·莫繞，總結說：

“這場戰爭造成大規模的肆意屠殺。各條戰線成了屠宰場；軍官即屠夫；而文官政府，無論獨裁或民主，成了炮灰的動員者和屠殺的執行者。企業家和科技大師們提供和創建了數量令人驚歎的破壞工具；知識份子、新聞、電影和藝術為屠殺準備心理上的題材。合資格的男性人口成為炮灰；其餘的成年男子、婦女和青年成了勞工，生產屠殺他們的工具；孩子們，是未來戰爭的潛在參與者，參加愛國主義教育社交活動。這場戰爭使整個社會深陷泥沼。”

（大戰——帝國主義歷史，The Great War—An Imperial History, 72）

所有交戰各方訴諸於某種形式的戰爭國家資本主義，也即生產工具和生產力的所有權仍在在私人手裡，但國家購買戰爭物資，支付方式主要是貸款、信貸和通脹，那時及以後，這些費用都轉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因為經濟服務戰爭，於是由軍人或者文人領導的規劃機構，或者兩者一起，做各種協調，對資源作分配。

軍事化的國家資本主義運用所有可用的技術、工程和科學專長服務於這場戰爭。結果，

這是一個先兆，更糟的還在後頭，國家資助的研究與開發，導致那個時代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上，出現一連串快速的技術進步——改進的機槍、長程火炮和火器、引進了火焰噴射器和坦克、戰機、潛艇和毒氣。

如果說 20 世紀初帝國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戰爭國家資本主義則孕育了災難的最高階段。

最初，戰爭需求拉動了工作，至少帶動了英國、法國和德國那些與戰爭相關的技術和半技術行業。在美國，戰爭生產幫助把“大遷徙”中的黑人工人拉到北部工業中心。由於大規模的傷害仍在繼續，數以百萬計有經驗的產業工人受制於戰爭草案。他們在戰爭工廠的位置被非熟練者代替，其中有婦女、年輕和老年工人，戰區難民、殖民地義務兵和戰俘。

工廠越來越軍事化，這時工廠業主重組並加速適應美國式的大規模生產技術，而所有人都在忍受剝削率的增長，這就是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謂的“福特主義”。

國內戰爭也把新的約束紀律強加給整個人民。交戰各方立法，或頒佈“國土安全”措施，把持不同政見者定為刑事罪犯。國內監視和審查激增——聽起來不是很熟悉嗎？——因為國家不僅擴大了它的控制鎮壓機構和機制，還有募招的線人及愛國團體舉報“可疑行為”並強推思想一致性。

自然減員及其成本

作為其“全面戰爭”的另一部分，英國和法國利用軍隊和從其殖民地徵集來的勞工，並且從整個非洲、印度、印度支那和加勒比地區徵集來有色男人，為“文明”參加他們的戰爭。

有時，在西部戰線，法國和英國的指揮官把他們用作可犧牲的攻擊部隊，以便白人士兵不會“浪費”掉，在後方，這些殖民地居民依次經歷各種等級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和歧視，

無論他們是從法國非洲殖民地運來的成千上萬的士兵，還是 120 萬左右的印度戰鬥人員及在每個戰區為英國人服徭役的勞工，都是這樣。

當法國和英國動手攫取德國在整個非洲的土地時，殖民地軍隊也付出了代價。英國也犧牲了一些男子，這些人來自後來所謂的“白色統治”地——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

由於沒有一方能贏得一場決定性的“突破”戰鬥，全面戰爭成了消耗戰，旨在削弱敵人的戰力和鬥志。因此，各條戰線的戰爭經常抹殺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之間的區別，平民成了攻擊目標，如果不是直接的目標，就是經由貧困和苦難的攻擊而遭到傷害。

早期，英國海軍封鎖德國的北海各港口，部分原因是為了封堵德國戰爭艦隊，但更多的是為了制止任何與戰爭有關的物資包括食品的進口。德國人用潛艇戰對付英國商船，但西方協約國汲取巨大資源——來自於他們所有財產和美國的金融、原材料、農產品和人力——的能力最終提供了物質上的有利條件。

封鎖造成的消耗影響加深了，因為大批農村男性和牲畜尤其是馬，都被徵召。他們的缺乏，導致整個中歐和東歐的農業生產、特別是穀物，大幅度下降。剩下來可用的東西，首先供給忙於糟蹋整個東西部農業地區的軍隊。

在對戰爭生產至關重要的工業城市，由於食品供應減少，於是實行配給。到 1916 年-1917 年，黑市興盛，價格膨脹，大眾階層的購買力被削弱。

在這場戰爭的第三年，整個德國每週人均基本食品消費量暴跌。其結果是，婦女和兒童的死亡率達到 50%；死亡歸因於結核病增加了 70% 以上。出生率下降了 50%，而德國衛生局把約 730,000 人的死亡歸因於“饑餓封鎖”。奧地利，尤其是在維也納的條件則更加糟糕。

營養不良成為普遍情況，饑餓並非不尋常現象，而傳染性疾病、斑疹傷寒和霍亂，橫掃

整個東歐的弱勢群體——在俄羅斯有超過300萬人，而其他數百萬人在羅馬尼亞、波蘭、塞爾維亞和小亞細亞。

奧斯曼帝國的25%人口，多達500萬人喪生。絕大多數是平民，死于疾病或饑餓；其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和土耳其種族清洗的希臘受害者。

革命的後果

條件繼續惡化，徵兵或監禁的威脅再也不能阻止罷工和群眾的示威活動，活動的領導者越來越多地是遭受重壓和低工資的勞動階級婦女，她們常常是單獨養家的負擔者，常常不得不每天花費額外的數小時尋找食物。

1918年1月下旬，在柏林開始了全國性群眾罷工，涉及人數超過100萬人，要求的不只是食物，還有和平與政治變革——未來事件的前兆。國內動亂，伴隨著疲憊士兵們發起的大小不同的兵變，被形容為工業化戰爭的群眾罷工。

其中一個在1917年4月，由俄國二月革命發出聲音，集體拒絕繼續發動無謂的屠殺攻勢，涉及44個戰區的軍隊，有一半是法國軍隊，並且要求“停止屠殺”，要求“正義”和“和平”。

歷史學家認為，在西部戰線，新鮮的美國軍隊和物資的大批到來，是德國戰敗的決定性因素。但主要的同盟國已經筋疲力盡。各條戰線上的士兵實際拒絕忍受殺戮，整個歐洲一聯串爭取麵包與和平的平民罷工，顯然發揮了其歷史性的作用。當1917年-1918年俄羅斯和德國軍隊從內部垮臺時，當戰爭令人厭倦得“用腳投票”時，那時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特別重要的。

這場戰爭難以想像的艱辛和大規模混亂，迎來了1917年的俄國二月革命。俄羅斯專制主義死亡，取而代之的臨時政府願意繼續這場戰爭，協約國的措辭改為伍德羅·威爾遜重新定

義的戰爭目的，“使世界有民主的安全”。然後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奪權。

面臨著巨大的革命挑戰，並決心拯救年輕的革命，在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同德國在布列斯特締結了一昂貴的單獨和議。雖然俄羅斯統治階級的被剝奪，向世界各地被壓迫民族發出了革命希望的資訊，該協定加上對私有財產的革命徵用以及國有化，同時誘發俄羅斯資本主義盟友的永久仇恨。

這以後，十月革命立刻使得各地統治階層的最首要目標是反對革命，協約國的一個主要目標，即刻就變成了戰爭，目的是要使他們的世界免受布爾什維克“細菌”的傳染。

受到革命承諾的鼓舞，但也被可怕的條件和可能的歷史性轉機推動，1918年-1919年世界各地的階級衝突都點燃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戰爭破壞催化造成的自發起義，都被反動勢力擊退。最災難性的，是1918年-1923年德國革命的命運。（這個故事顯然過於複雜，無法在這裡詳細說明。關於背景知識，請參閱‘查理郵報’評論保羅·利未著作的論文，<http://www.solidarity-us.org/site/n...>）

當然，如果德國革命和義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工人階級的起義成功，就能為俄國革命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間，這樣的話，世界本來就會不同的。然而，在那些地方，來臨的是反革命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以及德國納粹主義的種子，因為在凡爾賽宮施加的報復性條件，確保了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怨恨持久，從而滋生了納粹主義。

與此同時，協約國武裝干預1918年-1920年的俄國內戰，早期由隱蔽的美國資金資助，讓伍德羅·威爾遜關於自決的戰時說法成了謊言，使得蘇聯涉及敵對的“包圍”中，這個問題至今仍然迴響在後冷戰時期的美俄關係中。

與此同時，在東歐的廢墟之上，新的國家興起或舊的國家復興，其中有波蘭、立陶宛、芬蘭和天生不穩定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估計有 3000 萬人傷於新邊界上的錯誤一方，成了幾十年來摩擦的一個根源。



勝利者，法國、尤其是英國，極力重排帝國地盤和重繪地圖，不只是在歐洲，還要在中東、非洲和其他地方這樣做。

阿拉伯人民曾被引導，使得他們期望，因為他們的戰時努力，其民族性會得以承認，可是英法否認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性，瓜分了奧斯曼中東。他們劃定邊界，界定了今天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及外約旦的最終“託管”，他們不理會種族、宗教或社區的關注，至今這仍然是個問題。

該區域的主要對抗的種子，已經通過‘戰時貝爾福宣言’種下了，英國承諾促進“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的家園”，規定“……任何可能損害巴勒斯坦現存非猶太社區的公民和宗教權利的事都不應做……”

戰爭的教訓激發了正在進行的結束歐洲殖民主義的鬥爭，來自印度、非洲、東南亞和加勒比的軍隊回國後，要求權利和“自決”。那些來自巴黎的人中有年輕敢鬥的越南人胡志明和南非泛非大會的成員，凡爾賽宮無視他們，自由主義的民主言論和帝國主義現實之間的鴻

溝，教育了他們。

協約國的盟友日本，試圖在凡爾賽宮的《國際聯盟盟約》中加上一條譴責種族歧視的條款，遭到英國和法國的拒絕後，突然離開。在戰爭期間日本攫取了德國在中國的租界，它很快就尋求擴大帝國在中國大陸的利益。義大利否認了加入協約國的領土的承諾，也離開了會議，並且很快轉向了墨索里尼，“糾正”凡爾賽宮的“錯誤”。

美國在這場戰爭之後上升，轉向確保未來全球金融動盪的經濟措施。非常簡單地說，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它提供貸款給德國，努力把動搖年輕的魏瑪共和國的戰後經濟危機穩定下來。柏林用這筆錢支付賠款給法國和英國。這些付款然後被後者用於償還大規模的戰時美國貸款。

一路賺取利息，當黃金跨過大西洋，以及直接投資流入德國時，相對穩定和信心得以恢復。那就是“道威斯計劃”的工作——也即，直到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迫使銀行要求收回貸款時，發生國家債務違約，以及國際信貸枯竭。

正如他們所說的，其餘的是歷史。

KARTE VON EUROPA IM JAHRE 1914

Gezeichnet von W. Trier



致蘇聯工人的公開信

托洛茨基

(1929年3月29日)

親愛的同志們：

所聲稱的內容。

我給你們寫信，是想再次告訴你們，斯大林、雅麗斯拉夫斯基等夥人正在欺騙你們。他們說我利用資產階級報章來進行攻擊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而這個共和國是我和列寧攜手創立及保衛的。他們把你們矇騙。我是利用資產階級報章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對付斯大林及其一夥的謊言、欺詐、和背信棄義。

他們要求你們譴責我的文章。你們有讀過那些文章嗎？不，你們沒有讀過。他們交給你的是一些片言隻字的偽譯文。我的文章是用俄文寫的，用俄文印成特刊，印文和原文全無不同。向斯大林要求把那些文章不作刪減和捏造重印出來吧。他不會有這個膽量。他恐懼真相，更甚於一切。我在此把我的文章內容歸納如下：

1、格柏烏〔蘇聯秘密警察局〕在關於把我遠解出境的決議中聲稱，我在進行「準備武裝鬥爭攻擊蘇維埃共和國」。而《真理報》的聲明(1929年2月19日第41期)，則刪掉了有關武裝鬥爭的部份。為什麼？為什麼斯大林不敢在《真理報》上把格柏烏決議中的言調重覆一遍？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相信他。繼弗蘭格爾事件的歷史和被斯大林派遣到反對派人士中間進行煽動發動軍事陰謀的特務人員被揭發之後，沒有人會再相信向黨諄諄勸導採納其觀點的正確性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正在準備一場武裝鬥爭，此所以，斯大林不敢在《真理報》上刊印格柏烏一月決議案

而倘若如此，為什麼仍需把這昭然若揭的謊言加進格柏烏的決議之內？因為這不是給蘇聯的人看的，而是給歐洲和外面全世界的人看的。斯大林通過塔斯社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報章唱和，每日有系統地發動他的誹謗宣傳，攻擊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人士。斯大林除卻指控反對派正在準備一場武裝鬥爭，無以解釋他數不勝數的逮捕和放逐。他用這些惡毒謊言，對蘇維埃共和國造成巨大的傷害，資產階級報章津津談論那些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斯米爾加、拉狄克、I.N.斯米爾諾夫、別洛博羅多夫、穆拉諾夫，姆拉齊多夫斯基等其他許多人，正在準備一場武裝鬥爭以攻擊蘇維埃政權，很明顯的這種見解在全世界的人眼中會是多麼的矮化蘇維埃共和國。斯大林為了開脫他的種種迫害，無法不堆砌出種種惡毒的傳奇故事，對蘇維埃政權造成無可估量的傷害。因此我才感到有必要在資產階級報刊上露面，向全世界說出：反對派有意發動武裝鬥爭攻擊蘇維埃政權，這並非事實。反對派是為蘇維埃政權發動了一場勇猛的鬥爭，打擊蘇維埃政權的所有敵人。將來亦會繼續如此。我這宣言刊登在報章上。在全世界以各種語言文字在上百萬份報章上流通。這份宣言將會鞏固蘇維埃共和國。斯大林要鞏固他自己的地位，用蘇維埃共和國作代價，而我是為了鞏固蘇維埃共和國，暴露斯大林主義者的謊言。

2、斯大林和他的報章從很久以來便向全世界宣傳，聲稱我認為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力量已經潰不成軍等等。在俄國，工人們都知道，這種宣稱是陰險的誹謗，是由一連串偽造的摘錄堆砌出來。我已經數以十次的用信件暴露這些捏造，這些信件經由手交手的傳遞得到流傳，但外面世界的資產階級報章相信斯大林那些捏造，或是裝作深信不疑。由斯大林主義者偽造的字句，在全世界新聞報章的專欄裡出現，用來顯示托洛茨基認為蘇維埃政權必然崩潰的論斷。有鑑於國際間的公眾輿論，尤其是廣大群眾對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目前到底正在製造著什麼事故，懷有巨大無比的興趣，而資產階級在商業利益，意欲提高銷路和讀者需求三者的驅使下，惟有刊登我數篇文章，我在那些文章中向全世界說，蘇維埃政權雖然處在斯大林領導層故意作出錯誤的政策之下，但蘇維埃政權深入紮根在廣大群眾中間，十分強而有力，將比它的敵人更長壽。

你們必須記得，在歐洲，尤其在美國，絕大部份工人仍然閱讀資產階級的報章。我把文章發表，附帶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全文刊載，不得有任何更動。無疑有數個國家的報章違反了這項條件，但大部份報章都遵守無誤，而無論如何，所有報章都不得不刊載這個事實，即是儘管斯大林主義者們大放謊言和誹謗，托洛茨基事實上相信深藏在蘇維埃政體的內在力量，堅決相信工人將會成功經由和平措施，令中央委員會現時的錯誤政策更改。

在1917年春天，當時仍在瑞士坐牢的列寧，動用了一廂有霍亨索倫王室印的火車，以便趕快

回到俄國工人之間去。沙文主義者的報章為此大肆攻擊列寧，甚至過份得把他稱為德國間諜，把他喚作德語的列寧先生(Herr)。我在君士坦丁堡在受到熱月黨人的監禁下，動用了資產階級的報章——將之作為「有印」火車來使用，以便向全世界說出真相。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先生」恣意攻擊，漫無節制而愚昧有加，亦不過是重彈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把列寧攻擊為「列寧先生」的老調而已。我和列寧一樣，對於庸夫俗子的公眾輿論和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心態，同是嗤之以鼻，心平如鏡。

3、我在文章裡說過，我是如何及為什麼被蘇聯放逐；雅羅斯拉夫斯基對這些文章弄歪作假。斯大林主義者仍在歐洲報章上大放宣傳性的厥詞，竟至於讓人以為是經由我自己請求而離開俄國的。我揭露了這則謊言。我說述了我是怎麼的被強送出國境，那是經由斯大林和土耳其警察達成初步協議後作出的。我的申述，不僅出於保衛個人利益，揭發誹謗，而首先更是為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假如反對派人士真的意欲離開蘇聯國境，這對全世界來說不啻是一個表徵，即反對派人士認為蘇維埃政府已是無可救藥，我們不會有一絲一毫離開國境的想法。斯大林主義者的政策，對中國革命、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和整個共產國際施予了可怕的打擊，並且也同樣對蘇維埃政權的內部穩定施予可怕的打擊，這是無可爭議的了。然而，局面絲毫不是沒有希望的。反對派絕對無意飛離開蘇維埃俄國。我明白無誤的拒絕越過國境，建議他們倒不如把我監禁起來。斯大林主義者們沒有膽量訴諸這項措施；他們恐怕工人會堅持把我釋放。他們寧可與土耳其警察討價還價，

由他們用強大武裝力量把我押送到君士坦丁堡，我把這些對全世界作出了交代，每個會思考的工人將會說，既然斯大林每日通過塔斯社向資產階級報章餵食誹謗詆譏來攻擊反對派，我也責無旁貸的要對這些誹謗作出反駁。

4、我在上百萬份報章內向全世界說出，把我放逐出國的不是俄國工人，不是俄國農民，也不是蘇維埃紅衛兵，也不是那些和我們一起在內戰的各條戰線上並肩作戰征服政權的人。把我放逐出國的是官僚們，是那些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搖身一變的成為為了特權而團結一致的官僚層。為了保衛十月革命，保衛蘇維埃共和國，和為了保衛布列派成員的革命名聲，我向全世界說出關於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們的真相。我再次提醒他們，列寧在他那篇深思熟慮的遺囑裡，把斯大林形容為不忠誠。這是全世界各種語言都明白的一個字，這個字的意思是指一個不可信賴或不誠實的人。他由不良動機指引着行動，是一個你不能相信的人。列寧就是這樣的把斯大林定性；我們再一次看到，列寧的警告是多麼的正確。對一個革命者而言，沒有比欺騙黨，比用謊言毒害工人階級的腦袋更大的罪行了。而這正是斯大林當前的首要工作。他欺騙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階級，誣稱反對派對蘇維埃政權懷有反革命的意圖和活動。這正是由於斯大林具有這種行動的內在傾向，列寧把他稱為不忠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列寧向黨提議把斯大林革除職務，經過發生了這許多事情之後，現在更有必要向全世界解釋斯大林的不忠誠是什麼，就是他對反對派的背信棄義和不誠實。

5、誹謗者們(雅羅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斯大林

特工們)在美元題目上大造文章，引起一場喧嘩。倘非這樣，實在沒有必要降格談論這種廢話。可是最心懷不軌的資產階級報章以散佈雅羅斯拉夫斯基的厥詞為樂，為了讓事情一清二楚，我便向你們談述美元的問題吧。

我把我的數篇文章交給了一家駐巴黎的美國通訊社，列寧和我都曾經多次就此或彼問題接受這些通訊社的訪問，或者把陳示觀點的文章交給它們發表。鑑於我被逐出國及事情的神秘迷離，令全世界對整件事情懷有極大興趣。通訊社在這則新聞可以得到很可觀的利潤，遂向我提出把一半收益歸我。我的回答是我個人不會拿取一仙一毫，但根據我的指示，通訊社須把我的文章的一半收益支付，而我將利用這一筆錢出版列寧多篇著作(演詞、文章、信件)的俄文版及其他語文版。列寧這些著作，由於斯大林的出版檢查而在蘇維埃共和國受到禁制。此外，我也將運用這筆錢來出版黨一系列重要文獻(大會報告、會議報告、函件、文章等)；這些文獻由於清楚無遺的展示了斯大林在理論和政治方面的破產而給隱瞞起來。我打算出版的就是這些「反革命」文獻(用斯大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話來說)。在適當的時候，有關用在這方面的準確數字和賬目，將會刊登出來。每個工人將要說，把這些從資產階級方面得到的偶然捐獻用來出版列寧的著作，比起從俄國工農方面募集得來的金錢用作攻擊布列派的誹謗宣傳，絕對要好得多。

同志們，請不要忘記：在俄國，列寧遺囑仍然一如既往的是一份反革命文件，你們由於將之散發而遭受逮捕、流放。這並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在國際範疇上發動起一場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

在全世界每個國家，現在難以找到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在列寧時代領導著黨的革命家。列寧時代的革命家們差不多全都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列寧為共產國際的最初4次大會作指導；與列寧一起，我為共產國際起草了所有基本文件。在1922年第四屆大會，列寧與我平均分擔有關新經濟政策和國際革命展望的報告。自列寧死後，共產國際最初4次大會幾乎所有的參加者——起碼是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參加者，俱無一例外的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在全世界每一處地方，現時的共產黨的首腦都是偶然加入的新人，這些人來自於我們的反對者和敵人的陣營，在昨天才參加到共產黨。為了通過反對列寧主義的政策，首先就必須推翻列寧主義領導層，斯大林完成了這次工作，靠的是官僚、新小資產階級圈子、國家機器、格柏烏和國家的財政資源。他不僅在蘇聯完成這項工作，並且在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美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一句話，幾乎在全世界各國完成這項工作。

列寧在蘇聯共產黨和整個共產國際中最親密的戰友、攜手與共的同志，還有所有共產黨在最初期的艱苦歲月的領袖，共產國際最初4次大會的所有參加者和領袖，都會一一的被撤去職務、被誹謗、被開除。只有盲目的人才不理解這項事實的箇中意義。對於斯大林主義者來說，為了完成反列寧主義的政策，這場反對列寧主義領導層的瘋狂鬥爭是必不可少的。

他們在對布列派窮追猛打之時，向黨保證，黨現在會是大一統的了，而你們知道黨現時四分五裂，這一切仍未到達盡頭。斯大林主義的道路沒有回生之道，你要麼是採取烏斯特里亞洛夫主

義的政策——也就是貫徹到底的特爾米多「熱月派反動」政策，要麼是採取列寧主義政策。斯大林派中派主義立場，勢將加劇經濟政治的深重困難，令黨不斷耗盡元氣，沉淪滅亡。

要把路線扭轉，為時未晚。必須採用反對派綱領立場的精神來斷然改變黨的政策和體制。必須中止對蘇聯及全世界共產黨最優秀的革命者所作的厚顏無恥的迫害，必須讓列寧主義領導層恢復工作職位。必須譴責、根除不忠誠——亦即是斯大林機器的不可信賴、不誠實的方法，反對派將全力以赴，作好準備，以協助黨的無產階級核心去完成這項生死攸關的任務，不論狂熱的迫害，無信義的誹謗和政府的壓迫，皆不能消滅我對十月革命和列寧國際黨的忠誠。我們將忠貞如一，堅持到底——在斯大林主義者的監獄如此，在流放地也如是。

致布爾什維克的敬禮

里昂·托洛茨基

(史丹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懷念阮金兆同志

姜君羊

阮金兆同志在耄耋之年與世長辭，消息傳來，使我感到無比悲痛，原因是他與我有着半個多世紀的真摯友誼，他是最親愛的朋友中最親密的一個，即使在我們長期音訊隔絕的情況下，我們的心總是相通的。

阿金同志姓阮，原名金兆。他在中學讀書時便接受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教育，是當時學生中抗日運動的積極份子。四十年代初，他曾從師鄭超麟學習俄國革命史，他曾把托洛茨基著作中有關蘇聯問題的言論編輯成一本小書，書名《托洛茨基論蘇聯的命運》，署名劉綺英編，由上海歷史研究所出版。這本小書簡要介紹托洛茨基對蘇聯社會性質、斯大林官僚集團的形成、蘇聯社會發展的前途，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托派保衛蘇聯的政策等問題觀點，揭穿了當時流行的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和托派進行無恥的誣蔑和中傷，使讀者從中明白事實的真相。

他離開中學之後，曾有一段時間到農村去開展群眾運動，後來即轉去香港從事工人運動。在群眾集會上，他是個出色的演說家，能夠深入淺出地把革命的道理講解得明白易懂，使聽眾易於接受。

1947夏天，我第一次到香港見到他時，他的公開職業是一間小商店的伙記，但他卻是香港托派華南臨委的領導人之一。有一天他帶着我從西營盤坐電車到筲箕灣去，沿途給我介紹香港的市容市貌，路經當時太古船塢廠區時，他對我說：如果適逢上工或放工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延綿幾里路的浩浩蕩蕩的工人是何等的威武雄壯。工人階級是當代大工廠作為基地集合起來，任何社會都離不開勞動生產，工人階級就是當今社會主要的生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經驗證明，現代社會可以沒有資本家和地主，但不可以沒有工人和勞動農民。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農民只要具有社會主義的覺悟，組織起來進行鬥爭，使自己成為社會的真正主人，就一定能夠使社會沿着公正、平等、自由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他的這些話使我終生難忘。

那一年也是香港二萬多機器工人大罷工的時候。當時香港托派組織一直是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阿金作為托派領導人之一，自然是義不容辭地同工人同志們一起日以繼夜進行工作，動員廣大的工人群眾投入到罷工鬥爭中去。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托派組織召集的各工廠罷工積極分子的會議。那時的香港是在大英帝國的軍警統治



Two of the posters painted by Diego Rivera for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1931. Left: The Operating Right: Education of
Proletariat by Diego Rivera

之下，這樣的會議只能秘密召開。會議的地址就選在某山洞裏，會議從夜幕降臨後開始，議題就是如何發動全體機器工人群眾團結起來去爭取罷工鬥爭的勝利。會上的討論非常踴躍熱烈，其程度的激烈使我作為旁聽的人也感到熱血沸騰。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剛亮的時候才結束，雖然經歷了整晚的唇槍舌劍的辯論，與會者卻沒有一絲疲勞之意，便精神抖擻地各自回到工廠投入到火熱的群眾鬥爭中去。這就是當時真真正正為工人的利益進行鬥爭的香港托派。

1948年中國托派中以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一派籌備成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阿金積極參加這一建黨工作，他帶領一個地方組織開展黨綱、黨章的學習和討論，並為建黨開展群眾活動，他雖然沒有出席1948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托派建黨大會，但卻被大會選為新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之一。

我在80年代才得以離開牢獄大門，此時，我與他已經是40年不知音訊，但，當他知道我生活困難，雖然他並不是富有，卻盡可能給我經濟援助，使我得以免除挨飢受寒的痛苦。對於他的無私援助，我既感激，也愧疚。當我流露出深心的感情時，他總是說：不要說什麼感激的話，我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建立起來的友誼，比什麼都珍貴，這絕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由此也常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時代流傳的各國工人階級互相支援的許許多多故事。有個故事說：某國的一位工人同志，在國內被捕，逃到別國去，但由於人地生疏，孤零零單身一人陷入了絕境，但他會唱國際歌，因此得到了別國工人階級同志的幫助才渡過了難關。這個故事固然說明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也生動地反

映了肩負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同志之間大公無私的關係和純真的友誼。這同當今統治階級中追名逐利，爭權奪利，鉤心鬥角，你虞我詐的人際關係是多麼鮮明的對比！

金無足金，人無完人，阿金在個人生活中有着應當受到責備的缺點，但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實現社會主義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確實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盡到了他所能盡的責任，這就足以使他感到此生無憾了。

阿金同志永遠離開這個直到今天到處充滿了種種災難的世界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行舉止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永遠也不會抹掉。我們面對的當今世界，到處的貧困、飢餓、疾病、死亡，以及野蠻的恐怖主義，報復主義，復仇主義和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這一切禍害，歸根結底都是由於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阿金仇視這個制度，也堅信唯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才能使人類免除陷於野蠻和毀滅的厄運。阿金為此奉獻了他的一生，這就是我懷念他的原因。

2004年9月



清明瘋之一

陳中禧

想念清如春雨
明如綠山的恩情
這年頭忽冷忽熱
風也狂雨也咒
不慣嗎旋踵麻木

人勸接受說謊成災
真理埋故土
獨有幸年年自這天始
清醒如竹，清心如苦蓮
為前人種田
送上鮮花

何時在還您們死拼予尊嚴的時候
不再歎息歷史沒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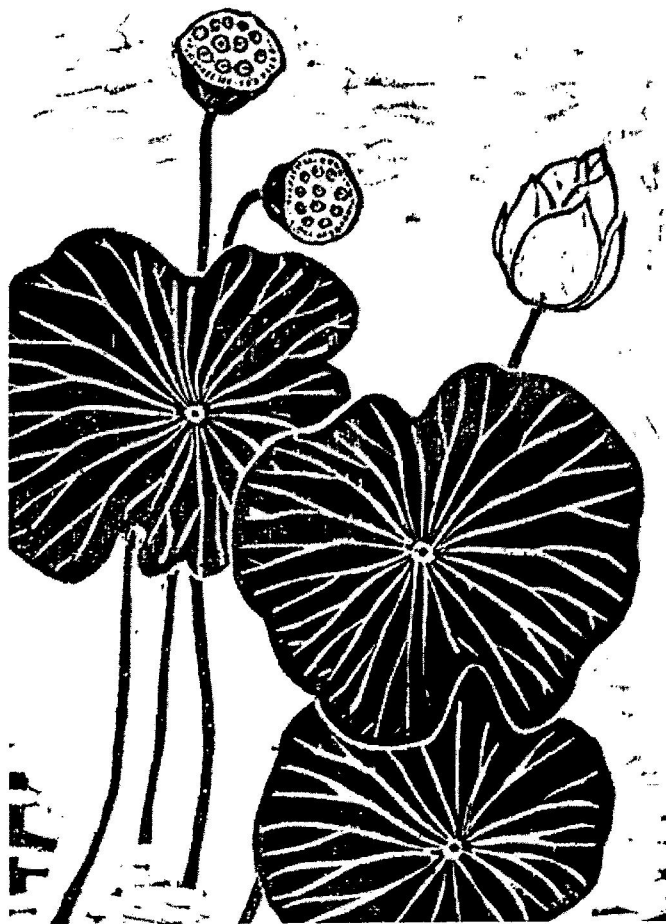
之二

這個記憶改遺忘最好
絕不可在插上鮮花
盛載香禮的時候想起

一束花在思考
一個記憶太富有
民族之沒落在於禁制
這個記憶太富有

司馬遷的名字叫記憶
杜甫的別字叫記憶
艾青的詩也叫記憶
五月三十五的記憶
太富有

2015歲次乙未清明後20天



紀念周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轉載)

楊林



周仁生先生離開我們已十個年頭了，他慈祥的音容笑貌、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他為人的光輝形象，深深印入我的腦中，永遠不能磨滅。他是一位忠誠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者，終生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信念；又是一位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精通英語、語言生動、誨人不倦的傑出好老師；更是一位才華橫溢、博古通今、文筆優美、嚴謹、清晰、流暢的一位翻譯家。

他絕頂聰明、又勤奮好學，在溫州中學上學時從初一到高三六個學年段，他的成績是六個第一名，是溫州中學校史上絕無僅有的。他不僅專心學習功課，還博覽群書，眼界開闊，思想進步，愛國愛民，心懷全世界窮人的疾苦和命運。1942年他受從蘇聯留學歸來在浙江大學任教的安明波

教授的托派思想影響，從而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和托派觀點。當時托派被斯大林誣之以托洛茨基匪幫的惡名，中國共產黨的王明、康生之流陰謀家捏造為“漢奸”、“間諜”。這麼聰明的周仁生為什麼在革命道路上選擇了托派呢？其實並不費解，但說來話長。這要從托洛茨基這個人物說起。托洛茨基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傑出的理論家和領導者，他領導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當時列寧為躲避被捕，不在現場，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反對武裝起義。是托洛茨基領導了彼得格勒工人，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國內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支持下掀起內戰，蘇維埃政權岌岌可危。在這緊急關頭，他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要職，組建了紅軍。在兩年半的內戰烽火中，親臨前線、身先士卒，粉碎了鄧尼金、高爾察克等英法支持的叛亂，拯救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內戰結束後，經濟建設的命脈鐵路運輸徹底癱瘓，又是托洛茨基兼任鐵路人民委員職務，用鐵的紀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恢復生機。因此托洛茨基當時的威望很高，是僅次於列寧的蘇聯領導人。而十月革命中的斯大林默默無聞。(根據普金政府制定的《俄羅斯歷

史統一教科書新教學法總體構思框架》大綱在涉及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一章中，列出以列寧為首的11位黨政軍要人名單中卻沒有斯大林。)

在內戰中斯大林操縱的軍事反對派嚴重干擾了紅軍的戰略部署，列寧說他沒有理論和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有強烈權力慾，利用職權，安插親信，想建立聽命於他的集權統治。特別利用列寧患病的機會，獲得中央委員會指派他為患病列寧的監護人，千方百計限制列寧的活動，還指示在列寧病榻前所發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匯報，連醫生的處方都要由他處置，甚至在電話裡對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進行無端辱罵和威脅，引起列寧極大憤怒。當列寧發現斯大林在對外貿易權問題上的錯誤和在格魯吉亞民族問題所採取的粗暴和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考慮決定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徹底改變黨的建制，擴大中央委員會的規模。1923年3月5日，列寧授權托洛茨基為格魯吉亞事件辯護，以及給斯大林的最後通牒。列寧把有關撤換斯大林的文件交給托洛茨基，要他在黨的十二大上宣佈。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顧慮黨的分裂，仍希望斯大林能改正錯誤，使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而沒有公佈列寧的文件(即所謂列寧的遺囑)，這正好給斯大林為獲取最高領導權而清除最大障礙的托洛茨基提供了絕好機會。結果政治局全體六人中，除了列寧病

逝，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先後被槍斃，斯大林從此獨攬大權，但還不放心，派人於1940年8月21日將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鎗暗殺了。

中國赴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親身經歷了蘇共黨內的鬥爭。他們最關心的是1925 - 1927年中國大革命。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要中共參加國民黨。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就多次反對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只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要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許出版共產黨的報刊，這等於扼止了黨的喉舌。斯大林武裝國民黨，陳獨秀要求給共產黨5000支步槍，斯大林都不答應。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斯大林通過在中國的顧問迫使中共向蔣介石妥協，特別是北閥軍已到達南昌，陳獨秀組織上海工人舉行武裝暴動，趕走了佔據上海的軍閥軍，但斯大林却認為這會影響與蔣介石的關係，要中共解除工人武裝，將勝利果實交給蔣介石。結果蔣介石順利進入上海後，馬上下手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和工人，即“四·一二”事件。但就在“四·一二”前一個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還說蔣介石是遵守紀律的，是最革命的。四·一二慘案後，斯大林認為汪精衛代表國民黨左派，是革命的，要中共參加武漢政府，結果三個月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寧漢合作，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對

共產黨人大屠殺，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斯大林不僅不為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人頭落地、大革命失敗負責，反而掩蓋事實，嫁禍於人，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身上，給他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投降主義帽子，並撤掉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唆使新任總書記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說大革命失敗，我們黨有責任，但要全黨承擔，對革命不利，那就讓獨秀一人來承擔吧！這樣顛倒黑白，陳獨秀能服氣嗎？留蘇學生當時在莫斯科親身見到和聽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主張，他反對中共參加國民黨，建議共產國際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裝，在革命高潮時要建立蘇維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被斯大林封鎖，不讓中國共產黨人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當時分成支持斯大林與贊同托洛茨基兩派。隨着這批贊同托洛茨基主張的留學生歸來，並帶回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當陳獨秀讀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文件時，恍然大悟：“這就是我所主張的中國革命道路”。於是堅決與斯大林路線決裂。由於陳獨秀當時在黨內威望很高，一批黨內高幹如時任宣傳部長的彭述之等人也都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在黨內形成反對斯大林派的左派反對派。斯大林知道後命令將他們開除出黨。陳獨秀還是要革命的，他聯合了當時從蘇聯歸來的留學生們成立托派組織，組成了以托洛茨

基的“不斷革命論”為指導思想的中國托派，進行中國革命活動。

周仁生在浙江大學學習期間，在安明波教授指導下，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知悉十月革命和蘇共黨內鬥爭史，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接受了托派思想，至1946年4月，毅然加入托派組織。1946年7月，周仁生先生離開溫州，去上海參加彭述之、劉家良領導的托派多數派，擔任宣傳工作，並參加《青年與婦女》編輯部，1948年8月參加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建黨大會，繼續擔任宣傳工作。斯大林在世是不會放過托派的，1952年冬至，周仁生先生與中國大陸所有托派同時被捕，他被判無期徒刑。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死亡，而周先生却被關押27年，直至1979年6月5日才恢復公民權。

周先生回到溫州，在溫州教育學院擔任外語教師，深受學生歡迎，並在他教的畢業學生強烈要求下舉辦英語進修班，要求跟他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教材越來越深。他們學完外國語學院的英語教材和四冊《新概念英語》，周先生繼而自編教材，例如選自《讀者文摘》等英美文章，不斷提高水平。這批學生跟着周先生每周學習兩個晚上，一直堅持22年，這在外語教學史上是空前的。周先生更把主要精力用於翻譯革命文獻，為《十月評論》等刊物供稿，翻譯法文版的《彭述之回

憶錄》第一卷、英文版的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第二卷。這部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發行的《先知三部曲》三卷集，贏得1999年全國十大好書的榮譽。周先生深厚的中文和外文的功底和涵養，對原著的歷史背景和政治事件的透徹理解、文字表述的準確、流暢、清新、優美躍於紙上。

周先生一生清貧，節衣縮食，高風亮節，每日勤奮鑽研學術至深夜。對學生熱心關懷，諄諄教誨，為人楷模。自年青獻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身處逆境，始終樂觀堅持革命信念直至離開我們，深感痛惜！

一個革命者不能以個人壽命的尺度去衡量歷史進程，否則就要犯急性的左派幼稚病。從十月革命至今一百來年，國際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不斷增長，創造了大量物質文明，表明它還有生命力。而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在資產階級社會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它不斷為自己制造危機，2007年的金融危機至今仍未消退，使整個歐洲一蹶不振。這表明財富極大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矛盾就越尖銳。難道金融巨頭有一天會自動變得不再貪婪？不論資本主義還能

延續多久，它終究不是終極的社會形態，1991年蘇聯解體，只能表明斯大林主義的失敗，而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歷史的使命鞭策一批又一批走在前頭的人，不斷去提醒人們新的更合理的社會形態終將來臨，周仁生先生就是其中一批中的一員，嚴肅而認真地認識社會所發生的一切規律，並在這規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也是他選擇這條艱辛的道路，成為不把自己的任務消融到現實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滿足。

我崇信歷史唯物主義，正如中央編譯局施用勤先生等人在《托洛茨基自傳》譯者前言中所指出：“歷史(畢竟)是公正的，它不會永遠任人篡改，遲早會做出它的莊嚴宣判，嘲弄歷史者必將受到歷史的嘲弄！”



浙江海寧訪王凡西之子(轉載)

潘惠蓮

距上海約一小時車程的浙江海寧市，常標榜出了兩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實它還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鄉，他的筆名「雙山」便是源於海寧市中心的兩座山：東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專制獨裁，王凡西的名著《雙山回憶錄》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海寧就更不會有紀念他的設施。筆者月前到訪海寧，有緣找到王凡西的長子王宇平，他已年屆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肅托」後，就被下放到海寧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機會到英國，與分別近四十年的父親重聚。

王宇平一九三〇年生於上海，是王凡西與首任妻子葉英所生的長子。他說，父親一九二五年進北京大學唸書後加入共產黨，與母親同是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於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蘇聯留學。至於父母的婚戀經過，他並不清楚。父親在英國時曾不經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其貌不揚，在蘇聯時卻想追求你母親。」

王凡西在蘇聯期間，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其後稱為托派），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而遭中共開除黨籍，其後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的發展。於三一年當選為統一的托派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但一個月後，王凡西、樓國華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國民政府逮捕下獄。鑑於形勢兇險，王宇平被祖母帶回家鄉撫養。監獄的惡劣環境，令王凡西染上嚴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獄時，留在上海的妻子葉英已帶同幼子改嫁，他無奈回到家鄉海

寧，租住西山上一間小屋養病。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參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創辦論政刊物《鬥爭》及《火花》，繼續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與馬裕生結婚。一年後誕下女兒鳳崗（翌年夭折），女兒出生不足兩個月，王凡西再次被國民政府拘捕，關押在南京監獄。日本空炸南京時，監獄被毀，國軍敗退。王趁機逃脫，輾轉避難到香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繼續托派的工作。

此後幾年間，儘管飽受斯大林派的誣蔑和種種打擊，中國托派不但再度活躍起來，還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員。當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文字宣傳方面。他出任公開的《動向》月刊編輯和撰稿，並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國托派因政見不同分裂為兩派：彭述之與劉家良領導的多數派，以及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樓國華領導的少數派。二戰結束後不久，少數派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執筆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駐上海前夕，由於擔心中共打壓托派，王凡西與樓國華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建立聯絡站，幾個月後，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當局逮捕，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以教學和寫稿維生，不斷思索和評論中國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寫成極具史料價值的《雙山回憶錄》，其後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雙山」是他眾多筆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連根」這筆名發表論證文章，跟他交往的後輩都稱呼他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幫助移居英國，至二〇〇二年，在英國利茲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養育，與父親聚少離多，跟後母的關係則並不融洽。生母改嫁後，在抗戰期間帶同幼弟到了重慶生活，起初有書信往來，後來便失去聯絡。因為生活貧困，王宇平十多歲就到杭州打工謀生，他記得父親臨離開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囑他好好照顧自己和祖母，道別時還輕撫了他的頭。

王宇平在五〇年參加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財務管理，幾個月後就獲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門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澤東為討斯大林歡心，大舉整肅境內的托派分子（稱為大肅托），連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王宇平因父親的關係也受牽連，無法留在杭州政府機關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鄉海寧當小學語文教師。

王宇平稱，可能少時已投身社會工作，知道世途險惡，須低調實幹做人做事，所以雖經歷了連番政治運動，總算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大肅托期間，王凡西的兩個侄、一個內弟及他們好些朋友，都受到牽連而被捕，一個侄更死在獄中。有關父親的事，王宇平長大後才逐漸有較多了解，明白父親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實行起來又是否如他所想像的？王宇平表示：「難說了！」

王凡西到澳門初期，仍與兒子保持聯繫，其後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通信。其後王宇平見政策較為寬鬆，便主動向父親提出到英國會面，最終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於當時經濟拮据，只夠錢買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回程費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問他當時感受，王宇平帶點感慨說：「很平淡，我們都是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激動的心情，就像見到一個熟朋友的感覺，我連『父親』兩個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紀大，沒來接機，他的朋友把我從倫敦機場送到長途汽車站，我獨自坐車到利茲，他在車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與父親相聚了四個月，他形容父親是一個十分隨和的人，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過著獨居簡樸的生活，但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好些學生和學者都愛跟他一起聊天飯聚。父子倆的話題卻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閒話家常，只記得父親曾提及中共黨內最壞的兩個人是王明和康生。

自小缺乏父母關愛的王宇平表示，長大後逐漸體會到母親當年帶同幼弟離去，以及父親遠走他方，都是為勢所迫，心中已無怨憤。既嚐過骨肉分離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陸的妻女有著自己同樣的經歷，而且父親在英國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沒想過要留在英國。

回程時為了省錢，王宇平經香港坐火車回大陸，在香港逗留的幾天，由父親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長毛」梁國雄。王宇平說：「他為人熱情，照顧周到，陪我到山頂遊覽，離開那天，還親自送我到紅磡火車站。」

隨著前蘇聯為托派平反，中國對托派也轉趨寬鬆，被指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領導人的鄭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獄後，中共給他「上海市政協」的虛銜；從人民出版社分枝出來的東方出版社，在二〇〇四年亦以只供內部流傳、半公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然而，托派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深刻尖銳，王宇平估計在未來數年，中共對托派分子的態度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王宇平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王燕祺居於上海，但彼此沒有聯繫。王凡西去世後，朋友把他的骨灰運返香港寶福山安葬。到二〇〇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馬裕生亦離世，王燕祺來港把父親一半骨灰帶返上海與母親合葬。這對分離了逾半世紀的夫婦，終於可在人世間以外的地方再續情緣。

Release Immediately Gao Yu, Pu Zhiqiang and All Dissidents !

Zhang Kai

Under the CPC policy of suppressing press freedom, a lot of Chinese dissidents such as Gao Yu, a well-known journalist, Pu Zhiqiang, a human rights lawyer, Tang Jingling and Lu Ji, were arrested, detained, or sent to prison. This shows again that the CPC has fabricated many wrong cases.

In April 2015, a Beijing court convicted Gao of leaking state secrets, such as the "Document No. 9", to Hong Kong's *Mirror Publisher*. Although she denied the accusation, she was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It was said that she was forced to plead guilty, as her son, Zhao Men, was under threat. The so-called "state-secrets" refer to CCP's policy of Seven Speak-Nots, which had already been publicly carried out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Gao Yu's profession is to speak out the truth. On 3 June 1989, she was arrested for her news reports on the students' movement. She was released in August 1990. In 1993, she was again arrested and sent to prison for six years, due to the accusation of leaking state secrets. In February 1999, she was allowed to have compassionate release. Meanwhile, she continued to contribute many article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al changes of China to Hong Kong and overseas media. She steadfastly defends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defying the oppressive regime.

Pu Zhiqiang's profession is to defend people's legal rights, particularly defending dissident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He was arrested one year ago. Recently the Beijing court charged him of "inflicting racial hatred and causing social disturbance", due to his postings on Sina Weibo. His comments on Xinjiang and ethnic violence, including an attack on March 1, 2014, by Uighurs, the mostly Muslim, Turkic-speaking people native to Xinjiang, at the train station in Kunming,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at killed 31 people, are as follows: "If you say Xinjiang belongs to China, then don't treat it as a colony, don't act as conquerors and plunderers, striking out against any and all before and after, turning them into the enemy. This is an absurd national policy (May 7, 2014). The Kunming incident was too brutal, the attackers' sins were grievous. If you say Xinjiang is producing terror, now I believe it, but this is effect, not cause. The deaths and injuries were utterly horrendous, the repercussions too grave. You tell me that you bear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avagery of the Xinjiang independents, then I'm not satisfied" (March 2, 2014). His arrest shows that people cannot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in mainland China.

Pu actively joine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and joined the hunger strike at Tiananmen Square. He was arrested three days after he participated in a seminar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June-Fourth Movement. This is obviously a political prosecution by the authorities. There is no rule of law at all in today's China. Gao Yu complained that the authorities trampled on the judiciary.

In October 2014, the CPC passed the decision on the rule of law by the country, however, it was sti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ty. On 23 April, addressing Japanese experts' questions on how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fulfilled the rule of law, Wang Qishan, the secretary of Committee for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of CPC, clearly answered that it ha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system of judiciary in China was complete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is proves that the authorities negate the rule of law, undoubtedly leading to tremendous wrong cases. People will fight against this injustice and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all dissidents in jails.

6 June 2015

Postscript:

On 8 June,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the White Paper of Progress of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14. According to Item 2 of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detainees and criminals", dissidents like Gao Yu, Pu Zhiqiang and other dissidents should have this rights of the person and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10 June 2015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Reality of China

Zhang Kai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PRC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14 on 8 June, stating that China has obtained achievements in nine aspects: Right to Development, Rights of the Person, Democratic Rights, Right to Impartial Trial,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Rights of Women, Children and Senior Citizens,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Right to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and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if the Paper speaks the truth.

Right to Development and Rights of the Person

The White Paper claims that the annual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people has increased respectively by 6.8% and 9.2%. However, it does not recognize that CPC has implemented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led to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ccording to China's Family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issu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13 May, the top 20% of the annual family income is 19 times more than the lowest 20%.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UBS/PwC 2015 Billionaire Report, issued on 26 Ma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alth creation has shifted from USA to Asia, particularly China. Now a new billionaire is born every week in the first season, amounted to 224 - 300 billionaires, with total assets of USD 37 trill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over 100 million poor people. On 5 May, NDRC announced that the price of medicines was mainly decided by the market. That means people have to spend more money. It was reported that over hundred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demonstrated outside the office building of Chongqing Government. In terms of Rights of the Person, it states that "China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over foodstuffs, improv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production safety, combated terrorism according to law,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detainees and criminals, and stepped up drug-control efforts to protect citizens' personal rights".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lots of cases of abuses of human rights. Dissidents are always detained, prosecuted, and sent to prison. The recent examples are human rights lawyers such as Tang Jinning, Wang Qingyin, and Yuan Xinting. Moreover, feminists such as "five sisters of human rights" were arrested because of organizing activities of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during 8 March Women Day.

Democratic Rights and Right to Impartial Trial

The Paper announces to set up the Day of Constitutional Law. Ironically, Hu Jia, Beijing human rights activist, spent the day under home arrest. He wrote on his blog that "any citizen who carries placards stating Constitution, Democracy, and Liberty, walking along the roads in Beijing city, will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The Party has superpower while people's voices are suppressed."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number of netizens has achieved 650 million, so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platform of getting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ng opinions. However, on 18 June 2014,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issued the notice of not allowing any news report across disciplines, or any criticis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ing unit. Recently, the outspoken 21st Century Web has been forced to close down. The influential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was required to re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ssued on 16 December 2014, China is the country hav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journalists and net media workers in prisons. In 2014, there were 107 journalists and civil reporters in prison, amounting to 30% of the world. The Report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e case of Gao Yu.

On the other h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recruited thousands of young volunteers of net civilization. They are required to promot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nd to make flattery comments about CPC's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Right to Impartial Trial, the Paper claims that "in 2014 the people's courts at all levels concluded 2,708 state compensation cases, and decided on a compensation amount totaling 110 million yuan. China has improved the criminal victim relief system, reducing or exempting litigation fees totaling 180 million yuan, so as to protect the litigation relief rights of impoverished people." However, many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lawyers like Pu Zhiqiang and dissidents like Liu Xiaobo were detained or arrested without open trial.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Paper claims that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made new developments in various social programs", and there are 358 living Buddha. But how can this prove that ethnic

minorities' civil,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rights were further guaranteed? The authentic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should be the rights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by the dominating Han ethnic group, ethnic minorities like Tibetans and Uyghur people have suffered. Their desperate and armed resistances are labeled as terrorist attacks.

Worse still, the facial appearance and cloth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It was reported that Kashgar court charged a Uyghur man of wearing a beard and his wife of wearing a veil and robe. It led to serious criticisms by netizens.

Rights of Women, Children and Senior Citizens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people’s courts at various levels concluded 1,048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the kidnapp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sexual assault on minors, “the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rate of AIDS dropped to 6.3 percent”, “home care and community services now cover 70 perc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still cases of women fighting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Gender equality is not yet achieved. Moreover, the tragedy of dead children in remote areas disclosed that the marginality become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For example, in Bijie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four poor children committed suicide. Last year, five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found dead near the rubbish bin. It is reported by People’s web that there are 60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countryside. The rural elderly are also suffering.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68.4% of rural old people mainly depend on their children’s earnings, the second i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farm products, and 54.6% are still doing heavy farm work. Some are even abandoned and become beggars in the city.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re is “the introduction of living expense subsidies to disabled person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of nursing subsidies to those suffering from a high degree of disability”, “blind people who sat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2014 took the exams in braille, o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udio device. Special staff was provided to assist them in taking the exams”. However, it is not enough. How about those suffering from “a medium or low degree of disability”?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with jobs, in order to earn a living.

Right to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The Paper clai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ave the country's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igh priority, making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safeguard the people's right to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exploring a new way to make ecological progr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markable result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unishments for activities violating environmental laws were intensified. In 2014 China made an enormous adjustment to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mplishing the year's goal of abolishing outdated production capacities in 15 key industries like steel and cement”, and “the legal guarantee of the right to a clean environment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channels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related affairs were further broadened”.

However, in reality, the majority is suffering from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There are mass demonstrations against pollutions happening in Jiangxi, Sichuan, Guangdong, among others. *Under the Dome* is a 2015 self-financed,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by Chai Jing, a form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journalist, concerning air pollution in China. It was viewed over 150 million times on Tencent within three days of its release. Unfortunately, it was banned shortly afterwards by the authorities.

Foreig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Paper claims that “China continu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alm of human rights. It played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UN's human rights bodies, and endeavored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owever, there are tremendous cases of abuses of human rights as mentioned above. In order to confuse and fool UN, China is “promising to greatly increase its donations to the office in the period 2014-2017”. Yet, the truth cannot be denied.

28 June 2015

Hong Kong:

- 2 Reject the false universal suffrage and political reform!.....Zhang Yan
- 3 People's opinions are not recognized.....Da Jing
- 5 In praise of Hong Kong people saying NO to Chinese autocratic regime (reprint).....Wang Ning
- 6 The denial of political reform made Beijing government crying and getting angry (reprint).....Wang Ning
- 8 Reject the temporary acceptance of the false universal suffrage! (reprint).....Xie Guandong
- 9 The emerging of numerous professional group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October Review
- 10 Long-hair filibustered to disclose the injustice at the Legislature meeting (reprint).....Liang Guoxiong
- 11 Letter to Financial Secretary John Tsang Chun-wah from Prison (reprint).....Chan Tak Cheung

China

- 12 Release immediately Gao Yu, Pu Zhiqiang and all dissidents!Zhang Kai
- 14 The issu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amid difficulties.....Jun Xing
- 15 Comments on the vision and a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Lau Shan Ching
- 17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reality of China.....Zhang Kai

International

- 22 Four years after Fukushima, India is flogging a nuclear dead horse..... Praful Bidwai
- 23 Declaration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Palestine..... Fourth International
- 28 Fundamental rifts: power, wealth and inequality in the Arab world.....Adam Hanieh
- 30 Is Africa ris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1).....Firoze Manji
- 32 Is Africa ris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 Jean Nanga
- 35 Dualities of Latin America..... Claudio Katz
- 43 From the short "Soviet century" to Putin's Russia..... Catherine Samary
- 49 World War I and Its Century..... Allen Ruff

Special Translation

- 55 An Open Letter to Soviet Working Class.....Leon Trotsky

Memorial

- 59 In memorial of comrade Ruan Jinzhao.....Jiang Junyang
- 61 A poem of madness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Chan Chung Hei
- 62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death of Mr Zhou Rensheng (reprint).....Yang Lin
- 66 An interview with the son of Wang Fanxi (reprint).....Pan Weilian

Article in English

- 68 Release Immediately Gao Yu, Pu Zhiqiang and all dissidents!.....Zhang Kai
- 69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reality of China.....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2卷第1期 (總第238期)

2015年6月30日出版

-
- 香港** 2 團結一致否決掉假普選政改方案——爭取真普選過程中的一次重要勝利……………振言
3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民意……………大進
5 頌香港的中國人向專制暴政說：不(轉載)……………王寧
6 香港否決政改使北京又哭又惱(轉載)……………王寧
8 堅拒假普選也袋住先的欺騙(轉載)……………謝冠東
9 雨後春筍的專業人士組織應運動而湧現……………本刊資料室
10 長毛再拉布，力揭議會的不堪(轉載)……………梁國雄
11 《給曾俊華司長的一封信》(轉載)……………陳德章
- 中國** 12 立即釋放高瑜、浦志強及所有異議人士！……………張開
14 在內外交困中發布的《國家安全法》……………軍行
15 試評「一帶一路」的願景和行動……………劉山青
17 從實況檢視中國的人權進展白皮書……………張開
- 國際** 22 福島災難四年後，印度鞭打一匹核能死馬……………普拉夫爾·比德維
23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聲明……………第四國際
28 根本之裂痕：阿拉伯世界的權力、財富和不平等……………亞當·漢尼
30 非洲在崛起嗎？一個批判性的觀點 (1)……………費洛茲·曼吉
32 非洲在崛起嗎？一個批判性的觀點 (2)……………約翰·南伽
35 拉美國家的雙重性……………克羅迪歐·卡茨
43 從短暫的「蘇聯世紀」到普京的俄羅斯：破裂和再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凱薩琳·薩馬利
49 一戰世紀……………艾倫·拉夫
- 特譯** 55 致蘇聯工人的公開信……………托洛茨基
- 懷念** 59 懷念阮金兆同志……………姜君羊
61 清明瘋……………陳中禧
62 紀念周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轉載)……………楊林
66 浙江海寧訪王凡西之子(轉載)……………潘惠蓮
- 英譯** 68 Release Immediately Gao Yu, Pu Zhiqiang and All Dissidents !……………Zhang Kai
69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in the Reality of China……………Zhang Kai
-